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杜润生等六人新世纪建言

胡绳在理论上的探索与贡献

『东方魔稻』发明人袁隆平奇遇记

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

恶政是一面筛子

2001/ 1 总第 106 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炎黄春秋

杂志社

2001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炎黄春秋

开 篇

- 2 直面世界 开拓未来
——2001 新年献词……………本刊编辑部
- 3 《炎黄春秋》的责任……………杜润生
- 4 坚持用事实说话……………李 庄
- 4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本质上是—致的……………宋木文
- 5 对《炎黄春秋》四点建议……………张岂之
- 6 为读者多介绍一些当代科技知识……………曾彦修
- 7 我党许多教训有待继续探讨……………吴 象

殒 星 篇

- 8 哲人其萎 勋业长存
——记胡绳的思想理论贡献……………郑 惠
- 15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吴 江
- 20 刘伯承在上党拉开解放战争序幕……………刘备耕

求 实 篇

- 25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何 方
- 28 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杨第甫

英 杰 谱

- 30 “东方魔稻”发明人袁隆平奇遇记……………庄志霞 聂 冷
- 39 民主斗士史良……………赵纪军 杜秀娟
- 45 百岁红军女战士陈琼英……………蔡庆新

人 海 浪

- 50 美国将军史迪威与八路军……………吕德润
- 53 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廖盖隆
- 56 路遇陈独秀……………张 定
- 58 当代武训——港胞张杰……………赵 畅

文 荟 苑

- 62 曹禺不仅仅是戏剧大师……………张 彦
- 65 金山的多彩人生……………白 岩

群 言 堂

- 68 读了《打扫孔家庙》之后……………欧远方
- 70 在大贪背后……………官伟勋
- 71 想起林纾的两篇小说……………纪 文

古 镜 台

- 72 用另眼看大帝……………李一鑫
- 74 恶政是一面筛子……………吴 思

他 山 石

- 78 印度:亚洲另一只醒狮……………清 早

愿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 绳**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镗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直面世界 开拓未来

——2001 年新年献词

本刊编辑部

人类又跨越了一个历史门槛,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纪。20年前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带来的勃勃生机,方兴未艾。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崛起,并日益与全球接轨,使中国不再封闭,成为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东方大国。

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应该走向世界,也不能不走向世界。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不同文化的接触必将日益增加。有过“东学西渐”的历史辉煌,又曾在“西学东渐”中大受裨益的中华文化,无须妄自菲薄,也没有理由夜郎自大,而应直面现实,直面世界,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发展创新,让她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又充满时代气息的新貌,展现给世人。

在我们敞开心扉,同读者纵谈天下大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自己的责任。《炎黄春秋》在国内林林总总的杂志中,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自认为她是一份认真的杂志,严肃负责的杂志。今年,恰逢她创刊十周年,在此,我们除对作者、读者表示节日的诚挚的问候之外,不能不多说几句我们的工作。

《炎黄春秋》创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们把“实事求是”作为办刊原则,申明对历史人物“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这一原则的实践,得到了一批积极的志同道合者的支持,吸引了众多高层次的撰稿人,更赢得了海内外的广大的读者。

创刊十年,出版百余期,我们不敢说有多少“黄钟大吕,回肠荡气”之作,更不能说1400余万字“字字珠玑”,我们无愧于读者的是始终保持的“求实存真”的编辑心态。本刊以主要篇幅评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期读者从中得到某些历史知识和教益。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学习探索的过程。在科学面前,学术问题面前,谁也不能说谁已经终极了真理,因为中国历史上“朕即真理”

留给我们的教训太惨烈了。我们主张,大家要有平心静气听不同意见、不同声音的雅量,反对动辄去做他人“裁判”的霸气。共同营造一个在遵守宪法前提下让人放开说话的宽松环境,把是非交付公论。这才是推进学术研究、发展科学的正途,也只有如此,才能医治某些人偏执、武断的痼疾。

回忆《炎黄春秋》这十年,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但更多的是阳光和鲜花,是关爱和支持。一位革命老干部的诗集中有《七绝》云:“炎黄风雨春秋笔,务实求真敢放言。不事增华不媚俗,一泓清鉴启民魂。”北大一知名教授说,《炎黄春秋》是他刻意保存的三种刊物中的一种。就在不久前,我国一位著名无党派人士、社会活动家,曾书“求实存真,言之有物”八个字赠《炎黄春秋》编辑部。我们珍惜这来自社会各界的鼓励,因为我们有自知之明,我们的刊物办得没有这样好,是大家希望我们办得这样好,我们应该朝“这样好”努力。对于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我们认真听取,有则改之,择善而从。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社会终归在进步,昌明的政治氛围在日渐形成,《炎黄春秋》才得以存在,茁壮成长,马上就要度过她的十岁生日。只要读者需要她,她又能适应读者的需要,她将走过她的第二个十年,第三个、第四个十年……

谈到这里,不禁想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古语,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只有创新才能图存。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不负读者的期待。在坚持实事求是办刊原则的基础上,拓宽视野,扩展内容。这个刊物是以历史题材,主要是现代重大革命事件和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在新的一年里将适当增加有借鉴价值的中国古代历史,以及外国可供我国借鉴的历史题材的文章;还将增加介绍当代高科技知识的通俗文章,以适应更多读者的需要。

让我们用一句极富北京味的话作结,祝福踏上21世纪大道的朋友们:“您,走好!”

《炎黄春秋》的责任

杜润生



我认为《炎黄春秋》有影响、有威信。虽然它是一份历史类杂志，但是以史为鉴，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的一些意志和要求。因此要非常珍惜它，爱护它，支持它。

现在，中国社会有这么一批知识分子，这么一群通晓历史的文化人，他们需要一个发言的地方，一个活动的空间。这个刊物就担负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责任。它操作的方法是以史为鉴，这个特色不是有点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做到的。这方面的资源是很丰富的，也是很有厚度的。这就是要珍惜它的道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炎黄春秋》在

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经常涉及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是符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它必须溶入全球化，除溶入贸易，在民主方面也要和国际接轨。我最近在报上看到一个新闻，欧洲本来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最悠久最成熟的地方，但是它还提出几条，要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最要紧的，是有言论自由，有学术自由，有产权保护制度。刚刚公布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五计划的建议，也提出了这些类似的目标。提出继续推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对权力进行监督，等等。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做？我们党已经在做，还要继续做。我个人以为这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破，一是立。我们反封建，搞土改，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大成功。但是，破了以后立什

么？我们破的还不够，立的更不够，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不树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反封建是反不彻底的，因为没有正面的东西。一定要建立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譬如控制贪污腐败，光靠司法部门是不够的，必须有民主的监督。现在我们缺乏这个东西。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有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学习。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划时代成就，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一定会产生更大的进步。《炎黄春秋》有义务为这个奋斗，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炎黄春秋》今后仍应该继续以史为鉴。说到以史为鉴，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不但要以中国的历史为鉴，还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譬如加强民主，有必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吸取西方有益的经验。世界上的民主制度不是中国首先实行的，也不产生于俄罗斯。它产生于西方。所以，要以一定篇幅，介绍一些国外的东西，近代的东西，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东西。能写这方面东西的人不少，读法律学的，读政治学的，是可以找到的。

当然也要和其他刊物区别开来。我们的特色是离不开史，离不开人物，但是这些历史和人物已经构成了广阔的空间。

坚持用事实说话

李庄

迎接新世纪 2001 年，预祝我们伟大祖国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再过几个月，就是《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十年恍如一瞬。但《炎黄春秋》岁月不虚，持续发展、健壮，已扎根广大读者之中。感谢编辑部同志的辛勤努力，感谢广大读者的全力支持。

《炎黄春秋》白手起家，没有什么赞助。创刊伊始，人手很少，社址几经迁移，初期印制条件艰难，排校难如人意，读者常有反映。编辑部多方改进，克服困难，艰苦跋涉，始有现在成绩。没有广大读者

的爱护和督促，这成绩是不可想像的。

《炎黄春秋》创刊时机好，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之际。在近十年中，个别稿件掌握不稳的情况是有的，但总的说情况良好，领导与读者都满意。

在新的一年里，编辑部负责人一再表示，要虚心学习，力求进步，坚决发扬过去的成绩，对缺点和不足坚决改正和补正。对此，我作为一个读者，表示热烈欢迎。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等等，正在



继续发扬，这些方面可用事实说的话很多，都是杂志的好题目。今年是我们党建立八十周年，党史上和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事件，都需要准确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论证。希望《炎黄春秋》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写今天也写昨天，写经验也写教训。

祝《炎黄春秋》越办越好。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本质上是

一致的



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这个杂志已经成为比较有影响的刊物，有相当高水平的作者群和读者群，还有相当不错的可读性，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地期待一个杂志所

能起到的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我感觉这个刊物坚持了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线。我看到的大部分文章，不是所有文章（那是谁也做不到的），体现了这条思想路线。

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讲，坚持和发扬这条思想路线是极端重要的。在我看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点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你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就并提了。要从实际出发，思想又必须解放，甚至还必须有一些勇气，所以说实话和讲真话不容易。当然了，解放思想也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不能脱离现实，讲什么，不

对《炎黄春秋》 四点建议

晓之



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又是她的特邀编委。我很喜欢这个刊物，也经常给她投稿。今年7月是《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我希望这个刊物越办越好，我想给《炎黄春秋》提四点改进的建议。

一、既要保持刊物特色，又要开阔编辑思路

《炎黄春秋》是以宣传炎黄文化为主的普及性刊物，其中尤以中

讲什么，讲到什么程度，要考虑社会效果。这也是实事求是所要求的。

第三，我的观感，《炎黄春秋》的编辑方针是以史为鉴，主要讲历史，通过讲历史引起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同时也适当触及一些现实问题。我看这个方针应该继续坚持下去。讲历史要选择，使其具有启发现实的积极作用。讲现实，比如对民主和法制建设进言，也是需要的，但刊物的定位要明确。《炎黄春秋》不是《求是》，不是《人民日报》，但它也从来不是什么唱反调的刊物。这个大的定位是对的，要很坚定。这样，某些方面的突破才能把握好。

国近现代政治人物的撰述为主。这方面有成绩，为读者欢迎。

但是这些似乎还不够。过去介绍的人物，大都有过不幸遭遇，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现在还其本来面目，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不能都取这样的题材。要写人物，有许多新题材：

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代表人物，坚守农村教育阵地的小学教师，坚守大学讲台的文科教授，在我国体育战线上默默工作的教练员等等。其中许多人并没有那么多政治性，也没有那么多不幸遭遇，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却值得大书特书。

写人物也要开阔一些，写的面多一些。

二、既要扩大杂志市场，又要关注提高读者品位

对前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做得好，因此销路好。编辑同志可能经常考虑：哪些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这应当考虑。但是还有另一方面，杂志肩负提高读者阅读品位的责任。比如，除人物以外，关于通俗易懂的历史理论，关于文化问题的研讨意见，关于文化的评论等等，这些内容也应有所涉及。也许有些读者一时不感兴趣，因为这

些文章没有多少形象性，只有理论性，但是，从杂志的长远生命来说，除形象性之外，还需要有理论性。二者结合。我建议杂志社可以适当增加理论性，不但看到读者的现有兴趣和水平，还要看到读者未来的兴趣和水平。

三、既要有老的作者群，又要有新的作者群

在作者方面，只要文章达到发表水平，可以多一些新面孔。没有新的作者群，杂志的生命力会受到影响的。

四、要有下去组稿的专、兼职编辑

《炎黄春秋》有多少专、兼职编辑，我不清楚。但是我有个印象，好像没有多少编辑下去组织稿件，只是几位社领导向老朋友们、老战友们约稿和组稿。这恐怕不够，面也许狭窄了些。

总之，我衷心希望《炎黄春秋》在新的世纪里既保持原有的特色，又有较大的开拓。我国文化资源十分丰厚，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很多，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杂志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把握时代脉搏，开阔视野，才能越办越好。我相信，《炎黄春秋》一定会再上一层楼。

为读者多介绍一些当代科技知识

曾序修



我有一个建议,即在《炎黄春秋》上开辟一个“当代科技知识讲座”。这个栏目同《炎黄春秋》的内容看似不甚相符,但我觉得可能很有好处。

《炎黄春秋》在读者中的威信相当高,读者群中的文化与政治水平也相对较高。但这群人,大多数不太熟悉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却十分关心国家的现代化,求知欲望也还旺盛(不然他就不看这个刊物了)。因此,提出这一建议,供编辑部参考,

近几年来,党中央及国务院均不断聘请各门学问专家向党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讲课。这种精神是值得本刊编辑部及本刊读者学习的。

当前,国际科学技术发展迅猛,中年以上读者极难了解。因此,建议本刊在条件许可并准备成熟后,每期登载一篇深入浅出,使外行也能略知其要旨的、全面介绍某一重大科技问题的当今发展状况。它对这方面的历史发展过程当然也要简明扼要而又通俗地介绍一下。不然,读者一下子进入当代的科学成就,是看不懂的。

要办好这个讲座,建议编辑部考虑几个要点:一是全面计划,统筹安排,最好一年下来,十二篇文章即成一本小书(字大一点);二是如何确定选题,要请教专家,由他们商定每一年讲座的全面安排;三是要找好作者,要能既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该门学问;四是务必深入浅出,文字务必通俗简洁。作者也宜由专家推荐。

我一想,已可举出十几个题目供参考。例如:一,“知识经济”时代问题(包括这一提法在科学上是否确切);二,所谓“信息时代”的基本内容;三,生物学进展及展望(上,实验科学部分);四,生物学进展及展望(下,农林渔牧及医学应用等方面);五,材料科学的进展及展望;六,能源问题(危机及出路);七,环境保护问题(迫切性及出路);八,水资源问题;九,世界及中国的人口问题;十,宇宙学进展及展望;十一,空间科学的进展及展望;十二,战争工具及指挥系统的进展及展望。

以上是一时想到的,又是外行,自难于恰当。这类问题还很多,例如,微观世界研究的进展;“纳米”是什么?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全球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研究;爱滋病等若干新传染病的趋势及预防、医治问题;海洋世界的保护和利用问题,等等。

此项计划做起来难度较大,深入浅出一点最为不易,但又必须做到,因为读者不是专家。

我党许多教训有待继续探讨

吴 晓

明年是我们党建党 80 周年,又是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发表 20 周年。我认为《炎黄春秋》明年应多组织几篇关于党史上重大问题或重要人物的探讨性文章。

不久前上演的电视剧《张闻天》,我看了觉得很好,也听到不少人说好。好在哪儿?这里不必多说。对这位在党的路线转变的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又担任了总书记的领导人,对这位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政治家,对这位被诬为“右倾反党”后仍然长期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过去宣传得太少了,太不客观全面了。只要能如实地反映出他人格、品德、精神世界的某个侧面或几个侧面,就足以令人感动。这部电视剧受到广泛的好评,毫不奇怪。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它对党史上一些长期流传但并不符合事实的说法,有所突破,有所匡正。比如,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员是如何确定的?西安事变时党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是怎么讨论形成的?“文革”中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的平反证明又是如何作出的?等等,电视剧都依据确凿的材料,按历史的真实情况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回答。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惜有些人虽然觉得剧本很好,看了很受教育,对这几点却忽略了,并没有注意到同过去流行的说法有什么变化和发展。



我们学习党史,主要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本书对有些问题的说法是不准确、不完整的。后来出版一些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沿袭了这些说法,逐渐形成为不易改变的传统观念。现在经过进一步研究,找到了事实依据,提出了更准确更完整的说法,仍然往往被忽略,而不容易被接受、被肯定。因此,电视虽然演过了,还可以写文章从不同角度、用不同形式加以宣传。这

对我们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党的历史、接受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其所以伟大、光荣、正确,并不是没有经历过挫折与失败,而是党善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总结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从而克服困难,继续奋勇前进。40 年代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教训的产物,为全国性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80 年代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教训的产物,为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开辟了道路。但决不能说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够了,恰恰相反,还有许多错误的观念需要澄清、需要纠正,许多历史教训有待总结,有待记取。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习党史,研究党史。

哲人其萎 勋业长存

——记胡绳的思想理论贡献

● 郑 惠

胡绳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六十多年来,从他的作品中受到教益的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不可胜数。我想,无论识与不识,许多人都会为他的逝世而感到惋惜。鲁迅曾有文章纪念章太炎,认为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鲁迅在东京留学时去章太炎处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是将章太炎的学者和革命家的影响分开来评价的。但胡绳不是这种情况,胡绳作为学者的业绩与作为革命家的业绩结合得十分紧密。他自己说过,“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胡绳毕生尽瘁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这成为他从事革命事业的主要部分。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也就是他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这篇文章想扼要地介绍胡绳一生的思想理论成就,虽然还不很完全,但也可以看出,胡绳同志和他的这些成就宛如一座丰碑,将长久地留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

两篇少年述志的作品

胡绳出生于江苏苏州市。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文化名城。明清两代在这里

产生的状元宰相之多在全国各府州中遥遥领先。胡绳少年时读书的苏州中学也是久负盛名,人才辈出。校友中现在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多达三十余位,这在全国众多中等学校中恐怕也是罕见的。胡绳与这些英才同属好学深思之士。不过他的专长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他少年早慧,崭露才华,这表现在很多方面:读书的禀悟力高,记忆力强;既能写诗,又能为文;既爱好天文地理,又爱好哲学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上高中,严重的民族危机给这个少年学子以深深的震撼。1932年他写了一首自由体的长诗,描绘他傍晚进城时看到河边夕阳无可挽回地落下去的情景,同时期待着又一天的清晨推出一轮红日,又来了温暖,来了光明。诗的最后说:“你不息的伟大的精灵啊,将得到永生!”他以太阳作象征,抒发了自己对故国衰落的悲怆和对它再度崛起的渴望,表达了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关怀。另外有一篇寓言式的短文《眼镜的故事》,发表在一家报纸上。此文以第一人称叙述,我去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戴上后将一切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又重到店里要求退货,店伙计问是不是配得不合适。我回答说不是,正是因为戴了它过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人类的一切。于是店伙计以一个哲学家的样子说了一通有深意的话,说不戴眼镜固然看不到人类的丑恶,但也看不到人类的美善。你还不如戴上这副眼镜,拿你看到的美善去改正那看到的丑恶吧。这篇



1935年胡绳(前排左)在上海与世界语诸同志合影

短文是要表明胡绳学习了辩证法唯物论之后，已经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唯一科学的工具。总起来看，两篇作品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少年胡绳立下的远大志向，即要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初初上阵时的身手不凡

胡绳于1935年下半年自动放弃大学生活到上海参加革命。那时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上海的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迅猛发展的抗日救亡形势下，逐步觉察到这条“左”倾路线的错误，并努力在斗争中摆脱它们的束缚，探索和开辟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新局面。胡绳那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他也在这种开辟新局面的努力中注意清除“左”的影响，寻求正确的道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刻苦摸索，他领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深意，并结合思想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大力进行宣传。

1937年3月胡绳发表了《胡适论》一文，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过（包括他倡导的理性主义精神）作了公正的评价，并且提出，在当前民族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复古，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学，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

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这是20年代以来很少见到的左翼文化界主张联合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文化人士的声音。这是与王明“左”倾路线强调排斥中间力量的意见截然相反的。与此同时，胡绳还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一文，针对文化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另一种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当时有人写文章认为，既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就不必再有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胡绳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思想的各种各样并不是危机，倘若任何一派思想要靠政治

力量和武力来强迫地灌输到民众中去，使他们盲目地信仰，那才是危机！”“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这个批评意见接触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不久之后出现的王明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胡绳这两篇文章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作了完整的正确的阐述，既反对了“左”的倾向，又批评了右的倾向。这个年轻文化战士初初上阵就显示了他的身手不凡。

充分说理的思想批判

抗战中期，胡绳在重庆参加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时，看到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一股反理性主义思潮：有的是从中国古代搬来的超然于是非人我以外的道家思想，有的是从西方贩来的新黑格尔学派的神秘主义，有的是在讲述历史中歌颂中国封建时代的专制政治。这些思潮对于启发人民觉悟、争取抗战胜利都是不利的。胡绳写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批评代表这些思潮的著名学者冯友兰、贺麟、钱穆等的几本著作。这是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几位饱学之士的挑战。此外，胡绳还写了《论诚》，批判蒋介石宣扬的充满法西斯思想的力行哲学，写了《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批判西方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中国战国策派。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我们要坚持科学的精神，坚持思

想的自由发展,坚持合理的思考,从这里培植我们的远大的理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一切盲从和独断,打碎一切反理性主义!”

胡绳后来回顾这批文章的写作时说:“在这里我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这批文章“总的说来,贯串的主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它们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的锐利锋芒,同时又是充分说理的。学术大师钱钟书读过这些文章后引用禅家公案“有理不在声高”的话加以赞许。有的台湾学者对其中批评钱穆的文章也表示欣赏,并将它们复印了在朋友中传阅。这都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

成系列的理论通俗读物

在抗战前两三年的革命文化活动中,以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大众哲学》)为代表,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胡绳认为这是文化运动与人民大众相联系的重要进步,并积极投入到这个实现理论通俗化的作者行列中。1937年他出版第一本哲学小册子《新哲学的人生观》,同年还写了《哲学漫谈》,1938年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940年写了《思想方法》,1948年写了《怎样搞通思想方法》。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哲学通俗读物的系列。此外还写了《二千年间》、《中国问题讲话》(1945年)、《孙中山奋斗小史》(1948年)等论述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前人观点的简单复述,而是将基本原理融会贯通,结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行再创造,有许多新意。他的几本哲学通俗读物,在写法上注重用大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用抗日战争的现实生活来作说明,与同类读物中那些用生活琐事作比喻的比较起来,要高出一筹。他的《二千年间》不是沿袭一般历史书按朝代顺序的编年体写法,而是将中国二千年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分成若干重要问题如专制皇帝、官僚制度、土地制度、军事

制度、民族问题等等进行纵向剖析,在写作体例上别创一格,令人耳目一新。这些读物都写得深入浅出,清晰好读,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人所喜爱。

引人入胜的史书和时评

胡绳从3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193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以后陆续写了一批论述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章。在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的前夕,1947年他在香港只用半年时间写成一部学术专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于翌年在当地出版。这部著作不是一般地叙述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政治的一件件事实,而是着重分析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怎样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人民中得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政治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曾经怎样损害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等等。通过这种研究,胡绳第一次发现和说明了自鸦片战争开始八十多年间封建统治者、人民、外国侵略势力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书在生动地讲述这种复杂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一个主题,即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部书以其独到的史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揭示,以及脉络清晰、富于文采而赢得众多知识分子和中外史家的长久推崇。毛泽东在1949年8月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著名论文中,谈到讨论一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胡绳这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列强政治关系的历史专著很好地适应了这种需要,被誉为有很高学术价值又为配合当时政治斗争作出特殊贡献的力作。

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胡绳还随着形势和斗争任务的发展,写过许多时事政治评论。《胡绳全书》中没有收抗日战争时期的,只收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这类文章。他说对后一时期的这



1996年胡绳在政协“21世纪论坛”上讲演

类文章有偏爱，那时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很大。“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1946年上海的几个进步刊物，如柯灵、唐弢主编的《周报》、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黎澍主编的《文萃》，后来香港的《群众》等，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时评。而这些时评都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感想式的，而是有重点论题、有具体分析的数千字的文章。那时各阶层群众都十分关心并迫切想要了解时局的变化，因而这种时评受到特别的欢迎。

总之，胡绳在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险恶环境中，不畏国民党的反动政治高压，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表现出一个党所培养的年轻文化战士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党性和锐气。40年代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自己的写作方向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因而很自然地迸发出全部精力用于这一艰苦的思想劳作之中。他从17岁到30岁的十多年间，写作的时事政治评论、思想文化评论、政治理论通俗读物、历史学术专著

等等，数量多达一百几十万字，质量也很高。这些作品中的名篇都曾多次印行，销路很广，有的还有多种外文译本（如《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六七年间印行了六十多万册，日译本由东京三一书房出版，先后印行约二十万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四年间出过七版，还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日文译本），在海内外特别是思想文化界和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许多青年是从这类作品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以至投奔革命的。

建国以后，胡绳担负党和政府许多部门的领导重任，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一个“写作专业户”了。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负责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参加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为研究、阐释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向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从50年代中期起，他在思想上愈来愈感到困惑，感到自己的思想与现行的潮流发生抵牾，实质上，就是他不能适应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左”的指导思想。这使他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成为他在这一时期以个人名义写的文章较之建国前大为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为顺应当时的潮流，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不过，在《胡绳全书》第二卷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针砭时弊、观点正确的文章。其中在他指导和参与下由一些青年写作并用“施东向”笔名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思想文化评论就是例证。这些文章论述了独立思考、追求真理、认真读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好文章等等问题。它们所倡导的精神是与那时的唯意志论、形式主义、浮夸造假、不读书不务实的潮流相对立的。从中可以看到胡绳在许多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头脑。

开创近代史研究的新体系

胡绳于“文革”后期着手写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这部七十万字的历史专著系统地描述了鸦片战争后80年间中国社

会经济结构、政治形势、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发展状况；除对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势力的关系作了比《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更为充分的剖析外，还着重论述了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起作用的变化。通过这些分析，揭示出80年间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完整的而不是零散的、本质的而不是浅表的认识。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推动近代史研究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销数达三百多万册。

胡绳这部著作和他在50年代前期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以及他在40年代末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有特色的体系，对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确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步前进，胡绳的思想和写作生活发生了新的飞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他从心底里赞同新时期党的理论和路线。在党重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形势下，他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的精神得以大大发扬，这成为他又能写出大量优秀作品的原动力。

主编权威性的党史读本

胡绳于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在担任这项领导工作中，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对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总体把握，以及对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都通过讲话和文章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他提出一要充分论证教条主义的危害，破除迷信；二要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即实事求是、敢于创造的精神。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他认为首先要用历史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其次要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除时间长外还包含有许多曲折和

艰险的意思）。他写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一文，对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这次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次全会以来坚持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一条避免亡党亡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他进一步提出以这次全会作为标志将建国以来的党史划分为两大时期的意见。他还提出“文革”前十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提出“文革”期间既有“文革”的错误又有对这种错误的抵制和抗争的观点，等等。这些意见都为深化党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91年他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时有一股企图回到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的声浪甚嚣尘上。但胡绳始终不受干扰，在书中坚持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立场。胡乔木大力支持这部书的出版，并为书写了题记，对它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部书行销达六百多万册，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一个党史简明读本。

社会主义的研究硕果累累

从80年代以来，胡绳以很大精力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1987年，针对当时知识界一部分人从回顾“文革”中产生的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胡绳写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深入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胡乔木读了文章初稿后，立即写信给作者说：“文章在晚饭前后读完，读了深为敬佩。这确是一篇力作，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历史地和逻辑地答复了几年来一直被一些人弄得纠缠不清的许多问题。”

胡绳十分注意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等文章中着重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并论述从这种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社会里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我们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几乎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所

能提供的一切。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不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正如同民主革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一样。党在过去近三十年建设中遭受挫折和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从这种特殊国情出发,而只凭一些社会主义的抽象“公式”,或者是外国的模式,或者是过去中国革命中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具体经验来作指导,那当然会犯大错误。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路线,正是按照中国国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发展。

与这个特殊国情相联系,胡绳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等文章中,论证了必须运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根据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阐释了一个人们不大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关系。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能否解决好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因之一。

对邓小平理论的精辟阐释

对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胡绳在多篇文章中作了阐释和发挥。其中1994年6月发表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长文,被誉为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力作。这篇文章抓住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个主题,从四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在谈到“发展生产力”时,作者论述了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的重要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

要求”的思想,认为这是对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在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作者指出,这一科学概念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而是特别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来的。它的重要性在于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在谈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作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作者认为,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胡绳这篇文章以其思想的深邃、议论的精辟而受到重视,实际上是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1994年12月,胡绳在北京一个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讲演。这篇讲演从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的广阔范围来论述马克思主义



2000年5月胡绳(右)与本文作者在泉州蔡襄纪念馆合影

的发展问题,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其中特别谈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这些见解引起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和高度赞扬。

胡绳从80年代起写的这些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文章,结集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在不久前增订再版,它的英译本在国外得到很高的评价。在1998年12月举行的《胡绳全书》座谈会上,龚育之在发言中说:“我们许多老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很尊重、很拥护的,对于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阐述和传播,是作了贡献的。但是,像胡绳这样,写了这么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这个理论的论文的,并不多见。所以特别可贵。”

胡绳在病重的最后几年,还在关注和思考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1998年年底他在一个讨论会上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提出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用民粹主义的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是中国革命诸多

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1939-1949),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飞速完成之后,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搞穷过渡,指导这些运动的思想只能说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这一论点决不是他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他长期思想积累达到的成果,对正确汲取历史教训,推进现今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都极为有益。但这篇细致说理的文章竟遭到某些人的攻击。许多有识之士都对胡绳这一研究成果表示赞同。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胡绳最后为我们留下的这篇名文的观点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胡绳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和革命家。在宣传和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科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党的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值得人们长久地纪念和学习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百年潮》杂志社原社长)

(上接52页)阻拦,因而他的主张没有实现。

评论还说:“史迪威将军与中国抗战的这段历史,是值得中国人民温习的。它有力地证明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应该建立在怎样一个基础之上,才有前途和发展。”

10月17日,《新华日报》又刊登了朱德总司令致史迪威夫人的唁电,全文如下:

史迪威夫人:

谨为史迪威将军的死致哀!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名将,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对于您及您的家庭谨致吊唁。

朱德

1948年10月14日

12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史迪威将军夫人威尼佛莱德·史迪威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

唁电感谢电,电文略称:“史迪威了解您的志愿,是要中国人民过正常幸福的生活。他对您的斗争非常钦佩,史迪威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新中国建立后,史迪威夫人曾想重访中国,遗憾的是她在中美建交之前于1972年病逝。中美建交后,史迪威的两个女儿史文思、史文森都先后到中国访问,受到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1976年当宋庆龄接见她们的时候,亲切地对她们说:“史迪威将军心中装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他预见到中国人民将建设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并为此目的付出了力量。中国人民将永不会忘记他的忠诚和友谊。”

中美建交后,美国成立了民间组织——中美友好协会,史家姐妹均是会员。1992年在重庆成立“史迪威研究会”时,年近八十的史文思还赶去重庆出席了成立大会。

(责任编辑 方 徨)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 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 吴江

胡绳同志在久病之后终于 2000 年 11 月 5 日溘然长逝，这时离进入 21 世纪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了。他在 1999 年 3 月曾来信说：“‘时间已不多’，彼此同感。我能长途出游，外观身体很好（除腿部因动过手术，不良于行），但医生似认为隐患可虑。现正接受放疗，每日去医院一次。大概可以如恩格斯所说‘把头伸到下个世纪探视一下’是可以做到的（恩格斯未能做到）。已经八十多了，总是赖在这个世界上不走也没有道理。”胡绳还是要比恩格斯幸运些，他虽差一个多月未能进入 21 世纪，却大致实现了“把头伸到下个世纪探视一下”的愿望，因为他毕竟看到了我们党为下世纪前期的发展所构画的具体蓝图（包括第十个五年计划，以及到 2010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

值将比 2000 年再翻一番的前景，还有，已经可以预测 21 世纪初期的国际形势，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阻挡的趋势等），尤其难得的是，他认为从现在起至下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阐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胡绳在其一生中最后抱病为社会主义操心的一个问题。

胡绳虽官阶不低，但非政要，他以理论家、史学家名于时，亦将以近代史著作传于世。但他同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这一点却很少为人所知。他的学识是多方面的。总的说来，胡绳是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者易，做思想家难。做思想家首先要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代前面说话立论，而不满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的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在历次批判运动中，胡属宽厚派、温和派，尽量不说过头话，诚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说：所论常“未能尽意”，即持恰当保留态度之意。这是颇难得可贵的。但胡绳还有其另一方面，即他在政治上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处处自我设防，在重大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易受制于人、不轻越雷池

一步,这可能限制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才能的发挥。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他的晚年特别是最后几年,却有了惊人的改变——这有他逝世前一个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为证。

我和胡绳在60年代相识,算是晚交了。我们曾在一个单位共同工作过,并在干校共同劳动过,但并无私人往来;“文革”以后不在一处工作,相见就更少了,只是在会议场合偶而碰面。大概是1995年下半年吧,他肺部动了手术后到广东潮汕休养,我刚在香港,他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要《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那本书,这样我们就又联系上了。1998年春夏之交,我通过当时协助他工作的郑惠同志与他相约,前去探望他。他那时耳朵已不好使,眼力尚可。坐下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出示一篇文章问我“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一看,那是我在1997年9月间对一位香港友人所提关于社会主义前途问题的答复,题目就叫《关于中国理论界现状的访谈》,那是一篇长文,用的是一个化名。我承认那是我所写。他就指着其中的一段话,那里说的是“对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头号问题(这个问题的涵盖面很广),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他对我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想,他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这是我的什么新发现,而是发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致(最近我果然发现在他逝世前一个月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文章,1992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指出,马克思原是希望将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经孕育成熟的新社会因素解放出来,这一点马克思没有能够做到;而列宁则是在一个新社会因素远未孕育成熟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革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任务首先是要利用一切措施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培养出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因素,主要是大大发展生产力和建设新的文明,为此必须

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用以发展生产力的一切先进方法、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就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接着胡绳又指着文中引用的邓小平在1992年6月间在上海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所讲的一段话:这番话讲得好,国内恐怕很少有人看到。因为这段话极重要,我就爽性把这段话抄录在下面。邓小平说:

“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了那些极严重的错误?”

那刚是南巡讲话后不久。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提出“不要争论什么‘姓社’‘姓资’”,这是叫那些不断攻击改革开放以学习资本主义来搞好社会主义的人闭上嘴,并不是要撇开社、资关系这个大问题,所以接着又说了上面那段严厉的话。不久后,我党正式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力争将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加入世贸)。这是继承邓小平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迈出了大胆的重要的一步。

那次见面以后没有多久,胡绳寄给我他发表在《瞭望》周刊(1998年33期)的一篇文章,题为《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特别在文章页上贴上一张

字条说明：“原标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他不愿放弃这个标题，所以他后来在1999年3月11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又特别提及：“在《瞭望》发的短文，又在《炎黄春秋》和《中共党史研究》两个刊物上重登，仍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这个原标题。”

胡绳以其学术界的声望，在国内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表达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问题，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3月11日写给我的那封信中就提及：文章“似乎还有些影响，反对的人意欲声讨，赞同者也不少。”

《瞭望》周刊的编辑发表胡绳这篇文章，也是有胆识的，虽然文章的题目改了。这里，为了纪念这位已逝的哲人，我想有必要将他文章中的一些段落摘录如下：

——“正在疾驶而过的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我以为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系，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很不容易，……”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这问题的透彻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在这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从50年代到70年代，情形虽然很复杂，但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对这段时期的经验给以分析研究，至少要有百倍于此的篇幅。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本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

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些论述吧!

我在接到《瞭望》文后,也寄给他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而作的《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路》,另一篇是评论史学家陈寅恪的文章。两篇文章都已经发表过。我在信中告诉他,如果他病中有精神,或者眼力允许,可以翻一翻,但不必勉强;我并向他建议:此时最宜写些简短轻松甚至表达闲情逸致的东西,或者写点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短文。但他在1998年12月10日来信中却表示,他想从评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这个问题切入,进一步展开论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信中除表示赞同《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路》一文中所论述的关于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弊病这一观点外,特别说明:“新民主主义宣布结束是过早的这种看法固然仍为许多人怀疑和反对,但赞成的人似已有不少,唯不敢或不便公开说出。近来杜润生发表一篇谈农业的文章(见《中共党史研究》今年第五期)有此意。我在《瞭望》上的短文,不但题目给改了,而且文章过于简短晦涩,还拟在纪念(按:此处有几个字不清,大概是指他即将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之际讲一篇话,稍加发挥。”这种打算表示他这时的病情尚稳定。

这封信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他在信中对于我们的共同感觉(“时间已不多了”)用古人诗词说了一段抒情的话,虽称“附带说及”,却颇有深意在,因此把它抄录在下面。他写道:

“‘时间不多’,不能不有同感。今秋到山东游览,济南等处见有李清照遗居处,因为此女诗人作诗曰:‘瘦比黄花语最清,非徒宛约树词旌,路长嗟暮呼风起,道出从来志士情’。盖清照有渔家傲一曲,为评论家誉为豪放词之上乘,词意为,梦魂达天帝之居,天帝殷勤问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后世笺注者以为‘路长嗟日暮’是从《离骚》中

化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而我又把清照词语缩减成一句。因与足下语意相符,附带说及,以博一笑。”

这一段话显然是他在病中有感而写的。

大概正因为觉得“时间不多”了,所以他要最后奋力。1998年12月他到长沙,参加一个“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就是将《瞭望》一文的主题展开,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长文初稿。又转到广东、海南游览,于1999年春节前一周始回京。回京后一边治疗,一边修改完成那篇长文。4月22日写信告我:“近作一文,将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共党史研究》五月同时发表(二刊均双月刊)。社会科学院院报抢先发表了,已印出的是文章的大部分,还有三千多字须待下星期一刊出。兹先送上这一期。此文尚未发表,责难反对之声已起(因为口头讲过)。为了预先对付攻击,不免尽可能说周到,处处设防,以致篇幅过长,难免贻裹脚布之讥。”

到了5月间他寄来《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已排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清样定稿。我不能不大为惊讶,一个重病在身的人竟有如此大的精力,阅读大量资料(包括《毛泽东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写出近二万字的洋洋大文。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文及其在“七大”会议上和其前后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当时,所论述的关于在落后的农业国家里为社会主义奋斗应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时,毛泽东懂得应当利用资本主义,并且不止一次地批评了民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即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可以跳过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直接依靠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像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俄国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所以提出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认为“不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能建

设社会主义”，列宁说，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34卷，289页）中国直到50年代初期，其经济比当时俄国还落后，当然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毛泽东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但是到了1953年以后，他的认识起了变化，在行动上就表现为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工业化刚开始还远未完成的条件下，就企图通过农民的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这当然是空想。这就不可避免地和毛泽东自己曾经批判过的民粹主义挂上了钩。这样谈论问题，很显然，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决议》的精神的，尤其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但是，《再评论》的这种论述决不是否定《新民主主义论》本身，恰恰相反，他指出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再评论》一文旨在总结1953年以后的经验教训，借此加深我们对于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的认识，加深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也就是加深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认识。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竟遭到了少数人的责难和攻击。胡绳于1999年9月将攻击《再评论》的一篇主要文章和另两篇反驳这种攻击的文章寄给我。很明显，攻击不是针对个人的。试看攻击者的下面这个说法吧：“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看，这又是把“文革”时期“反对庸俗生产力论”那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一切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们的头上了！

而胡绳恰于此时病情加重，五月初脑子发生病变，说明肺部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因此不能不再次入院治疗。医生建议做放疗，放射线直接进入脑部不仅痛苦，而且相当危险。这时

我到医院去探视过他一次。不久他又出院了。8月27日来信叫我有便去他那里谈谈。我去看他，这次没有谈文章的事，好像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只是闲谈一些琐碎的时事问题。我不便久坐，不到半小时便告辞出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面。不久他又到深圳去休息，回来已是2000年春节。他于3月5日来信告我：“我于1999、2000年之交在深圳住了一个月，回京度春节，现准备再去南方，大概会到福建一两个月。在民粹主义问题上的围攻似乎就算完了，但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不过我已无精力奉陪那些口口口口了。”他写信时因病情加重，有些字已难以辨认清楚，但他这时似仍有兴致和精力翻刊物，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了一篇论胡适的文章，他也读了，并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今天读了《平心论胡适》文，甚快。……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确应大大提高。我从30年代始写过评论他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数篇，但未能尽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顶50年代之数百万言。”

他本来说南行归来时当再联系，但是此后就没有再联系了，我只知道他又到烟台去休养了一个时期，然后再到上海，在上海治疗休养直到逝世。

我记得他最后所说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事实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算是竭尽心力了，而且是在重病中做这件事的。在他逝世后我得到他最后一本文集《马克思与改革开放》一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论》两文均收入其中。我建议不论是赞同胡绳观点的人或责难攻击他的人都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末了，我还想冒昧提一个问题：不知道目前的邓小平理论研究者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否有兴趣？他们又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谈邓小平理论如果撇开（或者不重视）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弄清楚邓小平理论的全貌？

2000年11月26日

刘伯承在上党 拉开解放战争序幕

● 刘备耕

1945年8月25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十一天，时近中午，一架美国道格拉斯运输机降落到山西黎城东阳关附近长凝简易机场。当机身徐徐安全降落在滑行道上时，太行军区的各个迎接小组顿时兴奋起来：“首长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可算是到家了，可陈毅、林彪、萧劲光、李天佑、邓华、宋时轮、江华、聂鹤亭等，他们还要进发华东、东北，回到自己的指挥岗位。

这天夜深，寂静的清漳河西的涉县赤岸村半坡上的小院，煤油灯的光亮布满了作战室。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盯着作战地图上的山西上党地区长治周围的县区。中午同他俩一起下飞机的副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以及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和王近山等军分区和旅的领导同志，也都在各自的住所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阎锡山的军长史泽波率领十九军、六十一军等五个师及杂牌武装1.7万余人，趁日本投降之机，到上党地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来了，先后侵占长治及周围的襄垣、潞城、长子、屯留和壶关等县城。在东面，郑州到新乡、安阳平汉铁路中段，国民党大军云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日益显现，企图会合阎锡山东西夹击，钳制晋冀鲁豫边区的主力军。当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必须在短期内消灭来犯的阎军。

电话接通了，偌大的指挥部却仅有一部手摇电话机。第一个传来的声音，是远在武乡指挥

部队作战的太行军区司令员，又是8月20日新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李达，他向刘、邓报捷说，他的部队已迟滞了敌人进攻的势头，还解放了新城段村。听到如此熟悉的声音，刘伯承心情喜悦，他庄重而亲切地告诉李达：你要坚持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军区部队屯兵之地。你们还要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打上党战役。接着刘司令员用简练语言透辟地阐明了形势与任务：蒋介石的军队正沿着五条铁路线开进，五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刚进入东北的部队作战略展开。平汉、同蒲铁路线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在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邓小平接过电话告诉李达：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

刘、邓指示守住大门的战略目标，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晋冀鲁豫边区，成了2400万军民共同奋斗的紧急任务。

邓小平离开作战室时，要他的老战友早点休息。刘伯承仍然注视着布满全墙的军用作战地图。这张破旧军用地图却来之不易，那是在抗战初期，太原危急，刘伯承和政委张浩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健儿在晋北阳明堡烧毁了24架日军飞机，又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创造了三天内两次伏击日军的“重叠设伏”成功的

范例，连续的胜利和影响，使得当时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战绩辉煌，可是他发给一二九师是一份山西省的局部军用地图，以此限制一二九师的对日作战。现在这份山西省军用地图是经过激战从日本手里缴获的，而这又是日军从阎锡山手里截走的。今晚，作战室上党地区军用地图上已将阎军态势精确标明，这里有同蒲、正太、津浦和陇海四条铁路所环绕，平汉铁路贯串其中央，打好上党战役，南面配合中原作战，北面配合晋察冀作战。如果打不好，阎锡山、蒋介石会取代日伪，更严重的是将影响战略全局。

墙上有“精密审计”四个大字的条幅，这是刘伯承所遵循的求实作风，他严格要求部属，更严格要求自己。他清楚本边区的实力。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他把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30万人，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军区已经连成一片，解放区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民2400余万，民兵40万。边区部队对日作战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民族解放而牺牲和重伤致残的达146600人。用鲜血浇注的胜利果实，必须全力保卫。

9月1日，李达率部解放了襄垣县城。3日，刘伯承在这里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他的开场白是：“昨天凌晨三点钟，日伪县长和阎军县长还在这里争权夺利。现在他俩都被押进看守所。”刘伯承接着说：“我们坐的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古时县官用来做什么的？古时衙门，都修一个叫‘退思堂’的地方。意思是县官办完公事，先退到这里，思考当天办的事有没有差错，能不能补救，所以叫‘退思堂’。今天在这里开会，也是要大家总结攻打襄垣城的经验教训。旧衙门的‘退思堂’，是思善补过的意思。为什么惟有襄垣改为‘寅畏堂’？昨晚我翻阅《襄垣县志》，才发现乾隆四十七年，县令李家芳把‘退思堂’改为‘寅畏堂’。他认为‘退思堂’有十大弊病，思过不如清心，清心不如寅畏。总之，思善补过不如秉公执法，事先思考完善免得草菅人命。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周密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几项主要工作：一、如何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二、总结军民联合攻打襄垣城的经验教训，再进行

一次军事大演习。三、掩埋敌人尸体，处理俘虏，整顿市容，开市营业。四、拆毁城墙、碉堡，以防阎军复得利用。五、没收汉奸财物，物粮济贫，解决特困群众生活问题。”

刘伯承在抗日战争初期立下一个制度，叫做“每战必有总结”，以此教育并提高各级指挥员。今天他听参加攻打襄垣的干部所作的口头汇报，使他特别满意的是长征老干部讲述问题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大为增强，而抗战时期的干部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都实在，还善于用具体的事例说明问题，所提的意见也颇有水平。这两种干部的提高，前者的知识化，后者的实际化，这是干部队伍的可喜的进步。今天他综合了大家所提供的的第一手作战情况，对到会干部只讲透一个至为重要的战略方针转变问题，要求干部能掌握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要求同军区部队合并的正规军适应新情况和新的战略方针，要打城市攻坚战。不占领城市，革命是不会胜利的。

9月4日，他来到太行三支队驻地，同指战员亲切交谈攻打襄垣的主要关节，刘伯承认为：“干部必须亲自侦察”是致胜的基础。“襄垣战斗因侦察敌人部署、地形、工事不够充分，战斗器材如梯子准备太少、太短而且太笨，尤其隐蔽性太差，失去突然性，用兵拥挤，不适于迂回敌人侧背，故招致过分的伤亡。”他总结的经验教训十分切实，对提高战术有很大的启发。他做指示力求抓住根本，反对山西圆毡帽式的不分前后里外，空道理只能坏事。第二天他对这次战役的战术指示就写上了这一段。刘伯承的战斗动员员能解决实际问题，向来是最受部队欢迎的。当时三支队十四团是抗战初期建立的老团，一共才800余人，力量显得单薄。刘司令员立刻表示：要把骨干强、兵员足的警卫连留给十四团，调出该团新一连作为警卫连。他说：“你们每个连这几天一定会补充新兵，保证每连补足100多人。他们都是太行民兵的骨干啊！”丁维昆团长、李镜如政委立刻喜笑颜开，刘伯承的话振奋了他俩的心窝。

9月5日刘邓下达作战命令：决心“以太行、太岳、冀南部队组织上党战役，彻底消灭盘

踞在上党地区的阎军，第一步计划先夺取屯留，吸引长治阎军来援，争取在长（治）屯（留）路上作运动战而消灭之。”不到80个字，就把毛主席、中央军委“寸土必争，针锋相对”的任务具体化了。

在9月5日，刘伯承对如何进行登城战斗又作出战术指示：第一梯队应选择几个不同地点，特别其薄弱部，同时登城，以分散敌人的火力，担任钳制任务的部队，遇到有良好的机会时，应不失时机由助攻转为主攻，如此次三十团的例子。登城的部队可区分为攻击组（携定量的手榴弹、砍刀），梯子组（架设梯子），破坏组（破坏敌人铁丝网、拒马、尤其地雷）及手榴弹组（担任登城之直接掩护）协同动作。”刘伯承对仅会要求“冲啊，冲！”的指挥员十分恼火：“怎么冲法？冲不上去又怎么打？”他在指示中将打法以及战斗小组的组成和分工都作了细致的交待。这些举轻若重的周密思考，一贯受到指战员的尊重、信赖和坚决执行。

我军装备劣势，要战胜拥有优势火力的阎军困难极大。他查看了太行纵队第二支队，三个团共有八二迫击炮7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50挺，新战士中还有一部分使用冷兵器大刀梭镖。山炮连的两门炮，仅有11发炮弹，步枪子弹更是奇缺，每支枪也只十来发，主要的武器是手榴弹。面对现实难题，刘伯承要求全军“千万节省弹药，不得丝毫浪费，同时，要拾缴弹壳，这点实行与否，应以此来测验指挥员的政治责任心”。刘邓指挥部从9月10日至22日这12天中，为了紧紧围绕任务、敌情、地形，就五次转移其指挥位置，使我军处于主动自如的有利地位。

9月11日18时，太行纵队总攻屯留。突击队先肃清城外敌人。三颗山炮轰开了东南城墙，手榴弹组把上千发手榴弹投向城墙上的守敌，一乘云梯迅速竖立到城墙上。七六九团、十三团、二十一团和三十团相继争先恐后登上城墙。接着打垮了敌人一次次的反扑，控制了东西南三面城墙。政治攻势也同时展开，十天前俘虏的阎军少将参事翟大昌向防守司令徐其昌喊话促降。攻入城内的第二梯队，展开了街道巷战。在震耳欲聋的冲锋号和冲杀声中，日伪县长、伪警

备队300余人被我活捉，敌防守副司令贾汉玉乔装伙夫被识破举起双手投降，司令徐其昌也钻进“口袋”就擒。9月12日，阎军2000余人全部就歼。

上党战役首战获胜后陈赓指挥的太岳纵队，由三八六旅担负攻打长子。9月13日黄昏，七七二团四次进攻北关得手，二十团以5个小时攻进了长子城西关。9月15日，登城的部队从一村落挖地道接近城墙，登城前，楚团长切实检查登城突击队五个战斗小组的分工，让火力组、梯子组、跳板组、投弹组、登城突击组共同讨论，想出了具体实现领导指示的种种好主意。到了18日下午7点整，攻城信号升空。山炮轰开城墙的一个大缺口，轻重机枪的火力压住了守敌的发射点，勇士们从地道涌出冲向城墙缺口，云梯上的勇士们亦奋勇快步登城，跳板组为进攻的突击队在外壕上搭好跳板，挂满手榴弹端着手提机枪的勇士，飞步而过。二十团胜利登城，七七二团、三十八团攻入北门和东门，残敌纷纷缴械投降。敌人官兵1500多人当了俘虏，阎军挺进二纵队司令白映蟾被二十团活捉。

同攻打长子一起动作的是冀南纵队5个团的兵力，由陈再道司令员指挥攻打潞城。这支来自冀南平原的部队，由于长期坚持在冀南，他们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最光辉的模范。从外表看，这支部队军服不整，紫花布军衣，装备更差，可是个个信心十足，9月16日23时，陈再道司令员命令总攻，两个主攻团的突击队几乎是同时登城，经过一夜激战，潞城伪县长刘元等人被俘，守敌全歼。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的弹药武器补足我军损耗之外，还大有剩余。刘伯承司令员特地赶来看望这支队伍，他们在集合场地上气氛异常热烈，欢呼声、歌唱声、口号声响彻山城。他大声喊道：“同志们打得好，辛苦了。”指战员一个个举枪欢呼。他走到战士跟前，看看战士们的枪、手榴弹，摸了摸他们身上的紫花布军装，真挚地对陈再道说：“战士们穿着这样的土布军衣，用这样的简单武器，能迅速登上城墙，真令人感动啊！有这样好的战士，不论什么样的敌人我们一定能战胜它！”陈再道感到极为欣慰。他想起八年前刘伯承命令他担

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抽调七六九团的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加上从三个主力团各抽调一个骑兵排组成骑兵连，一共五个连不足 500 人的兵力组成这支东进纵队，经过八年抗战，陈再道率领了已扩大十多倍兵力的五个团的冀南纵队参加上党战役，他和老首长一样充满着胜利的高兴，而且更怀着一种争取全战役彻底胜利的强烈愿望，他表示：“老首长，我们准备打好下一个硬仗！”陈再道得到的回答是：“你还保持红四方面军的那股猛劲，硬是要得！”

壶关位于长治东南 30 华里。9 月 19 日凌晨 2 时，太行部队三个团兵力发起总攻。无山炮支援，三十二团把八二迫击炮改成平射，打破城墙缺口后，副团长苟在合率突击队迅速进城，敌人两次反扑被打垮。三十四团蒋克诚团长指挥部队由东门、北门攻击敌人，并消灭东北侧营房的守敌。四十六团投入战斗后，敌人企图突围，均被截阻，经过 8 个小时的激战，共计毙俘敌约一个营和伪军四个中队，阎锡山的工作团团团长李洲被俘。

9 月 24 日 20 时，攻打长治城战斗开始。冒着大雨北进的太行、太岳部队按照右、左两翼的分工，以最快的强行军去占领有利地形，要同阎锡山展开关键的一战。只有全歼这一股 12000 人的阎军，才能再把长治守军在突围逃窜中加以干干脆脆地消灭。10 月 2 日，我左翼队预期与阎军遭遇在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一带。右翼队太行二、四支队向磨盘窑、王家渠进击。磨盘窑高达 1202.2 公尺，最高处形似磨盘，它同正西南的老爷山遥遥相对，构成两个制高点。它的东边靠近白晋铁路线，是驰援长治的要冲，阎援军被阻截在此地，就形成身首切成两段。我



在解放战争中的刘伯承

军左、右两翼的全体指战员，人人都了解这一仗的关键作用，所以在近战、白刃格斗中把刺刀都给拼弯了，他们仍坚守住了阵地。急待援军解围的长治守军史泽波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苦恼万状。此时，刘伯承把围长治城的冀南纵队 6000 人抽出投入打援战斗，对付彭毓斌带来的援兵八个师，两万人。刘伯承命令陈再道：“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我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岭，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大腿，你赶快从中间的大道往北插，捣敌人卵子。援敌已陷入我四面包围，我很快要发动总攻，你赶快准备出击。”陈再道率冀南纵队从右翼队和左翼队中间突进，贯穿到底。

10 月 5 日黄昏，总攻开始。枪炮声震撼老爷岭、磨盘窑，阎军见到大势已去，恐慌万状，急忙向北逃窜。秋雨绵绵，饥寒交煎的阎军乱摘乱挖沿途田地里的玉米、土豆，又吃又糟蹋，好不容易窜到厘亭以北，才发觉钻进刘伯承设的口袋阵。漳河涨水湍急汹涌，大队人马徒涉困难，最要命的是土落村制高点已被二十团控制，彭毓斌不顾一切地组织孤注一掷的突击，以超我十倍的兵力，发动了八次冲锋，都被一一粉碎。阎军指挥失控，乱作一团，北返南退都遭冲击，

他们只得丢弃轻重武器，四处突奔，真是兵败如山倒。我民兵、地方部队以及后方人员纷纷展开捉俘虏。有的团缴获的武器拿不动，就命令俘虏背枪到集中点。彭毓斌随先头部队闯过西漳河，仍没有逃脱“口袋阵”，他在距离漳河不多远的一个山坡前，被我狙击部队打死。他的副手中将炮兵司令胡三余等人，只得放下武器投降，他们带来的两个炮兵团24门大炮以及充足的炮弹，恰恰是我军迫切需要的。彭毓斌、胡三余带来的援兵20000人，和将级军官14人被俘。这样一来，我军的兵源得到了补充。

刘伯承司令员在打援取胜之时，当机立断：令陈再道、杜义德、孔庆德率领冀南纵队赶回冀南，积极扩充队伍，加紧准备邯郸战役。这一高瞻远瞩的部署，刘伯承曾形象生动地作过比喻：当你把一块肉放进嘴里，你的筷子得赶快夹住盘子里的另一块肉。刘伯承这时要啖下一块大肥肉，他命令太岳纵队、太行纵队部署追歼弃城逃窜的史泽波17000守军。阎锡山生怕史泽波再遭彭毓斌被歼的覆辙，于是立即电令“撤回临汾”。10月7日雨夜，史泽波率队西逃。8日，长治古城获得了新生。

刘邓命令陈赓、谢富治、王近山立即追击史泽波，坚决消灭这支阎家军，只有打掉阎锡山的老本，解放区才得安定，西大门才能长治久安。追击部队不顾土落阻击战的体力大量消耗，依然咬紧牙关，拼出全身力气，顶风冒雨，行进在山间崎岖小路上，吃不上饭，身上单衣挺着寒气，两天两夜，一起追到东西峪。三八六旅刘忠旅长向陈赓诉苦：“部队饿得不行，实在走不动了，搞点饭吃后马上走！”陈赓严厉地责备道：“可你要知道，敌人喜欢这样做的。”部队只得勒紧裤带又继续分两路前进。

10月11日下午3时，逃敌被压逼到桃川及其周围。夜晚，七七二团和敌人在将军岭打响，天刚明，总攻的信号弹升空，山炮弹、迫击炮弹、火箭炮弹集中地落在敌人主阵地上，轻重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目标。不到三个小时，桃川之战在上午八时半就圆满结束。俘敌5000余人，阎军六十八师和三十七师全部就歼。史泽波也当了俘虏。当他受到陈赓司令员接见

时，史泽波说：“抗战八年中，贵军在上党地区与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么快。真是老天助你们成功。”

陈司令说：“希望你今后能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打内战做些贡献。”后来，史泽波果然联合上党战役被俘的将官29名，发通电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罪行。

晋冀鲁豫军区李达参谋长总结上党战役时说，我方31500人，歼灭了敌人35000人（阎军只有3000人逃脱），而其中31000人都被我活捉，这是一笔宝贵的兵源啊！至于所缴获的24门火炮，2000多挺轻重机关枪和16000多枝长短枪，以及一大批弹药，正像歌曲的词儿：“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不久，上党以外的邯郸、邢台、焦作、滑县等近40个城市也得到解放。战后，刘伯承总结说，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人民战争与反人民战争的决胜，我们在这次所进行的，是为和平民主的人民革命战争，也就是人民的战争，八路军和人民在上党坚持了八年抗战，胜利了。他们却老远的来进犯我们，还从我们的手里占去我们用血肉解放出来的襄垣和潞安，这是八路军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太行山上的刘伯承对上党战役胜利概括为人民战争的胜利，而山西太原的阎锡山却垂头丧气：“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成群的乌鸦飞来院里大槐树上，呱呱呱叫得那么凶，我还派彭毓斌率兵增援，结果没有救出史泽波，连增援的两万人，也都送给了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在上党战役前后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正式组成第一、二、三、四纵队，相等于四个正规军，以东面冀鲁豫、冀南到平汉路西的太行和太岳四个军区顺序编组成立。新编组的纵队，由于兵源充实，每个纵队辖三个旅，每旅辖三个团，而且是三个营的正规团了。旅成立了山炮大队，由一门炮一个连，扩大为四门炮两个连。

（责任编辑：刘家驹）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 是不是总书记？

● 何方

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得先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因而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党史中关于向忠发被捕前为主席的说法，是与史实不符的。

再看博古。根据上述，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局不设总书记，有如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七大的发言中所说：“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苏区后，两个中央局合并的会上要推举一位中央领导人，竟然只称为负总责，就有点于理不通了。特别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书记处，却仍然设一个负总责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实际上，在中央苏区大家都一直称呼博古为总书记，这是延安整风期间也无人否认过的。至今一些老同志还是这样说。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列席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刘英，最近就多次谈到。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写的回忆，应该也是比较权威的吧。他在1943年12月所写的《反省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

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此外，他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不一一列举。张闻天这份《反省笔记》，整风中曾得到大家称赞。刘英说，“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们窑洞里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总之，博古任过总书记从来没人加以否认，怎么事过四十年后这总书记就一下和一律变成负总责了？

在大体弄清向忠发末年和博古进苏区后的任职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及其称谓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方面文献资料极多，为节省篇幅，下面只摘要列举数件。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证的。远的不说，只说平反后的就有：1979年8月27日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让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另一件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一再说过他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这是人所共知的；反面的说法有如李锐所述，“毛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

其他领导同志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就更多了。如伍修权两次提到总书记的话：“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伟大的长征》）“尔后又他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追求真理、锲而不舍——怀念张闻天同志》）杨尚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彭德怀自述》：“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黄克诚：“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不但党内，就是知情的党外人士甚至外国人，也都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1936年2月16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不过也应承认，无论是在国内外还是在苏区和红军中，朱德、毛泽东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连罗瑞卿在中央苏区任一军团政治保卫局长时还不知道王明。可见，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线后才出名的；博古、张闻天出任过总书记一事能够被长期埋没和不被承认，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张闻天本人，在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一再提到总书记。在《反省笔记》中除上引谈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如谈到遵义会议，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后边又讲到，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总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

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张闻天确实当过总书记。不然他一再让的是什么“位”呢？他始终说的是让出总书记，没有说让的是“负总责”。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反省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比较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人的赞扬，还由于他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长征以来的全部日记。据胡乔木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可见，张闻天在这时和这基础上写出的《反省笔记》，总比四十多年后别人的一些《回忆》可靠一些。

对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情况最了解、现仍健在的要算张闻天夫人刘英。她虽年近96岁，但仍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遵义会议后她接替了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的职务，专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委）服务，如照顾中央领导行军中的生活、安排开会、担任记录、进行联络等。中央到达陕北后又和张闻天结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会几乎每次都在他们家开，她多在场。派出或回来的负责干部向中央请示汇报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泽东的关系又特别好。可以说，直到1937年11月去苏联，在这以前三年的中央情况，她是了解较多的。为了了解张闻天这个时期以及后来的情况，从去年起我已拜访了她数十次。对于博古特别是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讲了许多生动细节以资证明，这里难以复述。她在张闻天平反后写的怀念文章，还是讲“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1982年以后，由于陈云提出没有总书记只有负总责，她为了尊重陈云、并在有关同志竭力

劝说下,此后写的回忆录中才把总书记改为负总责,只加一句“习惯称为总书记”。但在多次谈话中,她仍坚持张闻天那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掌握全局。毛主席主要管军事,自封“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她还几次谈到,1937年11月去苏联治病,共产国际和苏方都是以总书记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别墅。王稼祥领他会见季米特洛夫时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1938年一天,王稼祥秘密告她,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实行集体领导,洛甫不再是总书记,但还是书记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会议等。果然,等她1939年3月回到延安时,中央的会议已不在他们家而改到毛主席处去开了。

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除本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外,杨尚昆晚年谈得更具体可信。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说是由于毛泽东谦虚,让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据当时情况,这是不大可能的,也与毛的性格不合。他说过:“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一位党的总书记(就算负总责吧),不是政治局会议推举(当时常开会,照毛泽东的说法,“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议”),而由常委分工决定(实际上只是两个常委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可见,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党史上却一直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并未听说过的负总责。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要使党史跟着政治走,为当前现实服务。因此形势变了,党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着改。

从遵义会议到1937年12月,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因此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为首的人(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干得不错,因此获得“明君”之称。总书记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既拥有实权又具象征意义。所以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宁可让出全军的最高领导,也不同意张闻天让出这个可以代表中央号令全党、召集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总书记。在这三年中,中央多数领导拥护以张闻天为首,人们也都称他为总书记。“十二月会议”决定取消总书记称号,此后大家只称他洛甫同志(这时除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其他中央领导多以同志称之),不过他在群众场合被介绍时还是使用“我们党的领袖之一”的名义。整风期间,上下界限分得极严,中央情况下面很少了解,只知张闻天和周恩来检讨最深刻,过头之处很多,当时就令人无法理解。但整风中并无人否认他和博古当过总书记(只是有的说不合法),陈云也没提出他的“负总责”之说。

整风后期和七大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被排出中央领导核心,只能做一点调研以及后来的小范围地方工作和“授权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于过去的地位、名义和贡献,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没和封杀。

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后,没想到很快就否极泰来,粉碎了“四人帮”,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1959年庐山会议之完全错误及其严重恶果,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张闻天得到平反昭雪。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正式宣布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在这之前,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调查报告》中就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在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一时期,张闻天在党史中的总书记地位得到了恢复,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对此加以论证。

(责任编辑 杜晋)

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

● 杨第甫

1959年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旨本来是纠“左”，后来却变成了反右。正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庐山会议迷雾重重，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内幕才逐步揭开。当时在党中央，确实是一场尖锐斗争，又是一场很不讲理的斗争。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打进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因为彭德怀回湖南调查的时候他曾陪同，与彭交流时两人共鸣；在庐山会议上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时，他又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赞同意见，并且在后来毛泽东和他谈话时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不作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因此，周小舟被撤销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湖南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的思想观点同周小舟基本一致，他也被邀参加了会议，几乎被牵连进去，但毛泽东将他划了出来。按周惠自己的说法，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他是彭德怀的“墙脚”，要挖彭的“墙脚”。周惠坚不承认是彭的“墙脚”，但他毕竟安然无恙地回湖南任原职。

周小舟也是被当作“墙脚”要挖的，但他坚持原则，坚持道义良心，痛苦地担当了责任，



担当了“罪名”。1961年甄别平反时，我住在省委接待处，周小舟来看我，促膝长谈。在庐山挨了斗后，毛泽东给周小舟看《丘迟与陈伯之书》，要他“迷途知返，不远而复”，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谈了一个通宵，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批判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小舟流着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许多材料是我告诉

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小舟站起身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头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请他照顾妻室儿女。

回想起来，也就是1959年6月28日他去庐山开会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去他家闲谈。

我说：“上了庐山，在会议上，要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主，对左的错误作为例子来谈，不要作为批评的主要目标。”他听后在屋中绕了两圈，边走边沉重地对我说：“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毛主席是敬爱的老师，如果一切照老师的话原封不动，错了也不去纠正，那么认识不能发展，不仅热爱真理做不到，吾爱吾师更谈不上。”他决心将群众呼声和自己的认识在会议上向中央和毛主席如实汇报。他是抱着一颗纯洁的心上庐山的。

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也是按照原定任务，为总结经验，调整指标，提出19个问题，继续纠“左”来进行的。

会议开到一半，面临两种抉择：一是继续纠“左”，真心诚意地认真纠“左”，在指导方针、指导思想彻底转变，这在党中央是彭德怀的“意见书”，在湖南是周小舟的12点建议的精神，他们的意见是真正纠“左”的良方；另一种抉择是讳疾忌医，轻描淡写，认为“左”只是“头发卡子”问题。可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毛泽东不仅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的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反而停止纠“左”，把会议逆转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使“左”重新升级。

彭德怀在庐山的日记中写道：“我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7月16日由中办印发到会同志，7月22日各组经过六天讨论，对信完全同意的只有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个同志，其余在发言中大多数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但还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发表意见。”李锐说：“在庐山会议前一段‘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只有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撮人……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到主席面前进谗言，加油加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就促成毛泽东以为彭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

康生、陈伯达从“理论”上帮助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张闻天。说什么苏联搞社会主义革命十年出了布哈林反党集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十年又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这就不仅是魏延反骨，旧病复发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必然规律了。毛泽东乘胜追击，发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说：“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要斗下去，至少也要斗二十

年，可能要半个世纪。”又将党内因工作意见之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生死斗争上去了。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闭幕了，湖南上庐山参加会议的第一书记周小舟去北京作检讨，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和另外两个参加会议的书记处书记回来当晚就召开电话会，通知各地、市、县委书记安排好工作，到省里参加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主持。从8月22日一直开到9月15日，有1980多人参加。会议第一阶段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批判，重点自然是在周小舟身上。由于中央已经定了性，会议一边倒地猛烈批判声讨。发言者大肆宣传大跃进、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的成绩，用亩产几万斤的“事实”和公共食堂有多少条“优越性”来批驳周小舟的“右倾”，与周小舟划清“界线”。

9月4日，周小舟由北京回来，6日起在大会上接受批判，后来又在小会上批判，斗争更升了一级，似乎还要挖出更多的材料来，但又哪里有？也就从这个阶段起，我被隔离开来。他们如何批斗小舟及唐麟、方用等，我一无所知。由于我始终没有承认错误，所以对我处分最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场劳动！

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开过了，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样，我才算有了转机。

中央规定对周小舟是不予甄别的，他仍顶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帽子，中央调他到广州去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

临行前，小舟到接待处来看我，我们久未见面，谈话时，我谈到当时农村种种困难情况。小舟仍然责怪自己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没有能够制止浮夸风，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巨大损失，引为内疚。他喟然长叹：“教训是深刻的，眼见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我的心情不能不沉重呵！”

我们握手惜别，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小舟的最后分别。

（作者为中共湖南省委原秘书长）

（责任编辑 致中）

“东方魔稻”的发明人

袁隆平奇遇记

● 庄志霞 聂冷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被国际农学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和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他所发明的杂交水稻，人称“东方魔稻”，比常规水稻增产20%以上。自1976年开始推广至今，全国已累计种植30多亿亩，增产粮食3.7亿多吨，创造经济效益3700多亿元。另据统计，自1975年杂交水稻试种至1995年，我国耕地减少了442.6万公顷，而粮食产量反增加了16058万吨，这些新增的产量，基本上都是杂交水稻的硕果。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创造的这份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不仅确保了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惠及了全世界。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年统计，当年全世界水稻种植总面积为22.5亿亩。其中杂交稻2.2亿亩，约占总面积的10%，但产量却占了总产量的20%。如果将常规稻全部换种杂交稻，全世界水稻总产可翻一番，能多养活10亿人口。

—

1979年5月，著名的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水稻。美国是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的故乡。美国的种子靠向全

世界提供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种子，不知积聚了多少财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正是受到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的启发而萌生的。但是，由于杂交水稻研究实在太复杂了，所以，尽管洛克菲勒财团斥巨资建立了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结果该项研究被中国率先取得了发明权。

威尔其的商人脑瓜一转，便发现了又一个重大商机。他当即向中国农业部种子公司接待官员询问这个发明权的享有人是谁，提出想跟这个人探讨一下有偿转让技术专利的问题。不料中国种子官员一口包揽说，这个发明专利权属中国国家拥有。农业部种子就是代表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惟一代表。要探讨杂交水稻技术转让问题，无须再找“别人”，本公司即可说话算数。

威尔其经营的圆环种子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是最早跟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做生意，并受到列宁赞赏的西方商人。所以，哈默博士和他的下属们，都最擅长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大赚其“红色钞票”，还最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欢迎。哈默博士本人几乎受到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党政首脑的接见和宴请。他们也都知道中国一些官员最懂政治，而最没有经济头脑。跟他们谈生意，只要顺其所好，多说恭维



袁隆平在观察优质两系杂交水稻

话,要占便宜犹如探囊取物。因此,一听说跟中国种子官员在北京就可敲定此事,威尔其不由得内心一阵窃喜。于是,连忙恭维说,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好啊,一切高度集中,只要找到北京一位领导,全国任何地方的事都包办好了!接着,他便提出想先带一些杂交水稻种子回美国去试种一下,看看它们在美国表现如何。如果在美国也能显示优势,那么圆环种子公司准备以适当方式购买这项技术专利。

中国种子官员连忙表示,好说,好说。不要钱,先送给威尔其先生三个组合,各0.5公斤杂交稻种子。

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当年就把这三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子播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到收获时,跟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 Starbonnet 一比,产量要高出165.4%—180.3%。美国人不禁被惊得目瞪口呆,一齐把它们惊呼为“东方魔稻”。

于是,威尔其先生又一连两次来到北京与中国种子官员正式谈判。最后一次,双方于1980年1月达成协议,由圆环种子先付给中国种子20万美元首期技术转让费,中国即派出制种专家赴美国传授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专家在美工作期间,由美方支付工资,直到美国科技人员熟练掌握该技术为止。以后

在美国生产的杂交稻种,由圆环种子公司在美国、巴西、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六国范围内销售,每年从销售总收入中提成6%付给中国种子作为后续报酬。

就这样,这项杂交水稻制种技术转让协议,便在北京由中国种子连本带利一手包揽了。这是在杂交水稻发明人和他所在的湖南省农科院一无所知、一无所得的情况下,毫无知识产权观念的中国人与世界作成的第一宗知识

产权交易,它开创了我国现代科技史上的第一项科技有偿转让纪录。不管它的经济效益如何,作为中国科技进步和知识有偿概念开始建立的一个象征,它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没有任何人感到这有什么不合理。全国的报纸、电台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或新闻联播中,兴奋无比地报道了这宗足以令全体中国人深感骄傲和自豪的科技出口转让买卖。

连发明了杂交水稻的袁隆平本人和他所属的湖南省农科院也没有感到丝毫不满。全国都还没有什么发明权、受益权的概念,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有。一切属于国家,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所以消息传到湖南,大家也都是欢欣鼓舞,喜气洋洋。尤其是袁隆平,当得到农业部外事局叫他带队赴美国传授技术的通知时,他竟高兴得一夜合不上眼,打心眼里深深地感激中国种子公司赐予了他这次到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去一展身手的机会,而根本就没想到实际上恰恰相反,美国人首先要找的对象本来就是

他。袁隆平回家收拾行装的时候,兴奋地对妻子说:“邓哲,看样子,我们的穷日子快要结束了。我这次去美国工作4个月,国内工资照发,美国公司还每月另发3000美元报酬。3000美元就是6000元人民币呀!你想想看,有这一趟

美国之行,我们就要成万元户啦!”

“对我们这样的穷家来说,钱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身体和安全哪!我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出去,平平安安地回来就好。你可得自己保重。”邓哲既欣喜而又不无牵挂地说。

二

1980年5月9日,当地时间上午9时,袁隆平作为首席专家,携湖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一吾和慈利县良种场场长杜慎余一行三人组成的中国杂交水稻专家组,乘飞机到达洛杉矶。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和美国专家数人已打着牌子在机场迎候。当三人走下飞机舷梯,向撑着牌子的威尔其一行微笑着走去时,威尔其等人便看出是他们的中国客人来了。于是,威尔其连忙满面笑容热情地迎了过来。但可笑的是,他与第一个向他伸过手来的首席专家袁隆平只是礼貌性地轻轻握了一下,就放过去了,而却紧紧地握住第二位接上来的陈一吾副研究员的手,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口里一叠连声地欢呼着:“您好,尊敬的袁先生!我是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真诚地欢迎您的到来,能够结识您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并在美国接待您,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弄得陈一吾尴尬不堪。

显然,威尔其认错人了。原来,威尔其虽曾数度赴中国谈判引进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但却一次也没见过这项技术的发明者袁隆平。在他的想象中,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自然应该有着一副养尊处优、器宇轩昂、书卷气十足的派头。而实际上,这位袁大科学家却偏偏脸皮黝黑,其貌不扬,活像个勤劳朴实的田间农民;杜慎余则更加于朴实之中,还透着几分拘谨;所来三位中国专家中,惟有陈一吾最为潇洒气派,比较符合他想象之中的那副大科学家形象,所以,他一眼便认定,这位肯定就是首席专家袁隆平了。

一见这情势,三个中国人不由得一齐掩口而笑。威尔其见客人笑得蹊跷,不由得心里一愣,但他马上就会过意来,为了掩饰尴尬,干脆

作了一个幽默的怪脸,跟着客人放声大笑起来。一面耸肩摊手表示遗憾,一面连声道歉说:“对不起,你们哪一位是袁先生?”

陈一吾连忙推过袁隆平用英语介绍说:“威尔其先生,这位才是首席专家袁隆平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助手。”

“噢,尊敬的袁先生,我认错人了。请您原谅!请让我再次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欢迎。您将是我们公司和所有美国人最尊贵的客人和朋友。我衷心地祝愿您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得愉快!”威尔其说着再次握住了袁隆平的手,并紧紧地拥抱、贴脸。

“感谢您的热情迎接,威尔其先生。您认错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连许多中国人都会把我认错,更别说美国人了。我是一名水稻专家,长年在田间试验,所以浑身上下都染上了不少中国农民的色调。”袁隆平说着,又风趣地朝两名中国同伴一摊手接着说,“他们都知道,我还有一个绰号,叫做‘刚果布’,也就是‘非洲黑人’的意思。您说这多有趣?”

宾主一番寒暄后,即登车同赴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由三位中国专家为美国科技人员授课和示范,传授杂交水稻制种技术。当夜,威尔其在该实验站所在的埃尔森特罗市的一家饭店里为中国专家举行小型晚会。晚会间,威尔其亲自演唱歌曲欢迎中国客人,并请客人自由表演节目。陈一吾不善于演唱,杜慎余只会哼毛主席语录歌,于是他们两人都不愿表演,一齐推袁隆平出个节目,免得显出中国专家呆板。袁隆平从小爱好文艺体育,学生时代就曾参加过西南农学院的合唱团,在安江农校工作时,也常拉小提琴为学生演唱伴奏。因而他毫不推辞,拿起话筒大大方方走到演唱位置,一首忧伤的早期美国电影插曲《老黑奴》便开始在晚会厅里鸣响。他的嗓音低沉淳厚,曲调节奏把握准确,英语咬字清晰,感情真挚,把一名美国南方老黑奴的悲凉晚景表现得非常到位。演唱完毕,小厅里顿时寂然,一向欢乐无忧的美国人一时间全被歌曲带进了历史上那悲惨的黑奴世界,连几名白人小姐眼里都闪出了泪光。良久,人们才从歌曲的情境中回过神来,于是,惊喜的掌

声、赞美声顿时轰然而起……

三

中国杂交水稻专家来美传授制种技术的消息，很快被当地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广为传播，在美国稻作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加州大学农学院随即邀请袁隆平与该院教授和研究生座谈，为他们解答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有关原理问题。不久，全美水稻技术会议又特邀他出席介绍中国杂交水稻研究情况。5名意大利水稻专家闻讯专程从意大利赶到美国加州，与袁隆平座谈探讨水稻杂交技术问题，并邀请他赴意大利讲学。

连声名显赫的哈默博士也专门抽出时间来亲自与他会见，并请他出席西方石油公司股东大会，和他一块坐在首席，把他作为西方石油公司最尊贵的朋友介绍给全体股东。

“袁先生，非常欢迎您来我们公司作客。我也感谢您的伟大发明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商机。我看得出，您确实是一位毫无功利之心的中国式纯粹科学家。你们的精神境界，用我们西方的价值观念，是无法理解的。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您的科学发明可能正孕育着一个新兴的产业，和一个遍及世界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千万亿美元的新创财富，足以使世界崛

起10个西方石油公司规模的新型财团。光是中国市场，就可以使您成为第二个‘洛克菲勒’啊！哈哈！”哈默博士朗声笑着说。

几个月的教学活动在尊重、友好、愉悦的情境中，很快就结束了。归国时路过旧金山，旧金山电视台和当地《华侨日报》又特派记者跟踪专访。旧金山是美国华侨华人主要聚居地之一，节目和消息播报后，唐人街顿时为之振奋。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向来只见中国人来美国学习科学技术，没想到现在竟有了一批中国人来美国传授科学技术，而且，这项技术还是通过商业贸易途径，由美国人出钱买过来的！可见祖国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实在大快人心，可喜可贺啊！

四

9月初，远渡重洋自美国归来的袁隆平，又翩然回归了妻子所在的安江农校那套低矮寒碇的小平房。他以一副健康如常的身板，按爱妻的亲切嘱托“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但是，他曾向妻子许下的将成为万元户的诺言，却连吹牛皮都算不上，只成了一个不吹自破的泡影。原来当时有规定，出国人员在海外所得收入必须全部上缴。因而，他们回到北京，向农业部有关司局一汇完报，有关办事官员就要他们上缴在美国挣的工钱。

他们有点想不通，国家已经从这项科技贸易中获取了数十万美元现利，难道个人就连一点工钱都不该得吗？但不管怎么样，三个人还是老老实实先把美元如数上缴，又按规定领回每人每天1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20元的境外生活补贴费，4个月每人共计各领得2400元人民币，各自回家向老婆交账而去。

袁隆平有点不好意思



袁隆平(左一)与科技人员在田间

似的对妻子邓哲说：“嘿嘿，真对不起。我原以为美国工资可归个人所有，谁料农业部规定得全部上缴，只能每天领2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

“能成千元户也不错呀，我们家还从来没见过一次进两千多块钱呢！”邓哲安慰丈夫说。“我只要能

增加两间小平房，有三四千块钱存款以备不时之需，就心满意足了。”

邓哲这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以袁隆平为首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发明的籼型杂交水稻荣获该项大奖。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方毅、万里出席授奖大会。国务院专电致贺。方毅副总理亲自授奖。由袁隆平代表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登台领奖。除奖章和发明证书由袁隆平带回湖南保管外，一共10万元奖金，由当时的国家科委按照民间传统的“上山打虎，见人一股”的办法，略有差别地分发给所有到海南岛参加过杂交水稻学习研究的全国各地科研人员。袁隆平本人足足分得这项特等奖金5000元整。

“哎呀！五千块钱啊！啧啧，这么高的奖金，真吓死人了！”当袁隆平喜不自禁地自北京归来，从兜里掏出一大叠钞票交到妻子手里时，邓哲惊喜得连钱都不知该怎么拿法了。

没过几天，更好的日子又来到了。据农业部通知，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为扩大杂交水稻的宣传，在有关国家打开杂交水稻种子的潜在市场，准备于7月派出一个电影摄制组来湖南拍摄一部题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



袁隆平(左)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实验室内

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的纪实影片。现在影片脚本已通过我国有关部门审查同意，袁隆平将是影片里的主角。为了不丢中国人的体面，必须使袁隆平的家庭生活条件看上去像个中国一流专家的样子。具体标准是，必须有独户居住的花园小洋楼，客厅里

要有沙发、酒柜和电视机；厨房里要有冰箱；室外要有网球场和游泳池。

这一下可把湖南省农业厅、农科院和安江农校各方面都忙坏了。6月得到通知，7月电影就要开拍。这住房设施无论如何建不及啦！好在安江农校刚刚建成了一栋相当漂亮的科研小楼，让他一家8口搬进去住倒正好合适；只是少了厨房和卫生间，这也不打紧，靠着小楼后侧再加盖两间小平房，看上去也浑然一体很是紧凑。于是，住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电器、家具让袁隆平自己买一些，学校借一些，包装一番，也就很有点专家居室气象了。至于室外设施么，花园虽没有，但整个安江农校绿树成荫，花果飘香，环境十分幽雅，这就足以代替私家花园了；网球场没有，但是学校有篮球场、田径场、简易体操场可以代替，反正专家原本就不爱好网球而喜欢篮球。游泳池没有不行，因专家正好最爱游泳；又恰好小楼旁边有一口池塘，用砖石水泥铺底砌岸，装上进、排水管道，安上钢梯和扶手，半个月工夫也就弄好了。

于是，7月，当美国电影摄制组组长劳克先生率领着他的小组来到安江时，袁隆平的家居已俨然是一派初级阶段的美国中产阶级模样了。

“喔，好极了，袁先生。您真会选地方，这里的环境简直美极了。这个大院的资产肯定都是

您的啦！”劳克先生羡慕地说。

“不是的，劳克先生。我们中国科学家的生活设施都是国家配给的。这里的一切设施我都可以无偿享用，但不能说是我私有的。只有我房子里面的东西才是属于我私有的。”袁隆平不禁有点哭笑不得，他一面大体真实地回答着，一面心里想，刚刚还住在低矮的小平房里，连现在家里的家用电器还是公家借的呢，眨眼间就被人看成是一个数百亩园林，和数百万元房产设施的老地主了，真有意思！

这部影片，后来，除在美国、巴西、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6国放映外，1983年7月还被日本各电视台拿去，在全国各地播放。“东方魔稻”的神奇魅力，更加使世界为之倾倒。日本某出版社甚至出版了一本名为《神奇水稻的威胁》的书，惊呼“杂交水稻这一海外传奇给日本带来了风暴”。更有人将杂交水稻赞誉为中国继古代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鉴于袁隆平的国际影响，他的生活条件问题也确实不可忽视了。于是，电影拍完后，各方面再也没叫袁隆平重新搬回旧房里去住，而让他在这所新宅里正式安居了下来，直至1990年他的夫人随调长沙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时为止。

五

巨大的成功，并没有使袁隆平陶醉。作为一名眼界开阔、深谋远虑的先驱科学家，他深知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各国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激烈无比，一个人要想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持续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殊非易事，稍不小心打个盹，就可能被世界甩在后排。因而，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1984年，他主持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1986年10月，他在长沙筹备召开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题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高

屋建瓴地提出了今后杂交水稻研究的战略设想，即育种方法由三系发展到两系再到一系；杂种优势的利用由品种间发展到亚种间再到远缘间；方法上由繁到简，功效则由强发展到超强。这一战略设想，当即被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名与会专家、学者誉为“袁隆平思路”，成为全世界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者所共同遵循的不二法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也被国际同行们赞誉为杂交水稻的“麦加”。

1987年，他受命担任国家“863高科技计划”101—1专题组责任科学家（即组长），负责组织全国的十数家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杂交水稻的协作攻关研究，使杂交水稻的生产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1992年起，他应联合国粮农组织之聘担任该组织首席顾问，连续多年先后多次赴印度、埃及，以及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作杂交水稻科学指导。他还利用自己崇高的国际学术声望，年年应邀参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年会，为本研究中心6名青年科研人员争取到了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资助，大力培植杂交水稻研究的高级后备人才。

1995年，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袁隆平出任中心主任。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在这一年，他又指导本中心研究人员为解决长江流域早稻米质不良问题，打开了突破口。与此同时，他新开辟的杂交水稻结合基因转移工程技术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1999年，美国《科学》杂志专文介绍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选育理论。同年，在他的指导下选育出来的几个超级杂交稻苗头组合，经全国20多个数百亩连片的大田试验点的生产性实验，最高单产达到每公顷17吨（合亩产1133公斤多），大幅度地超过了国际稻作界普遍认定的每公顷15吨的水稻单产理论极限。2000年3月31日，国际水稻学术大会在马尼拉召开。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与会。人们再次为中国超级杂交稻的高产性能感到震惊。因为此刻，比袁隆平早好几年提出超级稻育种计划的日本和国际水稻所，连

他们分别制定的每公顷12吨的超级稻产量指标都还未能实现，而中国的超级杂交稻苗头组合已经在大面积试种中遥遥领先。此前的3月28日，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其故乡内湖省实验农场视察从中国引进的杂交水稻时，已经获悉中国超级杂交稻超高产的信息，为此，他在实验田头兴致勃勃地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即兴讲话，盛赞中国新型杂交稻的广阔前景，声称菲国将以政府行为大力推广新型杂交稻的种植，以尽速解决该国的粮食短缺问题。



1998年列支敦士登国家元首以私人身份访问袁隆平教授(右)

六

进入90年代以来，尽管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课题研究仍然需要国家大力资助，但袁隆平本人却差不多已经成了被国际国内许多人一致看好的一棵“摇钱树”。1994年，美国休斯顿水稻技术公司继美国圆环种子之后，又一个开始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提议合作开发两系法杂交水稻种子国际市场；1999年7月，越南驻华大使馆新任科技参赞阮加胜一上任，就给袁隆平来信，希望袁隆平在越南建立杂交水稻生态实验点；随即美国商务处又来电，希望合作开展杂交水稻种子国际市场开发。而国内，除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本身必须开辟杂交水稻种子国际市场之外，湖南省农科院、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等众多单位，无不希望利用近水楼台的有利地位，抱着袁隆平这棵长青之树摇出大把钞票来。国内外合作者一致要求借用他的名字来注册公司名称和商品的商标品牌，中心党委还决定要拿他的名字作为所属公司的无形资产，去请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授权

的评估事务所做无形资产估价，为以后“袁隆平”股票上市做铺垫。

这常常使得袁隆平颇为尴尬。进入90年代以来，袁隆平虽然对于杂交水稻种子的国际国内市场开发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并且不再反对合法的赢利了。但是，作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加上他的一贯性格和为人，他不可能主动站到市场的风口浪尖上去呼风唤雨，他更不愿意用自己的姓名去充当市场的品牌，认为那样很不严肃，且实在有点担心那会有损一名科学家的清名。但为了杂交水稻研究事业的兴旺发达，他又无法拒绝科技与市场的接轨，以及相应的市场开发运作。结果，他终于被时势，也是被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拖下了水，不得不让自己所信任的开发者们，在市场的汪洋中树起了一杆袁隆平的旗帜。

美国休斯顿水稻技术公司是袁隆平在众多的国际合作对象中选定的第一个可靠合作伙伴。该公司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航天发射基地旁边，有54万亩耕地，100名职工，既搞水稻的生产和大米加工，又开展水稻技术研究。其总裁安格尔斯是袁隆平的老朋友。但安格尔斯不是公司的真正老板。这家公司的总后台是欧洲小国列支敦士登国王亚当汗二世。列

支敦士登只有 160 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2.9 万人口,但是其皇族财产高达 528 亿美元,比英国皇族的财产还多 12 倍。亚当汗二世国王本人就拥有财产 28 亿美元。因此,这家公司的信誉度是很高的。

经过多年友好协商,到 1997 年,双方终于议定,由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科技成果作为无形资产占 51% 的股份控股,由美国休斯顿水稻技术公司投资 1000 万美元,占 49% 的股份,联合组建“袁隆平杂交水稻种业有限公司”。该合作协议经国家批准,双方于年底在长沙正式签字,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正式注册了“袁隆平牌”和“农平牌”商标。一个跨国公司终于建立起来了。这对加速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市场开发来说,当然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好事。美方公司也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对袁隆平品牌的杂交水稻种子市场充满信心。

为了表示诚意和友谊,安格尔斯干脆于协议签定不久之后的 1998 年元月,请出总后台老板列支敦士登国王亚当汗二世陛下,以私人身份亲自来到长沙,对合作协议的签定表示祝贺。这使袁隆平很受感动。

而与此同时,湖南四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在长沙宣布,通过 210 天,对 11 万组数据资料的严格审查论证,评定“袁隆平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为 1008.9 亿元。接着,湖南也决定由省农科院牵头,联合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等 5 家法人股东,共同出资筹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两个大股东,湖南省农科院占有 55% 的股份,袁隆平领导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占有 25% 的股份。公司经审查批准注册后,向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申请发行股票。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美国水稻技术公司执行总裁安格尔斯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袁隆平竟然“一女嫁二夫”,在已经与他们合资合作的情况下,又在国内与别人合资另创一家名称品牌几乎相同的公司,那以后谁知道他会把屁股坐在哪一边呢?即使确信他会将两个公司一

水端平,也在市场上给美方股东制造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必然要削弱美方赢利的幅度。总之,不管怎么弄,袁隆平都是两边得利,而如果有牺牲的话,那么牺牲的则必定是美方股东。这种竞争,对美方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安格尔斯从来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因而当时在拟订协议时,条款上并没有写明是否允许“袁隆平”“一女二嫁”的问题。但按照国际惯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于是,安格尔斯紧急飞赴长沙与袁隆平磋商此事,并明确表示,“袁隆平”作为公司的冠名和商品品牌名称,只能属于一家。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要么跟美方合作,要么跟国内伙伴合作,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否则,美方只得要求退股。并且在言谈间,难免对袁隆平的“一女二嫁”做法流露出某种程度的遗憾。当然,安格尔斯有理由怀疑袁隆平是否是在有意识地算计他们。

但是,事实上,袁隆平原来却真的不知道他那宝贝名字不能同时属于两家公司所有。他更不可能知道老朋友安格尔斯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怀疑他。他原本确实希望两边合作,两家公司都兴旺发达。但他不知道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使安格尔斯相信和放心的,而且客观上,将来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竞争时,他也确实无法保持平衡。因此,直到安格尔斯来到长沙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他才明确了安格尔斯的心思,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不能不使他感到了一阵为难。

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家的利益来考虑,与美方合作,伙伴单纯,关系容易处理,立即就可以引进 1000 万美元的资金,而且本中心占有其中 51% 的股份,作为控股者还享有经营权。与国内合作,则伙伴众多,关系复杂,只在合资份额中占有 25% 的股权。孰轻孰重,即使是他这不解市场奥妙的纯粹科学家也能一目了然。

然而,与美方合作就不能不抛弃国内伙伴。而国内是一些什么伙伴呢?湖南省农科院是自己的发迹之地,而且自己至今还兼任着该院的名誉院长。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是紧

邻隔壁的兄弟单位，此外，还有省领导的意图和期盼等等。这一切都能轻易丢得开吗？况且，说到底，自己毕竟还是一名中国科学家，当国内志士们有兴趣，有能力组织起来开发这一领域时，引进外资的目标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尽管从小单位来讲，要丢失一部分利益，但丢失，也是丢在中国人自己碗里。而与美方合作，则将有49%的利益要分给美方。这样一想，除了国内合作，他便再无选择余地了。

不过这一来，倒叫人觉得有点对不起安格尔斯了，还有那位自称连做梦都想见到自己的国王陛下。好在安格尔斯还算开通，一看袁隆平并无恶意，也就好说好散，收回原拟建立合资公司的1000万美元股金就打道回府，而与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合作也继续保持了下去。一个正要开始营业的跨国公司就此无疾而终。

1999年6月29日，湖南“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宣告正式成立。有的媒体把袁隆平描绘成中国科技界带头转变观念挺进市场的“时代英雄”。可实际上他却始终处在一种半推半就的矛盾心境之中。也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说，他在组建公司这件事情上，始终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尽管如此，袁隆平公司的开市势头却健旺得很。有人说，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一只科技老虎下山了。股票还没有投入发行，就有许多精明的股民把电话打到袁隆平的办公室里甚至家里，咨询有关情况。但股民们也许难以置信，其实，袁隆平对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股票的运作情况和有关知识，也许掌握得还不如他们多，最起码也不会比他们更多。只有一点袁隆平心里是清楚的，进入21世纪之后，光中国国内市场每年就需要杂交水稻种子9亿斤以上，仅以每斤种子税后利润1元计算，杂交水稻育种的年纯利润就将在9亿元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杂交水稻种子的国际市场利润还将超过这个数值，可见这个新兴产业的前景

确实是非常之诱人。

对于袁隆平的巨大贡献，中国的亿万农民有一句话最为生动和朴实的评价，他们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邓小平送来了好政策，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1995年，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发首届“何梁何利科技奖”，他是国内生物学领域获该届奖励的唯一一名科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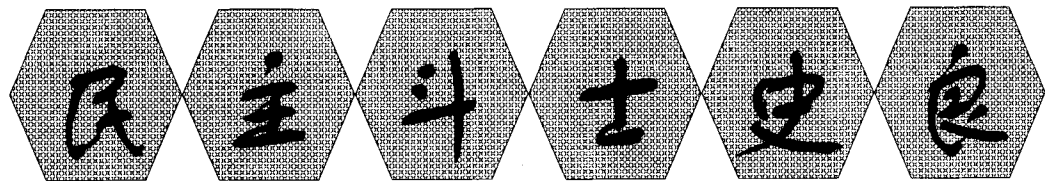
党和国家也给了他无比崇高的荣誉。1999年10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批小行星命名仪式，其中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11月2日，他又获得国家授予的“全国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员”奖章，并作为代表发言。

众多的国际同行和关心农业与粮食问题的各国有关学者以及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等等，更把袁隆平尊为“杂交水稻之父”，把杂交水稻在世界范围的推广普及称为全球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认为它将是解决下世纪人类吃饭问题的一大法宝。各国政府有关要员和民间组织首领都把他延为上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和粮农组织，美、英、日等各国学术教育机构，以及民间基金组织先后授予他“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国际先驱科学家”等八项奖金和荣誉称号。

(责任编辑 舒元璋)



袁隆平与夫人邓哲(右)、三儿媳(中)在家拉琴唱歌



● 赵纪军 杜秀娟

1949年5月23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十兵团在强大的地面火力掩护之下向国民党上海守敌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我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突破敌外围防线，直逼市区。第九兵团某部以快速勇猛的动作，迅速前出至霞飞路。当部队进至交通大学附近时，搜索分队突然发现街边有人影晃动，立即分路包抄过去，等靠近时，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

后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人员惊奇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民盟上海执行部主任——史良！

（一）青春之曲：中国妇女最大的责任是救国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幼年时家境贫寒，13岁才进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毕业后考入常州女子师范。

在女师期间，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激进，性格坚强，在学生中崭露头角。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女师学生会会长。当时，女师和男师及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她被推为联合会副会长兼评议部部长，成为常州学运的领导者之一。

史良于1922年暑期从女师毕业后，先后入上海女子法政学校、上海法政大学和上海法科大学学习，开始学政治，后改习法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她是一个积极参加者，还主编过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1927年暑假，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

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由于史良思想倾向进步，一度被捕入狱，旋为蔡元培先生保释。其后，史良又到镇江江苏省妇女协会工作，任常务委员兼总务。她们出版了一种名为《女光》的刊物，为打破妇女种种枷锁而大声疾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震撼了当时在上海的史良。事变以后，史良自觉地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广大妇女宣传进步思想。1932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各界召开庆祝大会，史良向广大妇女疾呼：“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要解放我们妇女，必须首先解放我们的民族，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史良的演讲博得了群众的掌声，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惧和嫉恨。1932年初，史良参加了中共为营救被捕蒙难同志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并任该会律师。从此她和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党的忠实盟友。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曾遭到敌人的极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及其他爱国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地下党通过互济会和鲁迅、周扬领导的左联同史良联系，请她设法营救。史良认为营救政治犯，多保存一些民族精英，替革命做一点事情，这本身不仅是爱国行动，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因此她不避风险，全力以赴。先后被史良营救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邓中夏、李瑛、熊瑾玎、艾芜、任白戈、陈卓坤等。

（二）救国之恸：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一九三六年史良（前排左二）、沈钧儒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华北危急。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群众沸腾起来。12月，上海市文化界发表救国运动宣言。这时一向争取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史良，率先倡导筹备妇女救国组织。12月22日，史良与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上海市第一个救国会组织。在成立大会上，史良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人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做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她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妇女走出家庭，奋起救国。大会选举史良为妇女界救国会的理事。“妇救”的成立及其救国宣言的发表，不仅对当时上海学生的抗日游行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而且也对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

在“妇救”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职业界、学生界、教育界的救国会相继成立。在各个专业救国会组织的基础上，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正式宣告成立，史良被选为文化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在上海救亡运动的影

响下，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抗日怒潮。1936年5月31日，上海救国会联合华北、华南、华中等二十余省的爱国救亡组织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抗日宣言，选举宋庆龄、史良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为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和史良被推派到南京请愿。7月13日，史良等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会场，向大会提出：停战、抗日和保障民权等要求。得到了各地救国会和新闻界的支持。史良等回上海后，开展了大规模爱国救亡宣传运动。为了支援绥远抗战，救国会组织了三百多个宣传队，两千余人，分别走上街头，开展绥远募捐活动，动员群众数万人之多。上海的绥远运动又影响了南京、华北、华南、西北等地，成为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对敌共御外侮，由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同志出面，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公开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毛泽东写信支持这一政治立场，张学良、杨虎城甚至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示赞同救国会的这一主张，从而把爱国救亡运动引向了高潮。9月18日，救国会举行了游行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在这次游行中，面对反动军警的镇压，史良临危不惧，向敌人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遭到敌人的

疯狂镇压。为了营救一位被军警殴打的女学生，史良上前保护，亦遭毒手，肺尖因被打伤而咯血。幸好工人群众及时救护，史良才幸免于难。为了痛斥国民党军警毫无人性的暴行，她在医院疗伤时写了《九月的鞭笞》一文，最后一句话说：“我们苏醒的群众将会一天天加多，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史良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吓倒，斗争的热情反而更高。10月19日，鲁迅先生于上海逝世。在宋庆龄的提议下，丧事由救国会出面筹办。在筹备时，史良与沈兹九、胡愈之等人共同商定：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救国会的努力下，鲁迅先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各界民众瞻仰遗容和吊唁三天，最后送葬的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由于史良等人的发动，六七千人的送葬队伍，妇女群众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他们浩浩荡荡，唱挽歌，呼口号，声震寰宇，气壮山河。蔡元培、宋庆龄也参加了葬礼，史良和其他救国会的领导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列。11月12日，“全救”又在上海静安寺路举行了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大会响应和支持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并在现场组织了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募捐四万余元，支援罢工取得了胜利。

（三）铁骨之铮：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决不接受

“全救”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恼怒，他们先是企图暗杀史良等人，后来慑于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不得不改为通缉。11月22日深夜，反动宪警逮捕了史良等七名救国会的领袖，制造了闻名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史良入狱后不久，就获保释。可是敌人很快就明白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追悔之余，又四处悬赏捉拿史良。12月30日，史良在安排好救国会的组织工作等有关事宜之后，又主动投狱，到法庭上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七君子先是被押解到法国巡捕房，尔后遣往法院。因为没有犯罪证据，结果交保释放。史良被放出来后，暂避在朋友家中。11月24日深夜，反动派再度实施拘捕。六君子未经审讯，即

将他们送到苏州监狱。史良因“拒捕”，成了反动派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在追缉期间，史良为了保护组织和其他救国会同志的安全，终日繁忙地交待工作，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等一切就绪之后，她便主动去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被关于苏州前司街女看守所。

“七君子”被关押六个月后，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罗织了“十大罪状”，对他们提起公诉。史良等人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于是他们便拿起法律武器，进行了雄辩有力的“答辩”。6月11日正式开庭审判，“七君子”把法庭当作讲坛，用最明晰、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救国会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同时把起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驳得体无完肤。他们义正词严地向审判长提出质问，常常使审判长理屈词穷，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法庭对“七君子”采用逐个隔离审讯的方式，使他们互不通气。史良独坐女监，孤军作战。但她始终与六君子保持着言论、行动上的一致。当审判长讯问：“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你们主张要联合各党各派，这不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吗？”史良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回答：“救国会的意思是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是抗日不抗日。一致抗日救国，是全国大众的要求，不是跟着共产党喊的口号。”“七君子”的合法斗争使反动派无计可施，两次开庭审判都宣告失败。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通过头面人物进行劝降活动，向他们提出只要进反省院，前门进，后门出，转一转就算了，并不真正执行。史良等认为，这个方案是对中国人民和爱国人士的侮辱，表示“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决不接受。”

1937年7月5日，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入狱运动”——愿为抗日而入狱。这场运动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鼓舞了广大的爱国群众。两天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自由释放。

（四）歧路之音：我不愿参加国民党

自由以后,史良就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一道到港澳宣传抗战。不久国民参政会成立,史良担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成为国民参政会中宪政促进会的唯一女性。史良在参政期间,为要求国民党实施民主和妇女参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她力争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权利。她提出在国民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应占一定的名额,并且建议妇女工作者,要到下层去,到城市、到乡村的妇女群众中,进行有关参政的宣传教育。

在汉口和重庆时,史良还参加宋美龄领导组织的妇女团体指导委员会,被聘为委员兼任妇指会联络委员会主任。她运用联络委员会的组织,广泛联系和团结各地妇女团体和中上层妇女,对扩大和加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和文化事业组组长沈兹九、训练组组长刘清扬一起,遇有重要事情,都与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团长邓颖超和张晓梅等同志商量。她们支持和依靠会内的地下党、进步青年,在农村、工厂和报纸刊物上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抗战政策。她与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在个人间的交往是不错的,但是彼此的政治观点迥异。有一天,宋美龄请她吃饭,蒋介石也在座。在吃饭中间,蒋介石说:“史先生,你们讲国民党腐败,国民党需要新鲜血液,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一道对它进行改革呢?”她当即回答说:“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和主张,我不愿参加国民党。”蒋介石听后非常不悦,此后便处处找借口对史良进行打击报复。

1939年底到1941年,史良亲闻目睹了国民党向陕甘宁发动武装进攻、制造“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包围聚歼的倒行逆施,怒火填膺。为了表示抗议,史良和救国会的其他同志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末次会议。并于1942年宣布退出蒋介石的国民参政会。同年,史良又宣布退出宋美龄所组织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史良的参政员生活结束以后,救国会在民盟的邀请下集体加入民盟。史良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兼重庆市委委员。在此期间,

史良积极配合陶行知先生创办社会大学,培养进步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史良除了把精力放在开展民主运动以外,还同妇女界的爱国进步人士一起致力于沦陷区妇女儿童的保护和养育工作,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重要发起人,并担任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及该会设计委员会主任。保育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两万多儿童。此外,史良还担任了进步妇女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常务理事。联谊会团结各阶层爱国妇女,为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政治民主进行了很多斗争。抗战胜利后,联谊会在重庆、上海、北平、昆明、南京、成都等地都成立了分会。这些分会,尤其是上海联谊分会,为以后史良在上海开展民盟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史良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坚决抵制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1945年8月,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议,认为它原先的政治纲领已不能适应抗战以后的新形势,因此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并根据它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发展改组了机构,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当选为主席,史良被选为秘书长,陶行知和邓初民分别担任了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中国人民救国会提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并提出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根本原则是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民主主义的文化。

(五)奋斗之号: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而国民党背信弃义,一面在协定上签字,一面却下达了“剿匪”密令,向各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共产党下达指示,立刻在全国范围发动反对内战的斗争。正是在这时,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血案”,镇压学生的反内战爱国运动。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民盟出面组织大规模的支

援斗争。在李公朴、陶行知和史良的具体领导下，联合了二十二个进步人民团体，发动签名，征集挽联，筹备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公祭大会。当时，大一点的会场都被国民党所控制，史良以大律师名义，托称代当事人某大爷租下了长安寺寺院办“丧事”，于12月9日，在长安寺举行了可歌可泣的“陪都各界公祭昆明一二·一反对内战死难师生大会”。三天的公祭大会，前后有几万人参加。它团结了各界进步团体，动员和教育了广大群众，为政治协商会议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影响。

随后，这二十二个人民团体又组织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先后在沧白堂举行了八次群众大会，发生了著名的“沧白堂事件”。史良是协进会的组织者之一，她亲自主持大会并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作面对面的斗争。当政治协商会议停滞不前时，重庆大中学校万余进步师生举行民主大游行。民盟接应游行的总指挥就是史良，指挥部就设在史良的寓所“犹庄”。

在全国人民的斗争和压力下，政治协商会议终于达成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协议。这二十二个人民团体，又组织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史良也是组织者和主席团成员之一。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较场口血案”。史良从特务吼叫厮打的重围中冲出会场，周恩来同志把她接上车，非常坚定地对她说：“黑暗的反动势力是不会长久的，人民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史良没有回家，而是立刻到民生路178号，召集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商讨斗争对策。晚上，又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次会议以后，史良不惧敌人的虚声恫吓，坚决为受伤人士代理诉讼，以伸张正义。

当时，残暴成性的国民党特务已无所顾忌，到处逮捕、暗杀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7月，著名民主爱国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杀害，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公愤。史良等人化悲痛为力量，在重庆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群众性追悼会。在会上，史良慷慨陈辞：“烈士们为什么而死？他们是为中国的和平、民

主、团结而死；烈士们是被谁打死的？他们是被那些不要民主，不要团结的人打死的！”史良的话音刚刚落地，全场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复仇口号。此后，史良又应邀出席了上海各界李、闻追悼大会，通过大会发言，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

1946年10月，民盟拒绝出席国民党召开的伪“国民大会”。翌年1月，史良参加了民盟在上海举行的二中全会，会议明确指出：政协决议被破坏的责任在于美蒋双方。3月初，国民党对史良威胁利诱，先是以传票相要挟，尔后又拉美国驻沪总领事出面，企图分化进步力量；但是史良等人早已看清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毫不理会，仍然坚持开展斗争。在“三八”妇女节的集会上，史良发表《提倡一个‘二不’运动》一文。她向妇女号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妇女要团结一致，来提倡个不买、不合作。一是凡帮助政府打内战的任何国家的商品，我们绝对不买；二是凡对于违反民主而有害于人民利益的事和行为，我们绝对不合作。因此，敌人对史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7年5月，国民党以民盟与中共勾结为名，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敌人的嚣张气焰不但没有吓倒广大民盟盟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义愤。沈钧儒决定密赴香港召开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临行前，他把上海的工作交给史良，并嘱咐：“存初，你留在上海，任务艰巨而重大，在反动派面前，不仅需要勇敢，而且需要策略和坚持。”

1948年1月，史良以民盟中央委派代表的身份毅然赴香港参加民盟三中全会。全会号召“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还决定民盟在香港设立总部，在解放区设立盟务特派员，在上海建立了华东执行部，史良任执行部主任。在上海的艰难环境中，她以律师业务为掩护，积极联系群众，进行宣传民主的地下活动，保存了民盟的组织。

（六）感慨之声：我的危难即将过去了，

天快亮了

民盟被解散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疯狂屠杀民盟会员,史良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开始变得愈加艰难。

1949年4、5月间,敌人开始向史良下毒手。5月中旬,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5月10日深夜2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吉普车三辆及二十余名武装和便衣特务,将史良在上海开纳路(现武定西路)的住宅团团围住,然后蜂拥而入,大肆搜捕。由于史良提前得知消息,因而得迅速逃脱。她先是向一亲戚家躲去,可是等她到达那里时,发现在她亲戚家的院墙上贴满了标语,上面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杀绝”。史良见此赶紧躲去忻康花园的一个亲戚家,住在19号的一个二层楼上。这个亲戚家对面是国民党当局一个区长的住宅。一天下午,这位区长的鸽子突然飞向史良的窗台,他到这个房间来找鸽子,差一点发现史良的踪迹。为此,史良决定潜往平日少去的浦东和南市。在路上,为避免查身份证的麻烦,史良的车子在红绿灯的转换中冲来冲去,换了好几个停留处所,才逃出敌人的魔掌。

敌人抓不到史良,就抓住史良家的一位老工友宋阿福,酷打逼供。随后又搜遍全宅,把全家大小人口,不管是厨师还是女佣,一律进行个别审问,结果毫无所获,便留下几个武装人员把守住宅,企图“守株待兔”。第二天,敌人又一次大量出动,将住宅中人员再问一遍。到第三天,则对宅中人员轮流用刑,“惨号之声,闻于街邻”。司机阿宝经不住通夜酷刑,被迫讲出了史良丈夫陆殿东之弟陆殿奎家的住址。陆殿奎是商人,不问政治,但也被逮捕。司机阿宝又说出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史良姑父母荣宝礼夫妇即被捕,其后又连锁株连六七人,终于找到史良在南市的隐藏地点。武装特工人员立即对该处进行包围,但史良早在十分钟前已得到消息转移它处,送信人尚未离开,身上搜出报信字条,当即被带走。

一连串的扑空,敌人恼羞成怒。5月15日,史良律师事务所的秘书被捕,她被送到特务的

秘密看守所,把手反绑到背后,吊在墙上用皮鞭乱抽。打了一个钟头后,因见她未哭,特务说:“厉害,厉害!不愧为史良秘书,把她送去活埋!”于是秘书被送到南市某地执行处拘留室。史良的亲戚朋友一大堆关在那里等候执行。敌人执行方法非常残酷,一般先用绳索勒死,然后埋入土中。由于同时执行的人太多,而解放军已临近上海,来不及按上述办法办理,改为用卡车装运投入黄浦江淹死。5月24日晚,秘书等七人被装入一辆卡车载走。途中卡车损坏,停车修理之际,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打进城,枪声不绝,执行人员逃命四散。

史良自离开亲戚家以后,又转移它处,一些人家不敢收留,同时又不信赖关系不深的人家。对于史良来说,偌大的上海已无容身之地。白天,她化装混在人堆里;晚上,她借着月色在街口上躲来躲去。与此同时,史良还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想到那么多亲人朋友为她身陷囹圄,危在旦夕,愧疚和痛楚使她的精神近乎崩溃。正在这踌躇为难之际,5月23日夜半11时许,解放军装甲车11辆已冲入霞飞路的交通大学附近,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上海解放后,史良离沪赴京,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奠基事业。史良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文革”开始后,史良受到冲击,但她从没失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文革”结束后,她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同时兼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1984年,史良重病在身,但她还是坐着轮椅出席民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她坚持亲自致词,获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史良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她在发言中多次寄语台湾同胞和海外旧友,希望共同努力促进祖国统一早日实现。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她终生为之奋斗的民主爱国的伟大事业。今天,史良同志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她一生的光辉奋斗历程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 致中)

百岁红军女战士 陈琮英

● 蔡庆新

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是一位百岁红军女战士，我们为她的百岁生日表示祝贺。

两小无猜，“娃娃亲”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新中国开国元勋中，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婚姻虽无什么传奇内容，但是很具特色。

1896年，陈琮英的姑姑嫁给了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却不幸在第二年病故。任振声非常悲痛。虽然他俩结婚仅一年多，尚不曾有一儿半女，但是两人感情却很好。于是两家为代代交好，相约下一代再续姻亲。就这样，陈琮英一出生就意味着长大后，有可能作任家的媳妇。

1901年农历腊月初七，陈琮英生于长沙，不足2岁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她只得随兄嫂生活。因为和弼时家的这种关系，儿时也常小住弼时家中——湘阴县塾塘乡塘家桥任氏新屋，来来往往，两小无猜。

遗憾的是，琮英没有机会读书，本来就是靠兄嫂拉扯，生活已不富裕，哪里还有钱读书？更何况她又是女孩子！而这时，弼时家的经济状况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供弼时一人读书已很吃力，自然也无法供陈琮英读书。

12岁那一年，陈琮英到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了一名织袜童工。1915年夏，任弼时来长沙求学，先入一师附小，后读明德中学、长郡中学。那几年，琮英虽收入微薄，但大哥达泉当时还在铁路上工作，家中无需琮英补贴，于是她就常常接济弼时些许零花钱。



1920年夏，弼时要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俄留学。这一年琮英也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明知弼时此行难料归期，却无言地支持了他的抉择。只是在弼时行前将亲手织的两双袜子送给了弼时。此一别就是六个寒暑。

出闺成大礼，丈夫引路人

1924年8月，结束了莫斯科近4年的读书生活，弼时回到上海。他多么想回湖南老家探望父母和琮英啊！但是他刚一回国就被派到上海大学教俄语，紧接着又担任了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参与团中央的工作，筹备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部主任。不久，他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职务，领导共青团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工作铺天盖地。21岁的任弼时重任在肩，无法脱身，就连父亲病故他都没能抽暇回籍奔丧！探望琮英更成为不可能。

1926年2月，五卅运动高潮已过，终于有

回乡一转的可能了，经组织批准任弼时准备回家探视母亲并接琮英到上海完婚。

这天，弼时高高兴兴地买了江轮票，准备溯江而上。不料，人与行李都上了船后，忽然有同志通知：马上赴北京开会！弼时又立即下船，转而北上。

3月11日，任弼时自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回到上海。意外地，琮英已先他而至，是组织上安排王一飞把她从长沙接来的。

4月，仲春时节，上海简陋的亭子间里，没有任何繁缛的仪式，没有灯红酒绿的欢宴，但是就在此时——陈琮英与任弼时成大礼了。从此，她伴随在弼时左右踏上革命者奔波无定所的家庭生活道路，始料不及却又无反顾。

这一年，陈琮英24岁。她走出长沙简陋拙朴的织袜作坊，置身于东方大都会，开始做秘密交通和油印文件等工作，后加入了共青团。

不久，北伐战争开始，弼时领导的团中央在青年工人与学生中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工作繁忙，有时深夜才赶回家，第二天清晨又匆忙出行。琮英不管他何时回家，都要静静地等候。到底是有了两个人的家，这使琮英生活有了依靠，也令弼时感到阵阵温暖。

从这时起，弼时开始实现为陈琮英的“终身之谋”——教她学文化，并且是他亲自“执教”——练习写字。从此，琮英养成了习字的习惯，直到七八十岁时，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每天都坚持写一篇大楷毛笔字。多年后，每每向子女忆起当年情景，老人便沉浸在温馨的回忆中，并总是要说：我一天正经学也没上过，真正的学文化，就是从那时你们爸爸教我开始自学的。

营救丈夫，痛失爱女

1928年，任弼时夫妇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苏明”。初为人父的弼时特别高兴，只要有机会，就要抱她、亲她、逗她玩，硬硬的胡茬扎得女儿不是躲就是哭，弼时又马上把她逗笑。看着女儿挂着泪珠的笑靥，弼时忍不住又要去亲她……每每至此，琮英在一旁是最开心的，多么怡然的天伦情啊！

然而，弼时的不幸被捕，一下子将眼前的一幕撕得粉碎！

这年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新的中央回国开始工作，会议期间留守中央工作的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不幸在南陵被捕。任弼时没有暴露身份，只说他是长沙伟伦纸庄来收账的。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家亲戚。

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但是，出面的还需是陈琮英。按照营救部署，琮英得紧急从上海赶往长沙坐镇伟伦纸庄，以备敌人来对质。哪知赶到上海火车站才知道当日车票已售罄。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她情急中不顾一切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拉煤的大货车。

深秋寒夜的风，无情地抽打着蜷缩在敞篷货车上的琮英和女儿，手脚被冻僵了，剧烈的摇晃还不时将小煤块甩向她们。尽管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但终因孩子太小，不堪风寒引发肺炎而夭折。

终于，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打击接踵而至，此番获救不满一年，弼时再遭逮捕。

1929年11月7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上海。

一大早，天就被冬日的雨加雪笼罩着，昏暗阴冷。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准备去公共租界华德路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像平时一样，他行前告诉琮英：“我12点左右回来吃午饭。”说罢，匆匆出门。

12点了，弼时未归。午后一点了，弼时仍未归。3点、4点……琮英望眼欲穿地等到次日清晨，仍未见人影。地下工作的经验与直觉告诉她：肯定出事了！顾不得吃饭，她急匆匆赶到党中央机关。果然，李维汉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心情沉重地告诉她：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弼时这次被捕，先被押在上海闸北路捕房。受审时，他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由于他遵守地下工作纪律，身上除了一张电车票外，别无它物。敌人抓不到证据，恼羞成怒，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

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数日后，捕房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留40天，关押在工部局提篮桥监狱。

弼时被捕，周恩来亲自布置特科全力营救。一个多月后，弼时获释。琮英终又把丈夫盼回了家，抚摸着丈夫脊背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涌出的泪水。

身陷囹圄，沉着应对

1931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琮英即将临产，实在无法随行，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

这是她们结婚后第一次分别。看着娇小瘦弱的妻子挺着大肚子的样子，弼时很是心疼，他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

1931年3月12日，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后，琮英生下女儿“远志”。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十分危急，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以突然袭击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一网打尽。在陈云的协助下周恩来果断、迅速地采取措施，一夜之间，中共中央机关神秘地转移了。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和杨淑珍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非常时期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不许随便外出，更不许他人留宿。6月21日晚上，向忠发离开他的住所，来到这家旅店找杨淑珍，声称呆一会儿就走。但到了深夜12点，琮英敲门催他走，他却说明天再走。谁知次日早上，向忠发一离开小旅店就被捕了，叛变了。

由于向忠发的出卖，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百日左右的女儿。琮英毫不畏惧，装作农村妇女，一问三不知。后来，敌人把她关进龙华监狱。不论敌人如何审问，她就是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什么也不懂，问急了，就掐一把孩子的屁股。女儿一哭一闹，敌人也不耐烦了，审讯只好不了了之，始终什么口供也没捞到。

铁窗中的琮英沉着、坚贞。她知道党组织

一定在紧张地营救。最终，由“互济会”出面营救，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

党中央安排她去中央苏区。

追随丈夫，赴苏区

陈琮英刚接到要她去苏区的指示时，高兴地抱着女儿亲，想到很快就可以到苏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再也不怕被敌人抓去，而且和丈夫、女儿一家三口共同生活，琮英开心地冲着女儿笑。

然而，冷静下来，还是决定把女儿送回湖南老家。去苏区，且不说路途上的险阻，就是安定下来，那么艰苦的生活、工作和斗争，带着一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几番思想斗争，几日彻夜未眠后，琮英抱着女儿从上海回到湘阴老家，把女儿托付婆母抚育。

如果说大女儿苏明为了营救父亲而被病魔夺走，那么，这个女儿又为了父母共同的事业而被迫远离他们。那时，他们曾设想反“围剿”胜利后，就去接女儿团圆。但是，接踵而至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抗战……直至日本投降，竟然14年过去，女儿回到父母身边时，已是15岁的大姑娘了。

在江西瑞金苏区，陈琮英的政治生活和革命生涯经历了一次突变——1932年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机要科工作。

西征掉队

1933年5月，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苏区工作，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8月7日，南国暑热蒸腾。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西征。这时，陈琮英刚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面临戎马征战无法预测的艰难险阻，毫无选择余地，她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随军西征；要么和儿子留在当地，二者不可兼得！最终，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

两年前，她和女儿分别，虽然也是怀着那份揪心的不舍，但女儿到底是留给了亲人，留在了

家乡啊！可如今，大军西去，留在乡亲们中间的儿子显然是凶多吉少，敌人在苏区的烧、杀、抢、掠，可想而知的残酷。而事实正是这样，从此，琮英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直至今日，“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从8月7日突围西征到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印江木黄与贺龙会师，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历时近80天，连续行军作战，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0余里，突破几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包围、堵截和追击，艰苦异常。而最艰难的一段路是转战梵净山地区。

那里山高岭峻，人迹罕至，几千人的部队给养成了大问题，战士们缺衣少食，赤脚行军。偏偏此时，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

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步子越来越拖沓，越来越慢了，终于，她掉了队。因为队伍在山间小径上行进，一字拉开，弼时以为琮英就在不远处，哪里晓得她已经落在了最后。幸亏，当她赤着脚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之际，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弼时这才明白，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码啊！”

草地生女

1936年6月底，任弼时、贺龙统一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雪山之后，在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师。7月初，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不久，为了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促张国焘北上，按朱德的意见，弼时即随朱德同张国焘一起行动。

这一段时间，陈琮英随弼时和四方面军指挥部一同走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

过草地，对琮英更比其他入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孩子迫不及待地要见天日了。同志们为陈琮英找一处二层木屋，是当地藏民的住屋，下层是牲畜栖息之所，上层是正式住屋。可是通向上层的木梯极其简陋，直上直下，别说即将临产的琮英，就是普通人上下也得四肢并用。大家只好收拾一下底层将陈琮英安顿下来。

随着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一个健康的女婴来到人世，陈琮英与丈夫欣喜之极。五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唯有这个女儿真真实实地在眼前。回首征战中的孕育，不禁感慨万千，望着茫茫草地，遥想未来征途，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远征”！

远征的到来，却令衣食无着的母亲心急，每天只嚼野菜草根的琮英哪里还有一滴奶水给嗷嗷待哺的小女儿！这时，朱德总司令想到一个好主意——去草地中的水塘钓鱼。他亲自钓鱼，亲自煮鱼汤，鱼汤煮好他又亲自盛起，大声地喊：“月婆子，月婆子，汤来啦！”

陈琮英和女儿远征从这没盐少油的白鱼汤中获得了无限生机。多少年后，陈琮英还经常和人们叨念朱老总的那声声呼唤！

弼时为了照顾好妻子和孩子，行军中，他自己缝了一个布背带，把女儿背上，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前行。宿营时，弼时又学朱总司令去给琮英钓鱼。夫妇俩相扶相携，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直至胜利地到达陕北，和红一方面军会师。

丈夫的机要秘书

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将赴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此番远行，弼时偕妻子同往。十几年生活在弼时身边，十几年革命工作的锻炼，耳濡目染，琮英在气质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昔日的湖南妹子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紧张、繁忙。琮英边在党校

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 1938 年 12 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远芳”。

1940 年 2 月 25 日，根据中央决定，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又一次面临与女儿的离别。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女儿留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

国际儿童院。又一次的骨肉离别他们是什么心情呢？两个女儿在老家，唯一的儿子生死不明，小女儿就进了“保险箱”了吗？

3 月，他们回到延安。弼时很快加入到党中央的领导行列，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琮英也恢复了一向从事的机要工作，是弼时的机要秘书。在延安他们度过了几年相对稳定的日子。

不料，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1947 年 3 月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陈琮英与丈夫再度暂别：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先期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

这次分别琮英很为弼时的健康担忧。一年前，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大夫给弼时检查身体，诊明他患脑血管硬化，影响双目视力，表明他的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1947 年 11 月，琮英心悬不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天，组织上捎信，让她到陕西米脂县钱家河去一趟。由于紧张艰苦的转战过于劳累，任弼时的血压又升高了，头晕目眩，他病倒了。中央安排他到钱家河静养。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从山西兴县匆匆赶来。

从此，她为丈夫的健康而悬起的心再没有放下。

送弼时

一年后，1949 年 4 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弼时亲自撰写并作政治报告。但是，由于身体过于虚



1946 年，任弼时、陈琮英夫妇在延安

弱，再也支持不住，报告只讲了一半，后半部分不得不请荣高棠代为宣读。

数月之后，弼时赴苏联求医，此行只有朱子奇和刘佳武分别以翻译和医生身份随行，琮英没有陪同，留在国内照顾孩子们。

弼时此次赴苏治病，令琮英顿觉空落落。二十多年婚姻生活，相濡以

沫，不管是艰苦的征战或是相对稳定的生活，琮英已习惯了弼时兄长般的呵护，论年龄，琮英还长弼时近 2 岁。弼时知道琮英的心理，也在尽力填补因其远行给琮英带来的“真空”。他一封一封地写信，除报告病情外，更多的是叮嘱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并宽慰琮英：“寒假快到了，会很热闹的。”

就是在这封信 5 个月后，弼时病情基本稳定，他带着 10 年前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小女儿远芳一起回国了，他们又团聚了。

然而，健康并未给弼时以更多岁月，又 5 个月，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

琮英心痛欲裂，泣不成声！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弼时从莘莘学子到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创建者，从英姿勃发到辗转病榻……一步一个脚印的历史，哪一步没有琮英相伴随的身影？而今这一切恍如云烟，怎不叫琮英悲痛欲绝！

然而，琮英毕竟是在弼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弼时去世不久，琮英就把斯大林送给弼时的“吉姆 150”轿车以及弼时使用过的软床、钢琴统统交还公家。就连女儿骑的自行车也不例外。她坚强地挺住了中年丧夫的沉重打击，满怀着对弼时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着有 4 个孩子的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弼时去世时她尚在中年，如今已是跨入百岁的老人了。

我们衷心地祝愿这位世纪老人、革命的老大姐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 致中）

美国将军史迪威与八路军

● 吕德润

“二战”期间，我作为重庆《大公报》特派记者，被派往缅甸战场，采访中美军队联合进行抗日斗争及开辟中印公路的新闻报道，前后将近两年。这期间，我有幸听到不少有关中美联合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美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不少杰出贡献的佳话，尤其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表示赞赏，并且力排蒋介石及国民党内一些人抗战不力，而压制、排挤共产党的种种干扰，力主正义，在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仍尽可能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物资，直到最后被迫调离中国，这些都使我非常感动。

可惜当时因为我所处的政治环境险恶，许多消息又被国民党当局封锁，因而有关史迪威将军被迫调离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他对中国人民及八路军的深厚情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事隔半个多世纪，回忆往事，我仍心情激动。写出此文，一是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史迪威将军，一是真实地向大家披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史迪威是美国的著名将领。1904年他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即开始了长达42年的戎马生涯，其中有15年在中国任职，因而被人们认为他是美国有名的“中国通”。他五次来华，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目睹中国内战频繁和民众疾苦之深，对中国军民遭受的苦难极表同情。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他正在北平，目睹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盗行径非常气愤，对当时国民政府抗战不力，节节败退，而却坚持反共，制造磨擦表示不满。随后不久，史迪威在武汉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对他们的印象：“坦率、有礼、友好和直截了当”，与他所接触的国民党军官们“装模作样的傲慢大不相同”。（以上引语均引自《史迪威日记》）因此，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能由这些人肩负充满了希望。

1942年春至1945年秋，史迪威受美国政府委派第五次来华（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华），任美国政府驻华军事代表兼任中印战区美军司令，与国民党郑洞国将军一起，领导着一支美国军队和用美式装备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在缅北战场开辟第二战场，抗击疯狂侵略的日本军队。同时，为打通中印、中缅交通，修筑一条极具战略意义的中印、中缅公路。这条经印度、穿缅北直达我国昆明的公路，是当时中国由内陆通海的唯一国际通道，对运送兵力和作战物资、支援抗日前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这条公路是在史迪威将军领导下修建的，后来被人们一直称之为“史迪威公路”，表示对他的敬佩。因为史迪威将军在缅北战场的功绩，他被荣升为美国四星将



史迪威将军挎着卡宾枪出没于丛林之中

军。

史迪威是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但却不是一个善于辞令的外交人才。而且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在他多年与国民党高层领导的接触中，尤其是与蒋介石曾多次当面激烈争论。他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官员贪污腐败发国难财。赞扬积极抗日的中共部队，力主国联（相当于战后的联合国）及国际友好各界支援中国抗日的各类物资，应本着平等的原则，也要分配给在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史迪威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对当时中国的形势的看法如实报告美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曾得到美国政府的赞同。

史迪威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当然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在蒋介石的胁迫与美国国内反共势力的配合下，1944年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下令将史迪威调回美国，撤销史迪威在华美军代表和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的职务。

史迪威被调回美国并撤销他职务的决定非常突然，美国政府怕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将调令秘而不宣，只秘密通知史迪威，限他

接到通知后48小时内返回美国。

尽管美国政府封锁调令，但还是引起美国国内及国际舆论大哗，震动极大。一时舆论界纷纷猜测、反对，酿成震动美国政界的“史迪威事件”。当时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如斯诺、白修德、史沫特莱、巴巴拉·塔奇曼、费正清等，纷纷著文谈论此事，揭露史迪威将军被骤然解职的真相。白修德在他写的《探索历史》一书中，指出史迪威事件的焦点是：“蒋介石最感惊恐的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史迪威那种发号施令的脾气，而是史迪威竭力要同北方的中国革命者——延安毛泽东的共产党人的接触。”

史迪威返美后不到一年，日本投降。1945年9月3日，他代表美国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军舰上，参加了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

史迪威在华期间，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有过多次接触，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对日作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4年10月20日他接到被解职调离中国的命令以后，写了一些告别信，其中有致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信，并很快发往延安。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朱德将军：

由于我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的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 J·W·史迪威
美国将军

可惜，当时这封信在延安未发表，自然，在美国更未发表。因此，很少人见到此信全文。1970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塔奇曼女士写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一书中虽提及了这封告别信，但也未引及内容，更没有全文了。

约在1987年，史迪威长女南希女士来北京访问时，我托她转请塔奇曼女士抄寄我此信

全文。据塔奇曼女士说,她也未见过此信,只是听说而已。后至1988年春,美国华纳电影公司要拍纪念史迪威将军的影片,请旅美华人陈味沙先生来北京收集材料,我们见面时,又托他能代我找到这封信的全文。这年6月13日,陈先生从美国写信告诉我说,经过华纳公司资料室的帮忙,终于在美国陆军部保存的史迪威文件中,找出了他致朱德将军告别信的原文,并附来抄件。接到这封信时,我大喜过望。这封凝结了一位美国将军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深厚情谊的珍贵信件,终于在43年之后,被中国人民看到了。

我收到这份抄件后,迅速将译文托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吴全衡女士转给康克清大姐(康大姐时任宋庆龄基金会会长)。陈味沙先生在来信中还提及,当年史迪威将军临行前,还托人将他的一件军用皮夹克送给朱德作为纪念。可惜已难找到当年的见证人。此事,当年各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也未提及。

史迪威将军不仅对代表中国进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表示敬佩,而且,他在中国进步人士中有许多推心置腹的朋友,宋庆龄就是首要的一位,他们的交谊非常令人感动。美国作家路易·艾黎在纪念史迪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作为美国在中国的代表,他努力去了解中国的情况,悉心研究中国人民的需求。”他就挑选了宋庆龄女士,通过她更深入的了解中国,通过她表达他对中国进步力量的深厚友谊。

他被调回国途经重庆时,还匆匆赶到宋府与宋庆龄女士告别。坐落在北京风景区什刹海后海北沿的宋庆龄故居的展室里,悬挂了一幅宋庆龄在重庆时会见史迪威将军的照片,两人正举杯相向,微笑着似乎在谈论什么,和谐亲切之情溢于画面。

史迪威非常尊敬宋庆龄,他赞赏并支持她支援八路军的正义事业。史迪威同意用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卫中国同盟”将药品及其他物资运送到延安及各解放区去。曾担任过“保卫中国同盟”办公厅主任、宋庆龄秘书廖梦醒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一次国外捐赠一架大型x光

机要运送到延安去,可是这架机器体积太大,搬不进飞机舱门。宋庆龄请史迪威帮忙,他马上下令改造了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终于把这架x光机运往延安。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一篇文章中也追忆说,史迪威将军经常让从印度飞来的美国军用飞机,运送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等到解放区去,他还从自己管理的军用仓库中拨出物资支援延安,并派美国军医梅尔文·卡斯柏格到解放区帮助军民看病。

在宋庆龄故居的第二展室里,玻璃柜中陈列着一本紫红色封面的书,这就是有名的《史迪威文件》。《史迪威文件》是他逝世(1948年)后的第二年在美国公开出版的。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解放战争决战时期,美国一些人为推卸他们支持蒋介石腐朽政权而遭失败的责任,制造各种借口,包括麦卡锡分子冷战歇斯底里大发作,而那些主张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正直人士和外交官却纷纷受到迫害。面临这个情况,史迪威夫人不畏风险,毅然出版了这本由史迪威生前好友、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根据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和致亲朋的信件编辑而成的书。这本书是研究那段时期的中国问题、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形势不可忽视的珍贵历史文献。

史迪威离职返美时,据说他退还了蒋介石国民政府赠送给他的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9月26日,他通过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他来华访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以此成为终身遗憾。史迪威将军1948年临终的时候,一再叮嘱他的家人,要代表他到中国看看。

1948年10月,史迪威将军因患胃癌不幸逝世,享年63岁。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中国,引起无数友好人士的哀痛。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称赞他在抗日战争中为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作出了不少贡献。他一直致力于想把中国各方面的军队,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战力量。然而,他面对的却是“把维持其绝对优势,看成比驱逐日本出中国更重要的国民党濒临灭亡的政权”的

(下转14页)

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

● 廖盖隆

我冒昧地称艾思奇为大众哲学家,因为他是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中国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他的成名之作《大众哲学》,于1934年在他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在1935年结集成书出版之后,立即风靡全国,在解放以前连续印了32版之多,成为极罕见而大受欢迎的通俗的社会科学畅销书。这件事的社会意义就是在于,它对数以几十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激励他们奋勇投入中国空前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救亡高潮,接着又奋勇投入空前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高潮。经过这两次革命高潮,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民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全面的即包括经济、政治、精神三个领域,又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2年来,中国由于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成功,即中国式的、新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已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坚强的力量而崛起;并为在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真正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而奋斗。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来重温 and 进一步认识艾思奇和其他先进人物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是很必要的。

为什么对人民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进而进行提高的教育是必要的,而且效力这样巨大呢?因为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所说:“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可以说而且应当说,大众,而且只有大众,才是我们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只有为大众所掌握,才能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所以,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使唯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狭小圈子里,走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去,并为他们所掌握。在此以前和以后,他反复讲了这条真理。这条真理本来是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必然要求。

因此毫不奇怪,艾思奇在毛泽东提出使哲学大众化的要求以前,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已经大见成效,实际上大大促进了中国伟大革命的发展。在1937年艾思奇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也很爱读艾思奇的书,并且虚心地向他请教。当然,《大众哲学》和艾思奇发表的其他哲学论著,大体上主要是对大



艾思奇同志

众、对党内外积极分子起了启蒙教育的作用，但这种启蒙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启蒙教育，是进行哲学提高教育的基础。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提纲》，特别是讲授《实践论》、《矛盾论》，在这以前和以后，又撰写、发表和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科学的著作，那就在更高的层次上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高教育工作了。这些总结了丰富的独创性经验，而写成的哲学和军事科学著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培养了成千成万的高素质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坚干部，对于保证中国革命胜利，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并且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又不是只以中国为限。

笔者自己的经历就说明，无论是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的启蒙教育，或者是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提高教育，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成长和发展，都是完全必要的。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杂志上连载和成书出版时，我还只有十五六岁，还在一个中

学（广东信宜怀新中学）初中二、三年级学习。在读《大众哲学》以前，我已经接触和接受了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愿意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尽力。那时我们的进步同学共有七、八人（后来在1935年到1938年在广东高州中学读高中时，我交往的进步同学扩大到二三十人），我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报，讨论天下国家大事。那时除艾思奇以外，邹韬奋以及其他好几位进步作家的文章我们都很爱读，他们的著作使我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大事，他们都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我们这些进步学生所结合成的没有名称的进步学生团体，曾经和艾思奇、邹韬奋通过信，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答复。我们发现，艾思奇原来是一个坦率、真诚、直往直来的人。有一次我们给他写信，说我们正在读陈某某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请问他，这是不是一本好书。他答复说，这本书内容没有什么错误，可以参考，但它抄引苏联哲学书太多，不结合中国的实际，因此不能算是一本好书。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我和一些暑假留校的进步学生立刻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下乡作抗日救亡宣传；以后又组织了抗战剧社，每星期六晚演出救亡话剧；还组织书报合作社，推销进步书报杂志。1938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们中的10个进步学生，经一位抗大三期毕业生介绍，结伴到广州八路军通讯处考取了陕北公学，随即于8月初到达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陕北公学，先后在普通班和高级班学习了一年。也是在1938年8月，我申请并得到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我被选送延安马列学院深造，这个学院的院长是张闻天，仰慕已久的艾思奇这时成了我的哲学课老师；1944年初我调到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社长是博古、总编辑是陆定一）国内评论部工作后，因艾老师已是这个报纸的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因而和他有较多的接触。我感觉到，他为人朴实真诚，以平等、民主的态度待人，但性格有些内向，不爱多说话。然而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不崇拜名人和权威。比如有一次他说，陈伯达影射蒋介石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是仿

效马克思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但是没有写好。我听后有点吃惊,因为我那时还是迷信陈伯达的“权威”的。因而我心中疑惑,未敢表示可否。但事实证明,艾思奇的论断是对的。

艾思奇讲哲学课是很有深度的,他写成文字的东西,因为是想好了才写,写出后,又反复作了修改的,文笔都很生动精炼。但他的口头讲话,可能是由于不是想好了再讲,而是随想随讲,使人感到他不擅长于说词,语言比较平淡,甚至有时不太连贯,而且他的云南口音很重,因而对听众不大有吸引力。

艾思奇是云南腾越(今腾冲)人,原名李生萱,又名李崇基,出生于1910年。他于1927年春至1928年春到日本留学,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1930年至1931年再度到日本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激于爱国义愤回国。1932年他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他到延安后,任抗大主任教员,马列学院哲学教员,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

国文化》杂志主编。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于1966年3月22日过早地在北京病逝,这时他才56岁。

他的著作,除了《大众哲学》外,还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延安整风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他同陈伯达一起主持编辑出版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中共中央规定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建国后他主持编辑出版了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去世后还出版了《艾思奇文集》。

我所尊敬的启蒙老师艾思奇已经逝世30多年了。现在,他的勤奋好学,勇于开拓创新,善于以平等的民主的态度待人,而又直往直来,无私无畏的严肃的音容,正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艾思奇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起的重大启蒙作用,是值得中国人民永久纪念的。因此,我不揣浅陋,写了这篇文章。



艾思奇同志逝世20周年学术座谈会前部分老同志和家属合影(后排左五为艾思奇夫人王丹一)

路遇陈独秀

● 张定

1940年寒假，我和三个好朋友考入江津中山中学高中二年级。开学前，我们一起乘船由重庆去江津，看见船长室里坐着一位很有风度的长者，一打听，他是陈独秀，就住在江津城墙脚下。我读过他写的《我对抗战的意见》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上我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我们必须奋起抗战才能挽救中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又知道他是有名的学者，办《新青年》杂志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他很敬佩。听说是他，我十分兴奋，立即去拜见他，请他在我的日记本上签名。这位长者和蔼可亲，问了我一些情况后，慨然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少年中国，中国少年”八个大字，并旁题注明：“张富培同学纪念，独秀於民哲舟中。”

同行的三位同学并没去找他，但船到码头，我们四人都被宪兵扣下检查，没收了我们的几本小说和《全民抗战》等期刊。放行后天色已晚，我们去四川旅行社投宿，晚九点光景，宪兵又来，再次检查行李，叫我和另一同学带上被子将我们押去宪兵十二团司令部。我们被分别关在两个监房里。监房地上有一些稻草，潮湿阴暗。我披着被子，合衣坐着靠在墙上。下半夜，被叫到审问室由一个军官审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知道读书。”又问：“你与陈独秀有什么关系？”答：“没有关系，只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教授，很有学问。”他们问不出个所以然。我急中生智，要求打电话回家。他问：“你家长

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父亲在二十一军司令部。”他不让我打电话，但不一会儿就把我们俩放了。

第二天，我们到学校报到。校方说，你们得等一下，还须口试。我们一听，猜到是学校借此取消我们的入学资格，不然入学通知书都发了，老远跑来，为何还要口试？年纪小，没有经验也不懂得据理力争。

想起陈独秀对青年是那么关怀，就按照那位乘警告诉的地址，在江津城墙脚边找到了陈，我向他诉说自己的这一段遭遇，表示：决定不上学了，要革命去。陈听着脸上露出严肃而又十分关切的神色对我说：“要革命也不能不上学。没有学问革命也搞不好。”我说：“现在学校都开学了，也没学校可上了。”陈说：“那你就先自修半年再考。这半年，除温习功课外，可以读一些历史书籍。例如，可以读克鲁泡特金写的《法国大革命史》，还可以看看其他历史书籍。克鲁泡特金写的《我底自传》也可以看。我已经看到这本书，是可以买到的。总之要读书，一定要继续上学，真要革命就要有本事，有学问。”他的关怀与忠告，令我十分敬佩与感激，决定继续求学。这样，我们几个人又一起回到重庆，自修功课。几个月后，我回到初中时就读的广益中学，于1942年暑假毕业，考入燕京大学。1944年到1945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年，抗战胜利后复学，1947年从燕京大学到晋察冀，被分配在中央青委工作。

1948年在平山县的土改、整党工作期间，

中央青委机关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我如实讲了这一段经历。有同志追问我与托派的关系，有同志追问我思想上受了陈独秀什么影响？我只能说我没有见过托派，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陈独秀劝我要上学，要读书，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他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 I 改变了空想的革命道路，而决定再上学。如果说他对我有长远的影响，可能是悟出要从人类的历史去了解人类的未来，然后去找寻革命的道路。另外，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革命者的可亲可敬的形象，觉得共产党是好人。别的，说不出他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有同志觉得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不搞清楚不行。还是中

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同志为我解了围。他说：“张定当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在那样一个偶然的机 会，去请教一位有学问的长者，陈独秀告诉他的那些话是可信的，对一个青年人来说也是有益的。没有什么根据硬要和托派扯上关系嘛！”

“文革”中批斗我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是档案里有中央青委机关党委的结论，倒没有提出来追查。但是，“造反派”抄家时，陈独秀的珍贵题字也和我所有的日记、笔记本，连同其他书籍、信件、照片一起被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代 购 代 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书籍本社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季羨林人生漫笔	季羨林	21.00	3.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斯大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师 哲	32.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直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3.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赵桂来	17.00	3.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	温济泽	22.80	4.00
海丝	杜明明	28.00	4.00
红墙回忆	纪 学	48.00	5.00
知情者说 第二辑 (共八册) (邮购全套八册邮费 12.00 元)			
之一	肖思科	15.70	3.00
之二	张树德	13.90	3.00
之三	魏敬民 徐 林	15.10	3.00
之四	程 瑾 朱 仁	14.50	3.00
之五	万 须 木 心	13.90	3.00
之六	山 椿	15.10	3.00
之七	庄 园 郑宏颖	14.50	3.00
之八	范广群 霍 岩	13.90	3.00

《知情者说》是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该书介于历史与纪实文学之间的作品。它的特点是少有文学作品虚构成份而追求材料的真实可靠和鲜为人知，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第二辑收入了共和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实录，并配以珍贵的历史照片。

《直言——李锐六十年反思》这是当年毛泽东的兼职秘书，现今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的扛鼎之作。书中记叙了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大跃进期间三次上书的命运；亲历庐山会议与《庐山会议实录》的成书；“文革”秦城铁窗酝酿《龙胆紫集》，还祭忆了在心中永生的挚友。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 1 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发行部

当代武训——

港胞张杰

● 赵 畅

编者按：一位1959年8月从上海申请去香港定居，到香港后租用5平方米的楼梯间，经营青蟹、粽子、茶叶蛋、日杂货的小老板，至今仍然住在30多平方米的风子里。为了赚钱，他起早摸黑，不敢辍手；为了积钱，他吃粗茶淡饭，穿廉价衣衫；为了省钱，他强迫自我戒烟，劝子婚事简办。然而，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他慷慨解囊。二十多年来，他先后累计捐赠钱物1100多万元，建成12所中小学教学楼，并出资200万元，设立教育发展基金，直接受益学生达12000多人。1997年，他被浙江省政府授予“爱乡楷模”的称号。1987年、1999年，他分别应浙江省侨办、国务院侨办邀请，两次参加首都国庆观礼活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还被上虞旅港同乡会同仁推举担任了同乡会的永远名誉会长。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北京国庆观礼台上，更是人头攒动，人心涌动。只见一位发疏鬓白，眉清目秀，戴着金丝无框眼镜，身材瘦弱的老人，不时地摘下眼镜，拭去盈眶的热泪。他，就是港胞张杰先生。

出身微寒 历经磨难生感慨

张杰，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市梁湖镇华光村一个贫困家庭。在那个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年代，张杰一家与中国其他千千万万家庭一样，何以有安宁温饱的生活可言呢？11岁那年，小学尚未毕业的张杰，便早早地走上了外出谋生的艰难路。

光着脚丫，怀揣一双母亲纳做的布鞋，张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泥泞不堪的海涂，坐上小木船，只身来到上海成都路恒兴公贸商行做起了小伙计，这一干便是8个年头。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蹂躏中国时，上海

亦未能幸免。日本侵略者用飞机轰炸上海，令上海满目疮痍、遍体鳞伤，一批又一批的房屋倒塌，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失业。张杰，自然成了庞大失业队伍中的一员。天无绝人之路，在一段流浪生活以后，为了糊口立身，张杰咬咬牙做起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没有把握的行商。他奔广东，赴西安，下福建，日夜兼程，做起了毛竹、柴爿生意……

1959年，这是令张杰改变人生、心中播下报国爱乡种子的一年。当年，张杰到上海卢湾区派出所花2分钱买了一张赴香港申请表格。表格很快填妥并送了进去。然而，此时张杰反倒忐忑不安起来，他自我犯疑嘀咕道：我是小商贩，属改造对象，能被批准吗？奇迹到底还是产生了，仅七天时间，这申请表就批了下来。张杰是那般的喜出望外，他逢人就说：“国家对我这个小商贩这么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般殷之语，自是化作了日后报国爱乡的拳拳之心。

人去了香港，可张杰的心还在大陆。这不，

他每年都要坐硬铺车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故乡探亲，慰藉他那丝丝相连、难以扯断的故土情缘。

岁月不居，人事移易。张杰在香港一晃就是20年。这20年是他对世界金融贸易中心特殊窗口的香港认真触摸的20年，是他对许许多多黄头发、蓝眼睛、黑皮肤的外国人悉心观察的20年，是他历经磨难，饱经沧桑的20年。20年的良苦用心终令张杰茅塞顿开，感慨万千：发展科技、教育乃兴国富民之策。他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还要割地赔款。国家要富强，关键在教育，教育上不去，人的素质就差。日本为什么发达，重视教育是首要一条。眼下国家人口多，摊子大，政府负担重，我们海外游子总要尽点心，出点力。”

自此以后，张杰便拉开了他报国爱乡、捐资兴学的序幕。

小本生意 锱积铢累为兴学

去香港的当儿，身无分文的张杰依然无可奈何地给别人打帮工、当伙计。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唤起了张杰搞个体经

营的经商愿望。在香港一条叫加连威老道的街上，张杰租用了一个5平方米的楼梯出入口，常年经营青蟹、粽子、茶叶蛋、日杂货，开始了他的“诚招天下客，香引洞中仙”的小本生意。

香港九龙尖沙咀，商铺林立，霓虹闪耀，车水马龙，在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里，张杰的铺子自然毫不起眼。然而，又有谁知，为了经营好这家小铺子，张杰可谓是备尝艰辛，受尽煎熬。

在香港大闸蟹上市季节，在张杰的带领下，全家人便忙碌开了。每天凌晨起床，他们将一只只青蟹从竹篓里抓出，然后用草绳捆扎起来，按大小分档装箱，抬到楼上的大冰柜冷藏起来。一天下来，不要说子女们累了个眼花、背痛，张杰早已腰酸、脚麻，更兼双手被青蟹钳出血，痛得他“哎哟，哎哟”直叫唤。

深圳罗湖关口的许多海关人员，几乎都熟悉张杰。他，总是背着超过他自身承受能力的大包物件，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地进出关口。是啊，为了节省工本，张杰每每自己去进货，自己背蟹。即便是上了年纪以后，他依然背一阵、歇一脚，但只要想到自己能够为解决贫困孩子读书问题时，他便鼓起了劲头。

茶叶蛋，是张杰经营的老品牌，买过这茶叶蛋的人，都说张家煮的茶叶蛋香醇有独特的风味。然而，为了调制这茶叶蛋，张杰和太太徐丽娟没少吃苦头。每晚他们将一个个鸡蛋冲洗干净，再落锅加配料烧煮，因为住房面积小，煮茶叶蛋的煤气炉就安放在床边，要不了几分钟，满屋子都是烟气、雾气，夫妇俩被熏得脸红眼肿，咳嗽不止。碰到暑天，屋子更成了地道的“蒸笼”，温度竟高达40度。难怪太太徐丽娟对人说：“我们张杰捐助的钱不是摸六合彩（香港流行的一种奖票）摸来的，不是买跑马票中奖的，我们真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辛辛苦苦赚来的。”

1987年春天，浙江省侨办主任黄祖文等一行途经香港，去看望这位仰慕已久的张杰先生。几经打听，总算找到了张杰的住处。当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他们看见一个只有数米见方的小天井里，有几个身穿雨衣的人在忙碌着，把堆在一边塑料袋里的青蟹一只只取出来，按大小加



张杰先生在香港的铺子

以归类,再分头往大筐小筐里装,几个人的手都被污水泡得发白发皱了,雨水蒙住了双眼也顾不上抹一把……他们上前询问:“请问张杰先生住这里吗?”一位老人弯着腰,手脚不停地应道:“我就是。”他们又问:“这几位是谁?”老人说:“都是赶来帮忙的儿女”。黄主任激动得紧紧握住老人湿淋淋的手,半晌才说:“张先生,真想不到您是这样挣钱来支持家乡办教育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了捐资兴学,张杰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以至连上虞旅港同乡会金清扬会长都动情地说:“张杰捐资兴学,笔笔都是血汗钱,可真称得上当代‘武训’了。”

率先垂范 举家支持遂宏愿

张杰做的是小本生意,要积聚资金造福教育,除了开源自然还须节流。说起张杰的“抠”劲,那真是没话说了。

香港的住房紧张,价格亦昂贵,但是按张先生的经济实力,买一套宽敞的住房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他不舍得。至今五个子女,三代同堂,十几个人仍住在当时用7万元钱买进的仅30平方米的旧房里。张家一起吃饭的嘴巴往往有十几张,吃饭在此,睡觉在此,会客在此,堆物亦在此。凡去过张家的人都记忆犹新,客厅的长沙发下,塞着棉被和席子,碰逢客人过夜,张杰就得打地铺。张杰曾不无风趣地说:“人家叫我老板,其实我睡的是地板。”

有一年,张杰生了一场大病,一次手术花费了已列入“捐资兴学计划”的一部分积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张杰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怎么弥补这个缺口呢?对,戒烟。于是,这位有着几十年烟龄的“老烟民”硬是戒了烟。这一招,竟把全家人都给惊愣了。

在香港,张杰吃的是粗茶淡饭,唯一讲究的是每天喝一杯高钙奶;穿的是廉价衣衫,20年前做的西服至今还套在身上;暑天出门坐车,专拣没有冷气的公交车,就因为车票便宜。去年,香港的理发价格上涨,张杰为了不增加

支出,竟改每月一次而为两月一次,并尽可能拖到回乡时,毕竟在家乡理发可省些钱。

每次回乡,张杰总是坐硬席,住普通旅馆,骑旧自行车。走时,总要到乡下街市买一些内地土特产回香港,以赚回一趟路费。有一次浙江省有关部门在杭州西子宾馆为他全家订了7个房间,他觉得太奢靡了,硬是退了,最后自己出钱住进了10多元钱一个床位的招待所。

张杰节衣缩食、克勤克俭将积攒下来的钱义无反顾地捐助给家乡教育事业之举,自然也深深地感动了太太,感染了子女。张杰经常对子女们说:“人生也有涯,钱再多也要死,给了你们是害了你们,积财与子莫如积德与子,我一直主张你们自己奋斗。”

爸爸是这样谆谆教诲儿女们的,那么儿女们又是怎样想的呢?采访中,大女儿张薇珍说:“我支持爸爸捐资助学,所以帮他多做生意。”二女儿张惠珍说:“本来我可以外出去工作的,想想爸爸年纪大了,就帮他攒钱助教。”三女儿张蕉珍说:“不少孩子穷得没书读,我全力支持爸爸的行动。”小女儿张茅珍说:“以后等我有钱了,也要像爸爸那样,支持咱中国的教育事业。”儿子张唯刚说:“中国的事情就靠中国人自己去做。现在教育落后,爸爸捐资兴学,他做得对,也带了好头。我们子女这一辈,将来一定要为中国做更多的好事。”儿女们个个钦敬父亲,太太徐丽娟更是敬慕自己的先生,“我当然支持他呀!”是啊,若是没有太太的理解与支持,没有太太的推波助澜,张杰又何以有这番义举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张杰的影响下,太太以及儿女们亦不甘示弱,纷纷行动起来,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捐款献物:儿女们把为父亲办寿酒的一万元寿金节约下来,捐给学校添置图书和铜管乐器;儿子把“燕尔之喜”置办喜筵节约下来的1.5万元钱捐给学校购买体育器材和教学仪器……

痴心不改 膏血凝聚铸丰碑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张杰立下宏愿,誓将多

年积蓄和小本生意所得的收入捐助故乡，以资兴学。

1979年，他为独生子的母校上虞中学带去了一台3000元的彩电，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86年，他接连向上虞中学赠送了雪柜、汽车等，并设立一万元奖学金基金。1987年以后，张杰勃发了更高的兴学热情，自订五年计划意欲重建上虞中学。他先后捐资为上虞中学建造了拥有32个教室、面积近4000平方米的两幢教学楼，一个面积为800平方米的图书馆，一幢面积为600平方米、可容纳240人就寝的女生宿舍楼，又为学校设立了15万元奖教奖学基金，并捐赠了一辆8座面包车和100台吊扇及一大批图书、乐器、仪器。同时，他还捐资98万元，建造了梁湖中学、梁湖小学教学楼，并向上虞人民教育基金捐赠30万元。

随着一幢又一幢崭新的教学楼在故乡拔地而起，张杰笑了。他对一些领导说：“我真的太高兴了。自己好，不算好；家乡好，才真好。过去只有陈春澜这样的富商才能捐资办春晖（在浙江省上虞境内，当年曾因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李叔同等名家大师执教而享“南春晖、北南开”之誉）的事，想不到我一个卖蟹的人亦能做到，我真的很激动，我感到很自豪。我打算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哪里办学困难，哪里的学校还有危房，我就到那里去捐资。”一个老人，一个小商贩，对捐资兴学有着这般痴心，这般追求，这是何等崇高的思想境界，何等真挚的赤子情怀啊！

捐了资，并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为了用好每一笔捐款，造好每一幢教学楼，张杰不顾年迈体弱，常常骑着自行车，冒风雨，顶寒暑，拖着他那疲惫倦怠却又精神矍铄的身子，出没在山乡崎岖小道上，出现在基建工地中。每造一幢教学楼，他总要同建筑承包商一起审看图纸、置办材料、细算账目。他绝

不允许偷工减料、铺张浪费与中饱私囊。

每幢“张杰楼”奠基时，张杰总是赶来亲手铲起第一锹土，把自己那种高尚的情操、高贵的品格连同那神圣的希望注入楼底这片土地，留给这里的师生们，留给这里的父老乡亲们。

1988年，上虞中学“张杰楼”落成，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李德葆专程赶去庆贺。他高度赞扬了张杰先生爱乡和捐资兴学的精神，并把它称之为“张杰精神”。

坐在宽敞明亮的张杰教学楼里读书，莘莘学子又何尝不被感染、点化？“张杰精神”是一部人生哲理的教科书，是一面催人奋进的旗帜。在上虞中学，“张杰精神”成了全校师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目前，已有400多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过张杰奖学金，300多人次的优秀教师获得了张杰奖教金。

前不久，笔者碰逢刚从香港返回故里的张杰先生，见其身体瘦弱倦怠，我劝老人：“你要多保重身体，也该积些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条件。”想不到他一脸的严肃，耸起两道浓密花白的眉毛，极其顶真地说：“我个人的生活无所谓，但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一天。”语气是那般的坚定，感情是那般的执着。是的，这就是张杰，一个当代“武训”无怨无悔的选择，无穷无尽的追求。

（责任编辑 致中）



张杰捐资建成的教学楼

曹禺不仅仅是戏剧大师

● 张彦

戏剧大师曹禺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我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与文艺界并不沾边，顶多也不过是个曹禺戏剧的热心观众。今天，在怀念这位大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却不是他的戏，而是他的人。因为，我们之间，曾经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谊。在我们心目中，他首先不是一个戏剧大师，而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事情应该从头说起。那是二十前的1980年3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邀请，曹禺在英若诚同志的陪同下访问美国。自从1946年在美讲学以来，这是曹禺在解放以后第一次访问美国。同时，这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戏剧界的头面人物与美国戏剧界的初次接触，备受关注。当时敌对了整整三十年的中美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我那时正在华盛顿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被派负责对曹禺的访美进行全过程报道。说实在的，我很庆幸得此任务。

对于曹禺访美，美方接待单位十分重视。当时，曹禺已年高七十，身体又欠佳。为了保证他在访问期间的健康，美方决定每天的活动“不得超过六小时”。同时，还有意识地不通知社会名流到机场迎接，事后对他的行踪实行保密，只允许报纸发表消息说：“曹禺住进城中某大酒店，暂不作公开活动。”但是，事实上，这一切，都证明无效。旧友新知，都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报纸、杂志、电视记者，更是接踵而至。于是，活动日程不得不一日数改，层层加码，从来也就未能坚持过“六小时制”。早在曹禺来美之前几个月，纽约的戏剧家们就已经筹备演出

他的《北京人》和《日出》了。“‘中国热’中又出现了‘曹禺热’”，这是当时美国媒体经常使用的词儿，可见盛况一斑。

在这些访问的日子里，曹禺的足迹出入于百老汇的大剧院和社区里的小剧场，出席大会发表演说，接受著名记者独家采访，和美国同行们展开热烈座谈，到演员家亲切访问，我都跟随在侧。我既是随行记者，逐渐又成为曹禺离不开的一个助手，不时受到他的咨询，因而使我有机会对他的为人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出乎我的意外，有如此辉煌成就的戏剧大师，竟如此地平易近人，对谁都是那么虚怀若谷。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看纽约百老汇上演的音乐喜剧《众舞竞技》，是美国当时颇富盛名的一个保留剧目，有歌，有舞，没有对话，但感染力极强。这是个娱乐性节目，但却赋予丰富的社会内容。故事讲的是一个严厉的导演为剧团选雇一批舞蹈演员，他不仅要了解他们的外表和技巧，还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应征的24个演员以各自独特的表演，把自己的家庭、历史、个性、幻想以及欢乐和苦恼赤裸裸地袒露出来，反映出今天美国青年中存在的各种状况和问题。导演的一句话将决定他们的命运，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被淘汰的当然垂头丧气，剩下的依然战战兢兢。每个人的表演都是依据着严格的台词，但却让观众感到是出自他内心的自白。这固然是由于演技的精湛，但也不能不说这正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我注意到，曹禺边看，边赞叹，似乎有点着迷。剧终后，剧院经理悄悄走来传话，说演员们都希望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戏剧大师，不知可否。曹禺听了，毫不



曹禺(前右)和夫人李玉茹(后左)与作者夫妇合影

犹豫地立即站了起来,主动走向后台与尚未卸装的演员们热情会见,没有大人物的架子。他除了代表中国戏剧界向他们表示热情的祝贺,还对于他们成功的演出作了一个简短而很有分量的评价:“这个戏深刻,它使我思考。”

在访问期间,纽约公演了《北京人》和《日出》,并特别请曹禺去欣赏了他们的演出。这件事,对曹禺触动特别深,引起了他对前后两次访美的强烈对比。1946年他来美国时,他的剧作虽早已出名,但因为他是来自半殖民地的中国,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天,他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他深刻地认识到,首先因为他是新中国的文化使者。所以,每当美国人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剧本时,他都理直气壮而又深怀激情地回答说:“《北京人》告诉你,封建主义在中国非崩溃不可;《日出》告诉你,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此路不通。看了这两个戏,你就会明白,中国人民为什么非革命不可。今天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铿锵有力的几句话,一针见血,在美国人面前深刻而又生动地展示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也私下多次对我表示,这是他这次美国之行最深的体会。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美国人对中国的事还疑虑重重。曹禺经常遇到一个问题:中国作家究竟有没有创作自由?每遇到这种情况,曹禺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美国朋

友们介绍“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如何黑暗,最近几年来中国文艺界发生了多么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他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他用事实说明,近三年来,中国平均每年有一百个剧上演或出版,受欢迎的剧本不少出自敢于思考的青年作家。在今天的中国,对作品常有争论,而且争得很厉害。人们之间,经常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他的话是这样的真诚、坦率,实事求是。美国人听了,无不心

服口服。一个作家甚至对他说:“从你的身上,我已经看到了中国今天的变化。”

在和美国戏剧界接触中,曹禺感情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他被请去看了很多的美国话剧,惟对阿瑟·密勒的《劫后余生》情有独钟。这是这个美国著名剧作家1964年的作品,被认为是他的自传剧,反映了一个饱经沧桑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全剧就是他内心创伤的解剖,令人沮丧、困惑和悲痛的往事,一幕幕重现在眼前:30年代经济危机中父母反目,家庭崩溃;二次大战中德国集中营里的灾难;50年代麦卡锡白色恐怖的迫害,朋友中出现了叛徒;两次婚姻都是悲剧,爱妻甚至精神崩溃自杀……整个戏用倒插笔手法,时而回忆,时而梦幻,但都由真人体现,十分别致。剧场颇似古罗马的圆形剧场,舞台在中央,观众在四周。演员不仅在台上演,而且出现在观众席的过道台阶上,在观众身边演,由灯光指挥剧情的发展。曹禺看了戏以后,不仅对戏的本身,而且对演出方式,都大加赞赏。事后,他和阿瑟·密勒深谈过中国戏剧改革的问题,他处处不忘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但是,他的眼睛并不只盯着大作家、大剧院。在华盛顿,他特意访问了“新剧作家剧院”。这是一个靠募捐维持的、只有70个座位的小剧院,其目的是提供条件让新作家的剧本能够得到朗诵、排练以至于演出。在各个阶段都有导演、演员和观众来和作者一起提高和完善作品。就在这个剧院小小的

舞台上,我看到,几个美国青年剧作家、导演同曹禺促膝交谈,长达两个小时之久,但彼此都感到意犹未尽。曹禺就是这样对年轻一代寄予深情、寄予希望,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最近,我读到曹禺的夫人李玉茹编辑出版的曹禺《没有说完的话》一书,我才知道,曹禺还曾经就他1980年访美留下了“旅美日记”。我意外地从中发现,我的名字被多次提到,他很欣赏我对他的帮助,特别是我肯对他坦率地说真话,建议他如何去应付各种各样的美国人。他在日记里还特别提到我对他的及时提醒:在美国人面前讲话的时候,切不可过分谦虚,因为,一般地说,美国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往往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人的谦虚美德,有时很可能在效果上适得其反。他认为,这无异于给他雪中送炭,是最真诚的帮助,使他更加意识到在友好往来中如何做到不卑不亢。看来,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已结下了深厚友谊的种子。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曹禺访美回国后不久,竟亲自提着一个大蛋糕专程来到素昧平生的我家,看望我的老母、我的爱人和孩子们。他们当然大为惊喜,并且永志不忘。后来,我回国以后,特别是在他因病长期住在北京医院的时候,我和老伴裴毓荪常去看望他。每次,他总是对我们之间那一段难忘的特殊经历,念念不忘,一往情深,使我们深受感动。

曹禺《没有说完的话》既不是曹禺的剧本,也不是他的论著,而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说完的话”。它好似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了曹禺的内心世界。在对往事的深情回顾中,曹禺经常流露出一种自责和遗憾的情绪。他说:“实际上这一生,我也不过写了十个戏。到今天,我常常有种想法,就是为什么我写得这么少,太少,太少,太少了!对我来说,我应该向我的朋友忏悔,或者向我的读者、向我的演员、向我的观众忏悔。忏悔什么呢?忏悔写得少。这也就是说,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从四十岁以后,就没有怎么好好地利用时间……”

曹禺的第一部成名作《雷雨》是1933年写成的,那时他才23岁,还只是个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一个学生。据他的回忆,酝酿虽然很

久,真正把它写出来,也不过半年。“就在那个旧图书馆一个专门搁许多外国杂志的书桌上,我占了一个位子,占了一把椅子。我在那里闷头日夜地写,我甚至于感觉到写得快得要命……为什么那个时候写戏并不感觉到这么困难,因为大约写戏确实必须有你真正从经历当中感觉出来的东西,没有亲身经历就不可能有这种欲望想写。”的确,他的另三部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作品《日出》、《原野》、《北京人》,也都是在他四十岁以前写的。在这些剧本里,曹禺都是在描绘那些被扭曲、被压榨得透不过气的人们,让他们能够觉醒,起来反抗,他说:“我诅咒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希望人们得到解脱。我自己也正在苦苦求索。向往着光明的未来。”

但是,很可惜,这几十年来,由于我们在政策上的安排,让他去当了“官”,做了大量他并不擅长、但又不能不做和不敢做的事,把时间都给消耗掉了。尤其是,在战战兢兢经历了文艺界那么多复杂的斗争以后,他也和众多作家一样,有许多话都不能说、不敢说了,以至到头来自己也不想去说了,甚至麻木了。这大概也是他后来很少再拿起笔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曾经告诉巴金,他特别欣赏他的《探索集》。他说:“我读到深夜,每篇都说到人的心坎上。你说真话,大家爱听。现在说真话的人较少,谎话连篇,一片胡言的东西较多。我们是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但为何不许讲几句良心语言?”在他的诗作中,他还写过这样几句:“如果大家戴盔甲说话,我怎能亮出我的心。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火热的心怎敢与我接近。”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又怎能期望曹禺继续写出什么传世之作呢?

晚年长期在病中的曹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为此而感到无比的沉痛。然而,他并没有将责任都推给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抗拒不了的客观环境,而是对自己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剖析,严厉地责备自己“不勤奋”,这不能不给人以震撼,不能不让人噙着眼泪向他致敬。他给我们留下的形象,是一个矛盾的曹禺,但是,却是一个水晶般的真实的曹禺。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金山的多彩人生

● 白 岩 ●

人民艺术家金山逝世 19 年了。

1982 年 7 月 16 日，北京首都剧场布置成临时告别厅，剧场内四周挂满了金山创造的众多艺术形象的剧照，让人们重新目睹金山的风采。更惹人注目的是舞台两侧垂吊着两幅长长的挽联：

上联是：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春蚕老丝难尽。

下联是：党业、民功、讲坛、艺苑，染成三千白发，孺子牛亡汗未消。

这幅长联赞颂了这位人民艺术家整整半个世纪艺术历程中突现的几座丰碑，赞颂了这位赤胆忠心的爱国者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

是啊，人们不会忘记《赛金花》的演出轰动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金山扮演的李鸿章演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

人们不会忘记在电影《夜半歌声》中，金山饰演宋丹萍获得的极大成功：一会儿年少翩翩风流倜傥；一会儿阴森森怪人怪态，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外形逼肖和丰富的内心表演，征服了广大观众。

人们不会忘记金山扮演的《保尔柯察金》中的保尔成了英雄的代名词，青年人崇拜的偶像。在那充溢着革命激情的年代，观众看完戏后不肯退场，金山不得不长时间谢幕，感谢观众的厚爱。

人们不会忘记他在《屈原》中饰演的三闾大夫，和他编导的《红色风暴》并主演施洋大律师，在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中饰演的舅舅。他编导的《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

上》、《上海屋檐下》、《丽人行》、《文成公主》、《于无声处》、《台儿庄战役》等等影剧中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1979 年冬天，我有幸和金山同志相识，他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我当时负责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戏剧卷起步艰难，这一卷包括中外戏剧两大部分，卷帙浩繁，确定分支学科、制订条目框架等一系列的工作请哪些人参加？从何入手？总编辑姜椿芳建议我去搬金山，请他参加戏剧卷的筹备工作。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办公室找到了金山同志。这位我曾在舞台、银幕上见过多次的表演艺术家，虽年近古稀却不失勃勃英姿。他待人和善、平易，丝毫没有大艺术家的架子。我说明来意之后，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这个工作难是难啊，但必须要做，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此后，金山对戏剧卷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是他动员了中央戏剧学院 20 多位教授、副教授参加戏剧卷的筹备和编写工作，是他推荐这 20 多位教授、副教授承担了十几个分支学科的主编、副主编。

金山的本职工作很忙，社会活动也多，但对戏剧卷的工作抓的很紧，很细心，从不松懈。他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戏剧卷的工作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记得 1980 年 3 月的一天下午，戏剧卷编委急需开个会，会上要研究的几个问题需要先和金山商量。我找到他时，他正在排演场给学生排《屈原》，他再三告诫演员创造角色要有一股疯劲。只见金山边示范、边讲解，给扮演屈原的学



金山同志

生说戏。他精辟的讲解、精彩的示范表演,使我想起戏剧界一位朋友讲的金山饰演屈原的一段轶事。

那是1942年,他在重庆排练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为了塑造屈原这一爱国诗人的形象,他如醉如痴,用他的那股疯劲创造人物,他不顾人们笑谈,穿着古代的长袍,走到大街上,走到江边,孤身单影,徘徊在嘉陵江畔;背诵台词,练习身段,俯视着滚滚的嘉陵江水;他思索着屈原的且行且吟,使他怦然心动,他的血在涌,泪在流,终于激情澎湃,有如排山倒海……他就这样“水到渠成”,《雷电颂》长达15分钟的台词一气呵成了。这是《屈原》剧中高难度大段独白,是《屈原》剧中的灵魂啊!《屈原》的演出盛况空前,观众高呼:“屈原、金山,金山、屈原!”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特别前去观赏金山的表演。《屈原》的作者郭沫若看后极为满意,他说:“有金山主演,我保证轰动山城。”

50年代初,金山饰演保尔时,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可是剧中保尔需要从十几岁演到20几岁。为了演好保尔,再难也难不倒金山。他为了减肥,家门口放置一条板凳,从上面跳进跳出,每天不知要跳多少次;再就是跑步,每天

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鱼白,金山已经从东长安街跑向天安门往返几次了。

金山那超群的艺术魅力以及他那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终于塑造了保尔这个举世闻名的英雄形象。

金山对大百科全书戏剧卷工作抓的很紧,仅编委会就召开了十几次之多,拟定、修改了八稿条目,还特地派了四名教授专程赴上海、南京等地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对行动不便的老戏剧家黄佐临、于伶、陈白尘进行专程拜访。对人物上书更是一丝不苟,慎之又慎,生怕漏掉该上书的每一位艺术家,而对他自己上条目的问题却只字不提。

金山身兼数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工作都要在他院长办公时间之外来完成,他的负荷超过一个健康人的正常工作。而他又极其重视工作效率,每天工作排得满满的,我常见他中午在办公室边啃面包边谈工作。他在超负荷运转啊!

戏剧卷编撰工作开展后,听说他身体不好,我有意识地尽可能不去打扰他,可他牵挂戏剧卷工作,放心不下,从医院寄信给我:

白岩同志,您有什么事让我做的,请事先和我院副院长阮若珊同志联系,她的电话是44.5269,我不日去德国访问,三周回国,如需要临行前晤面,请事先和刘厚生同志约好,我在医院等候通知。

金山

二月二日

1981年春天一个下午,戏剧卷编委召开小型会议,与会同志都知道金山这天下午要去参加西德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不会来参加这个编委会了。可是这个会刚开始,金山就来到了会议室,他说还有一个多小时,先参加这个会再参加外事活动。那天他身着白色西装,系紫红色领带,衣冠楚楚、风度翩翩。谁能想到眼前这位潇洒风流、鼎鼎大名的艺术家当年曾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呢!1932年,年仅21岁的金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他组织领导过光光剧社、无名剧人协会等进步戏剧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千里演出抗日救亡戏剧。

他还以旅港剧人协会名义在香港、东南亚等地演出有影响的进步名剧。金山按周恩来的指示,利用他复杂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深入底层为工人演出,另一方面活跃在国民党上层,直到进入总统府。日寇投降后,周恩来考虑他有独特条件和活动能力,派他去长春接收长春电影制片厂,名义上他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实际上是去保护这块文化阵地。刚刚接收这块阵地不久,在东北政局风雨飘摇中,他就编导了电影《松花江上》,郭沫若、田汉誉之为“是一部惊人的现实主义电影”。

金山在戏剧、电影中扮演过许多角色,有正面形象,也有反面形象。而那些年代他除在电影、戏剧舞台表演之外,也在政治生活中演戏,扮演国民党的各种角色,诸如接收大员、南北通航谈判代表等。1949年初,历史又把他推向更重要的位置,参与了令世人瞩目的特殊使命,他被李宗仁提名为国民党政府赴北平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兼谈判代表章士钊的秘书。事实上,这是周恩来有意促使他用大智大勇完成这件光荣特殊任务的。他每天扮演两种角色,白天若无其事的和国民党代表一起开会;到了晚上,他寻找机会悄悄地来到东交民巷一个小红门前,这里住着我党地下工作负责人李克农,金山把国民党代表团谈判的底细以及李宗仁的密电,都一一向李克农汇报,使中共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处处都赢得主动。

神奇的地下工作者金山,就是这样赤胆忠心不辱使命的啊!

北平和谈之后,张治中和金山已成朋友,但当他得知金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时,他惊诧不已,他不能不佩服金山的足智多谋和随机应变的天才,他竟然能在国民党上层要人眼皮底下滴水不漏、应付自如。张治中和金山开了个一语双关的玩笑,说:“金山啊,你真是个好演员啊!”

金山这位神奇的地下工作者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能出入虎穴,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丰功伟绩,却逃不过“文革”的牢狱之灾。金山被关押8年出来后,已是耳聋眼花、老态龙钟、一瘸一拐的老人了。可当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实

行改革开放,他又是雄心勃勃仍像火一般的炽热。他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之后,为办好戏剧教育事业,他制定了“教学、科研、演出三位一体”的方案。他自筹资金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小剧场而奔忙。他还亲自导演了《于无声处》、《屈原》、《上海屋檐下》一批著名剧作家的代表作。

这位主演、导演过40多部话剧,创作改编10多部电影,撰写了数十万字戏剧艺术论述的金山,在戏剧舞台上被誉为话剧皇帝,在电影银幕上享有盛名的老艺术家。凭他多年艺术生活的敏感,早在70年代就看出电视剧的潜在能力。他通过新闻媒介宣传、讲述发展电视剧的构想被胡耀邦同志知道了,1978年5月17日,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金山和赵寻,胡耀邦听了他们的汇报,非常赞赏。不久,批准电视艺委会正式成立,任命金山为艺委会主任。在电视剧艺委会初创的日子里,他不停地奔跑着,一会儿审查片子,一会儿开座谈会,他的血压高到190,有时实在支持不住时,找个借口去输一次氧气,再继续工作。

在金山生命的最后时刻,那天他在戏剧学院召开会议讨论建小剧场的方案,之后去天桥剧场看一个以失业为题材的南斯拉夫影片;下午3点钟从我手中要去戏剧卷第八稿的条目,4点钟他的秘书电话通知我:金山明天准时参加戏剧卷的编委会;晚上他又审查艺委会的一部电视片……

7月7日早晨,细雨蒙蒙,8点30分戏剧卷的编委刘厚生、葛一虹、舒强、夏淳等相继来到会场,可是一向准时到会的金山同志却迟迟未到。此时大家还不知道金山同志已于清晨4点钟因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他永远不会来了。

悲痛之余,我想起金山同志常说的那句话:“现在是我生命最后的时刻了,我要做最后的拼搏。”

金山的人生是炽热多彩的,他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披肝沥胆,他为祖国的艺术事业拼搏了一生,最后在拼搏中倒下……

(责任编辑 舒元璋)

读了《打扫孔家庙》之后

● 欧远方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但也有缺陷，其中包括对孔子的全盘否定，缺乏分析。当时四川著名学者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庙”的口号，影响很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孔子评价不一（“四人帮”的“批儒评法”别有用心不值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孔子比较公允了，不但在中国，新千年伊始孔子已被列为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名列第一位。这十大思想家的确立，源于美、英的《年鉴》和《辞典》。

近日阅读《东方》杂志刘明武的文章《礼仪五伦观——再论打扫孔家庙》，一个“打倒”，一个“打扫”，一字之差，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很多带有根本性的，拜读之下，受益甚多。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居“儒、法、道”三家之首。孔、孟之后两千五百年来，对孔孟的研究从未中断，出版的书籍、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了。

刘文所列五伦，依次是男女、夫妻、父子、君臣、上下（五伦之上还有天地），他根据《周易》的阐述，得出结论说：“男女、夫妻，父子、君臣、上下之间的五伦关系，是一个礼仪关系而不是征服与屈从的关系。”关于君臣之间的礼仪关系，《周易》（此书对孔子思想影响很大）认为：先有父子而后有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负责的关系，君臣之间自然也是一个互相负责的关系。从《周易》、《尚书》中可以看出，君臣之间是上下关系，也可以是师生关系，臣可以为君之师，在重大问题上君臣之间是可以各自发表不同意见的。上下之间，地位不同，但人格上是平等的，也是互相尊重的。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君造福于人民是最大的礼仪。如果不能造福人民，反而危害人民，就会发生“汤武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

再看孔子又是怎样的观点，孔子在《礼记》中提出“十义”作为人伦关系的准则。

他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刘文解释：“十义”里面，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之间，是一个双向负责的关系。父子之间，“父慈”与“子孝”是相互关系；兄弟之间“兄良”与“弟悌”是相互关系；夫妇之间，“夫义”与“妇听”是相互关系；长幼之间，“长惠”与“幼

顺”是相互关系；君臣之间“君仁”与“臣忠”是相互关系。“这里没有绝对权威，没有绝对的服从。”

再看孟子怎样说：“君之视臣如手足，臣则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

荀子的观点：他在《子道篇》中论君臣、父子伦理时提出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主张。君有道从君，君失道从道。父有义从父，父失义从义。君与父在臣与子面前并不具备神圣而绝对的意义。

刘文的结论，“各对责任的对等性，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负责、相互尊重，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五伦观。”

在此之前，刘明武先生在《东方》第5期还发表《从“男女同尊卑”到“男尊女卑”——论“打扫孔家庙”》，是单就男女地位问题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进行辨析的。（《东方》编者按）刘先生两文都以大量典籍文献（包括《周易》、《礼记》、《诗经》等）论证孔子及儒家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问题出在后来董仲舒，“借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把儒术完全歪曲了，颠倒了。董仲舒在《基义》一书中提出了“五道之三纲”：

“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五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刘文两篇文章都引用了董仲舒这段话。刘文说：“三纲”把人与人之间相互负责、相互尊重的礼仪关系变成了一方永远发号施令，一方永远服从或屈从的奴役关系。

刘文认为“三纲”的危害，一是限制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人的一言一行，判断是非的标准必须以“纲”为准。二是使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关系变成了奴役关系。

刘文结语：

两千年来的“独尊儒术”一直把“三纲”当成儒家文化来“独尊”；近百年来的文化批判（按应包括五四运动），实际上“三纲”是

“董术”而不是“儒术”，“董术”与“儒术”之间不存在流与源的关系。文化研究中如果能够分清两个字——“董”与“孔”，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将是十分有益的。

读了刘明武先生的宏论，使我对孔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孔子的思想的歪曲，除董仲舒外，宋代理学家代表人物如程颐、朱熹等，都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而加以发挥。这个思想成为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个“纲”。直到如今，虽然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封建主义影响非常之大，许多领域（不限政治思想）都打上封建主义烙印。读了刘文以后，我深感此文对于反对以至肃清封建主义，大有帮助。我们常说读历史要“古为今用”，刘先生对儒家思想的辨析，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论上的大是大非；而且有助于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进一步更有助于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因为“三纲”的来源虽然被批错了，但“三纲”阴魂并未散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三纲”之害。

刘文还进一步证明贯彻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谈何容易。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实际是不学有术），动不动用“纪律”、“条例”设置一个又一个障碍，布下一层又一层罗网，致使一些有学问而又有良知的学者“口欲言而嗫嚅”，因为他们时时感觉到头上悬着一把利剑。胸中有话以一吐为快，但拿起笔来又踌躇了。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精神。

多一点宽容，创造一个良好的争鸣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赵丹临去世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是个人经历（以及一批文学艺术家们的等同感受）的总结，也是至理名言。我再引申一下，也可以说“管得太具体，理论没有希望。”

有了宽松的环境（以宪法和法律为准则），大量好作品就出来了，众多人才也就出来了。

（责任编辑 杜晋）

在大贪的 背后

● 官伟勋

一个成功者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贤内助。贪官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险情妇”。

一位被判刑贪官的老母极其沉痛地责备儿子说：“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一个概率很高的答案，就在这里。

贪而且大的官，大都有一把年纪了。正像一位老同志在批判一个贪官时说的：“她爱你什么？爱你那一脸胡子？爱你那一脸皱纹？”说实在的，年轻美貌的她，的确不是把大贪当“帅哥”爱的，她只不过爱他那兜里的钱，手里的权罢了。

情妇的爱好倒也不完全相同。但可以断言，“爱上”大贪的情妇，十个有九个都有“名分”与经济实力的紧迫感。因此就有三怕：一怕大贪“百年之后”撒手而去；二怕大贪出事下台；三怕大贪甩了她。

“男子五十而好色之心不减，女子未满三十而色衰。”“险情妇”不一定知道韩非子的这句名言，但“人之常情”她还是懂得的。所以要趁大贪还爱她的时候，便拼命地捞钱。有了公寓，要小楼；有了小楼又要国外的花园别墅，欲壑难填。为讨其欢心，大贪难得以生理魅力相搏，也就只好在金钱与物质享受

上力求予以满足了，因而也就越陷越深了。

有人奇怪，养情妇时间那么久，贪污受贿数额那么大，为什么会长期发现不了呢？除了我们在制度上和工作上的某些漏洞与失误外，就贪官的主观方面说，这些人确实也都是些堪称未经专门训练的“一流演员”。他们很会伪装，很善于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明一套，暗一套。

在上级面前，这种人往往表现得非常虔敬、非常驯服。上级刚要讲话，他会立即掏出笔记本来恭恭敬敬地作记录，至于他在那里画小人还是画小王八，就不得而知了；上级刚有新的号召，他会用最动听的语言阐发其崇高的含义，并会很快地拿出“花瓶政绩”抢占一个“头条”新闻。对下则又打又拉软硬兼施，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力求培植一群依附于他的、令他信得过的“干部队伍”。

偶尔被抓住了尾巴，这种人也很善于在上级面前痛哭流涕地做检讨。

“哭什么？委屈你啦？”“不、不、不！我恨我没有早日遇到像您

这样的好领导，早有您这样严格要求、坚持原则的英明领导，我也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呜、呜、呜！”哭得好不伤心。

这种“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的检讨，是很容易令自信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人舒服并上当的。“有错，改了就好嘛！”“不要一棍子打死，要让人家革命嘛！”我们的一些同志，就这样不看问题的性质，不听群众的呼声，照搬两句耳熟能详的套话，让一些社会主义大厦里吃得肥肥的蛀虫，轻而易举地滑过去了。至于对那些与他们同病相怜的上级领导，那就更好办了。

如此这般一来，上有一把又一把自觉不自觉的保护伞，下有一层又一层的防漏防渗墙，我们的大贪自然也就屡经考验安然无恙渡难关了。

胡长清也好，成克杰也好，终究还是没有逃脱法律的严厉制裁。这是由胡长清与成克杰们的立足点决定的。他们背叛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最根本的宗旨。他们的两只脚，早已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纯为满足私欲的两块滑板上，一块叫“金钱滑板”，一块叫“美色滑板”。在坚决要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群众面前，不可能不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背后有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个小问题。是功成名就还是身败名裂？往往与此有关。然而，这又是一个完全取决于个人而非取决于“背后人”的问题。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由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决定的。

（责任编辑 致中）

想起林纾的两篇小说

● 纪 文

最近，听说一件事，颇觉得有点意思。

某地某刊，因为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方针，坚持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办刊原则，敢于说真话，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却受到少数“左”派人士的忌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几位“左”派人士于无计可施之时，突生一计，向上面写匿名信，状告某刊“宣扬自由化”等诸种罪状。这些“左”派人士受过长期“反右”和“反修”训练，要为该刊罗织几条罪状还不是小菜一碟！

匿名信送上去了。几位“左”派人士就准备喜听该杂志“停刊整顿”的消息了。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上面并没有轻信，而是批了“查实”两字。这一查，不对了。反而查出这匿名信不仅“左”气熏蒸，而且使尽了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歪曲事实，上纲上线等诸般手法，甚至连基本的统计数字都是捏造的。自然，该刊安然无恙，出版如常。

听说此事后，我想起了林纾的《荆生》和《妖梦》。那还是“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等大闹文坛的时候。这几个人，不仅反对“定孔教于一尊”，而且高喊“民主”、“科学”，又倡导什么“白话文学”，将“引车卖浆”一流人的语言视为“正宗”。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就有一位精通桐城“义法”的名士林纾跳出来“卫道”，写了两篇小说，一曰《荆生》，一曰《妖梦》。

《荆生》写了四个人。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高谈阔论，田指责孔子，狄主

张白话，忽然，隔壁跳来“伟丈夫”荆生，大骂田、金、狄三人，“伟丈夫”用两个手指头摁住田必美的脑袋，用脚猛踹狄莫，狠狠地摘下金心异的近视眼镜扔掉。据描写，田等或脑痛如锥刺，或腰痛欲断，或叩头求饶不已。“伟丈夫”于得意洋洋地傲视三人的狼狈状之后，大笑说：“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铜！”

《妖梦》以田恒影射陈独秀，以秦二世影射胡适，二人提倡白话，反对旧的伦理纲常，得到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校长元绪公（影射蔡元培）的支持，结果，突来妖魔，张开大嘴，将三人统统吞掉。

写匿名信的“左”派很有点儿像林纾。当年的林纾无法阻挡新文化运动的浩荡潮流，只能将胜利寄托于幻想中的“伟丈夫”和“妖魔”；今天的“左”派也无法阻挡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与思想解放的潮流，于是寄希望于“上面”。然而，他们忽略了今之“上面”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查实”的结果是查明匿名信本身不实。

社会上各色人等都有，观点自然也会不同。张三视为正确，李四却视为错误；赵五认为“好得很”，王六却认为“糟极了”。怎么办？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辩论就是了。人们常云：真金不怕火烧，真理愈辩愈明。通过辩论，真理最后一定会掌握群众。李大钊当年对林纾一流旧派人物说过一段话：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应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佑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

我觉得李大钊的这段话很值得今之“左”派深思。

当年的林纾写小说时还署了名。今之“左”派虽然自视为真理的捍卫者，颇有“誓扫异端不顾身”的气概，却只能“匿名”告状。呜呼！

（责任编辑 致 中）

用另眼看“大帝”

——读稗琐记之一

● 李一鑫

近两年，某些历史小说和历史影视剧作者，对帝王题材兴趣盎然，尤其对清朝前期几位“大帝”们特别投以青睐，甚至（不知出于何故）着意拔高其形象。这里从稗史中随便找出一点不无意趣的小资料，让我们从另外视角看看“大帝”们的面目。

下面几段，源自清代历史笔记《嘯亭杂录》。该书为乾、嘉时一位被削爵的亲王昭槎所著（一说其门客代笔）。书中颇多清代前期史料，尽管总不出为皇帝及满族王朝歌功颂德的原衷，但也有一些，由于是照直记录，可使人读出另一番道理。

如此“优容大臣”

题为《优容大臣》的一段，说的是康熙“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如满族大臣纳兰明珠贪污索贿，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也多有贪鄙秽行，朝野议论纷纷。康熙知道后，却都从轻发落，处置不甚严厉。有近臣不理解，于是康熙说：“诸臣为秀才（时）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骏拥护，皆何所来赏？可细究乎！”

对此，昭槎称颂康熙道：“其明通下情若此。”

看来昭槎不但精通马屁术，而且深知封建朝廷为政之道，猜得透“大帝”们的良苦用心。所谓“明通下情”也者，就是皇上老儿对“一朝得位”成了大官的前秀才们“何所来赏”

（打哪儿来钱）的途径，其实心里明镜似的。之所以眼睁睁闭，道一句“可细究乎”，是不能也不敢细究。果真细究起来，就不是伤及少数官僚的问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旧谚，一语道破那个时代制度的本质。这决定了治疗这一源于制度的痼疾的难度，历代帝王包括有为的帝王对此也并非不想治理，却空叹有心无力。而更深层的问题倒是，对“大帝”们来说，得民心与得官心相比，后者更重要。皇帝必须维持封建官僚制度，有一支帮他治民的官僚大军。他深知拢得住官僚们，就拢得住天下。

其次，康熙时，天下尚未完全底定，要平定“三藩之乱”，还要对付海上抗清势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尚未完全归心；纳兰明珠是平定三藩的重臣，在朝中尤其是满族大臣中羽翼颇多，而徐乾学兄弟则是汉族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江南士族群中有影响的人物。狡兔未死，走狗难烹，这些人都远未丧失用处。因此，他们的贪鄙行为再多，比起政治需要，也是不足道的。

所以，康熙的“明通下情”，其实是一种明白的无奈。因为，要维持封建皇权，就必须维持腐败的封建官僚制度；这正如明知病在膏肓，却又不能自己为自己切腹割除，要割除就等于自杀。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性就埋根在此。在宗法的人治时代，在封建官僚制度下，所谓吏治，就是皇权下的官僚政治。贪污腐败乃属普遍和必然，不贪污则是个别和偶然。所以，还是已故著名理论家王亚南在其所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说得好：“官僚政治下的

各级官僚……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它的各级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的统治来维持。人治是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这一切只因为：“人治不是人民政治”。

惩戒“专擅”

顺治亲政后，一些大臣如满族的谭泰、汉族的陈名夏、陈之遴、刘正宗等“专擅”，并朋比相附。顺治对此毫不手软，“无不立正典刑”，或杀或流放。《啸亭杂录》作者认为，顺治以后的“康乾之治”，实由此奠基。

另一则叫《康熙拿鳌拜》。说康熙继位时年仅8岁，辅政大臣鳌拜也“专擅”得很，“一时威福，尽出其门”，皇宫内外无不怕他。到康熙八年，16岁的皇上再也不能容忍了。经一番谋划，等有一天鳌拜入见，康熙对御林将士有这么一段对话：“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耶？”将士说：“独畏皇上！”康熙立即命令：那就把鳌拜给我拿下杀掉！与《啸亭杂录》所记不同的另一传说是，康熙让一帮小内监“习布库戏”（即满族传统的徒手搏击技艺），假装请英武有力的鳌拜教艺而擒之。金庸小说《鹿鼎记》采这个说法。

这段笔记，令人特别感到有趣和富于启发意义的是，别管皇上年纪大小，普天之下也必须“独畏皇上”，在“畏朕”与“畏（鳌）拜”之间，是不容有半点错位的。绝对权力的绝对性，在这里表现无遗。

什么叫“专擅”？按宗法君臣之义，君代表“天、父”（《抱朴子》），代表“权”（《春秋繁露》），是不可超越违抗的；而臣是“事君者，屈服之象”（《说文解字》），是“奴隶，男为臣，女为妾。”（《辞源》）所以《抱朴子》说，臣应该“事无专擅，请而后行。”如果臣以为自己职位高，能力强，受宠信，可不经请示而擅自行事，就犯了“专擅”罪。在宗法制度下，上可

专制，而下不可专擅；专擅是对专制的冒渎，专制绝不容专擅。

由此也可见，“大帝”们对大臣犯罪并非一律“优容”，而是按性质区别对待。凡是冒犯皇权的，不仅绝不“优容”，更要“立正典刑”。而无论“优容”或“立正典刑”，都是为了巩固绝对的皇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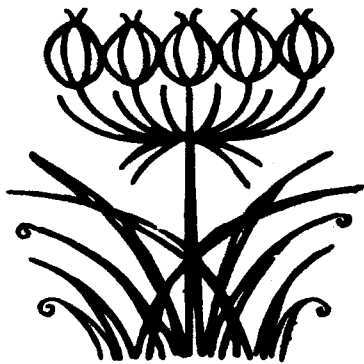
不许平民“擅问官守”

又一则说的是一次雍正看杂剧《乡襦记》。剧中人常州刺史郑儋之子郑元和，热恋妓女李亚仙，误了读书，被郑儋打得休克后抛于荒野，又恰巧被那个妓女李亚仙搭救。李亚仙勉励这个浪子发奋读书，为断其杂念，竟自己毁容。郑元和感奋之下，悬梁刺股，终于考中状元。这故事本来未脱俗套，但雍正看了很高兴。显然，提倡士子一心读书作官历来是符合帝王心意的，便吩咐赏饭。饭间，伶人忽问现任常州官守是谁？雍正立即“勃然大怒曰：‘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因将其立毙杖下。”

《啸亭杂录》就此又拍皇帝马屁道：“其严明也若此。”

好家伙！“优伶贱辈”偶然问一下现任官守，竟被“立毙杖下”，而这竟叫做“严明”。可见宗法专制社会的老百姓过问政事是犯法的，对此也绝对不能“优容”。

（责任编辑 致中）



恶政是一面筛子

● 吴思

一

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天下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官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三百万钱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二千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二千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一万三千。皇上要的三百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两千万，更相当于太守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

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作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官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

二

转眼又过了1400多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

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宦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宦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宦，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人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掳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人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金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

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衔，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三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太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

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四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

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按当时官场这些都是必需的应酬,其实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政党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也是理所当然。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而袁宏道却认为这作官是苦、是毒,以致托病辞官,也算难得的了。

五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

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责任编辑 致中)

欢迎订阅 2001 年《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革命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您若错过了邮局 2001 年期刊的征订日期,欲订《炎黄春秋》杂志,请直接在本刊发行部办理订阅手续。没有时间限制,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每月 4 日出版,16 开本,内文 80 页,60 克双胶纸;彩封,157 克铜版纸。每期售价 4.80 元人民币。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东城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72452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我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 1995 年以前 45 期的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 150 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 116.10 元。另加书价的 10% 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因存书不多,恕不拆套分卷出售)

近五年合订本有售

2000、1999、1998 年合订本,每年一册。精装每册 56 元,简装每册 51 元。

1997、1996 年合订本,每年一册。精装每册 52 元,简装每套 49 元。

均免收挂号邮寄费。

印度： 亚洲另一只醒狮

● 清 早

很多人未必会想到印度是世界上位于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个科技大国。印度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工资政策，且不是靠论资排辈、滥竽充数就能跻身其列的。

笼统地说，文明悠久的民族，当年虽然灿烂，但总不能靠石器瓦罐、祖传秘方来抗衡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在亚洲，最先败下阵来的是印度。公元前 2300 年就开始的印度河文明以及后来的恒河文明，在 17 世纪居然败给了贩卖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后成为殖民地。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等的日子也统统不好过。到 19 世纪，这个噩梦终于轮到了中国的头上。近代史历历在目，不必多说。

古老文明虽然衰落式微，但人口却越来越多，尤其亚洲这两个头号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人口加起来等于地球上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二。这一股巨大的人流，一旦动作起来，决不会满足于三个人轮流穿一条裤子，或者浑身赤膊只披一块布片。要生存，要发展，这种愿望本身就是一种核聚变。拿破仑说中国是睡狮，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亚洲除了有一个西方化的日本外，有四只或更多的新兴工业“小老虎”，还有两只已经醒过来的狮子，印度和中国。

我们一直习惯于把眼睛直挺挺地瞅着西方、日本和俄罗斯，却很少看看就在我们隔壁的印度。大概是近代中国阿二、印度阿三彼此都穷得叮当响，没有什么可以彼此借鉴的。

印度圣雄甘地的大弟子尼赫鲁在半个世

纪前写过一本有千多页厚的书——《印度的发现》。这当然不是指印度在地理上的被发现，而是指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历经 300 多年殖民地苦难的民族正在苏醒过来进行全面反思，代表对印度的再认识。他发现，古老的文明固然有不朽的精华，但却有更多祸国殃民的糟粕。他和马克思、甘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马克思语）；不可接触制度是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一个丑恶的赘生物（甘地语）；只要种姓制度存在，印度就不能在世界文明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尼赫鲁语）。

种姓制度，土邦林立，同属印度人，老死不相往来，各说各的语言，宛如聋子之间的对话。全国有 150 种语言，于是一张 10 卢比的钞票上不得不印上 15 种文字。

印度独立后，曾设想在 15 年后以印第语取代英语作为官方语言。50 年过去了，英语不但没有被取代，而且成为印度走向世界开拓国内市场冲破封建束缚的一个利器。这是印度裔的移民能迅速融入美国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能讲相当流利的英语。而这正是中国或韩国等国的移民所望尘莫及的。数字证明了这个问题：在美国，只有 14% 的印度裔移民是在印度人自己经营的企业中工作。而韩国则有

33%的移民只能围着自己人的社区转。从形式上看,一个国家讲一种语言,似乎是独立的象征,但英语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能够衍生为科技和财富的工具,却无意中使印度人更快地走向实质上的独立,能顺利地走出种群的约束。

很多人未必会想到印度是世界上位于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个科技大国。共拥有科技人员 350 万人。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工资政策,且不是靠论资排辈、滥竽充数就能跻身其列的。印度有综合大学 200 多所,高等院校 6000 多所,研究院 2000 多所。特别要提到的是她的教育质量,包括印度科学院、孟买理工学院等 5 家院校的毕业生,已经成为世界上尤其是美国硅谷争夺的对象。这些院校不只是媲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法国的综合科技大学,某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印度研制的每秒钟运算 10 亿次的计算机,由于价格和性能均优于各国的同类产品,1995 年已经向包括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出口。总体经济实力名列世界第七,是世界上第六个有能力发射卫星的国家。

自 80 年代以来,为了适应世界的高科技需求,印度迅速地、甚至奇迹般地发展了自己的软件产业,软件生产量已经占世界软件总量的 16.7%。比尔·盖茨惊呼:“印度将会在 21 世纪成为软件的超级大国”。盖茨对印度人的才能要比一般人更加清楚,现在那个举世闻名的 HOTMAIL(免费电子邮件系统),就是由印度人始创,并以 4 亿美元卖给微软的。

根据国家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的调查,2000 年前后,印度的软件出口可达 40 亿美元,2001—2010 年可达 250 亿美元。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亚裔教授的调查,从印度抵达美国的移民中,只有 3%的人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而在美国工作的印度人中,75%的人是大学毕业的(来自中国的移民中大学生的比例为 55%)。“这就是说,这些移民本身就是一份造福社会的财富,而不是负担。”在硅谷,到处充斥着印度姓氏的公司,例如硅谷最大的一家叫做 Kleiner Perkins Cau-

field & Byers 的风险投资基金,就是由印度人控制的。

硅谷 1/3 的工程师、高科技公司中 7% 的执行总裁为印度裔人士。从事新经济而发财的印度裔巨富有好几千人,其中创设网络公司的佼佼者更拥有 40 亿至 60 亿之间的财富。印度人善于在高科技领域致富,他们已经留下了令人信服的足迹。

这些高素质的移民造就了硅谷的印度风暴。那些在 80 年代末由印度人大批建立的公司,纷纷于 1996 年在华尔街股票交易市场上了市,其中比较著名的六家股价最高的已经接近每股 200 美元。

20 年前,也就是 80 年代开始,当时在美国的很多印度裔移民都居住在临时搭建的矮小简陋的棚子里,或在家庭经营的汽车旅馆铺上一张床单胡乱睡个觉。今天,他们搬出了置放拖把之类的储藏室,攀登上了几乎是每一个行业的高层位置。印度人正管理着《财富》500 家公司中的相当一部分公司(包括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国空中航线公司),或者说,担任着投资顾问和有价值证券的分析家。从加尔各答移民过来的库坡塔领导着咨询行业的巨人麦肯锡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华尔街和传媒行业的股份。对个人,也许会有偶然的运气,但对一个庞大的移民群,在美国这样大面积的“丰收”,则是这个民族厚积薄发善抓机遇的缘故。

美国接受来自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的移民,不算非法移民,移民总数为 2630 万。最多的是墨西哥人,有 700 多万,菲律宾人为 120 万,印度人为 72 万(大致相当南美小国多米尼加的数额)。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在美国领事馆门前拥挤地排着长队,前途未卜地申请一般的移民签证的情况相比,印度人移民就比较从容。因为在专门适合特殊性职业的 HBI 签证(按照美国移民法的规定,HBI 签证一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二是具有学士或更高的学位)方面,印度人占了总额 20%。这个比例是极高的。也就是说,美国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中挑选符合 HBI 签证所需的专业人士中,每 5 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印度人。此外,印度每

年还有 1.5—2 万名的学生收到美国的学生签证。除了诸如财力上的原因之外,考虑到易于获得 HBI 签证,印度本国的教育质量以及掌握英语的能力,印度的学生大都可以在本国攻读专业和学位,随后以 HBI 签证去美国。而这一点,正是很多国家所做不到的,因为美国根本就不承认这些国家的学位。

还有些几乎是令人惊异的故事。在美国只有 6% 的印度移民生活在贫穷线之下,而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为 31%,来自英国的为 8%。领取救济和食品券的印度人也最少。使用公众援助的不到印度移民总数的 1%,而菲律宾移民则为 4%。在美国的各国移民中,印度移民人均收入是最高的。“光凭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一些印度人就可以成为合法的投资移民了。”

“与其他国家的移民群体比,印度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 Gangwal 说,他是美国排名第 6 的 AIRWAY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总裁,“其实我们的成就只是冰山一角,再过 10 年,像我现在这样的成就,在印度人中间可能不会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古老的文明并不是限时报废即刻解体消失的旧汽车,也不是一无是处的累赘。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或西方社会所信仰的宗教不也是 2000 年以前的老品种吗?除了科技上的新玩意层出不穷外,习俗上、观念上,大多还是老藤上蔓延下来的旧枝:参加丧礼要穿黑衣服,婚礼上新娘子要披白婚纱,嫌贫爱富,以强凌弱,男盗女娼等等现象,同几千年前完全一模一样。不论哪个时代,哪个文明,哪个社会中都是大同小异的。因此,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是谁吃掉谁,谁同化谁的问题,而是要找到一条能够彼此衔接的桥梁,这就是教育。

所谓全球化,现在被很多人看成是美国化,而美国化的背后是来自世界各国、受过高深教育的精英的奉献。从爱因斯坦到发明计算机的匈牙利人,你可以捧着诺贝尔奖金获奖者的名单——来数。印度移民是后来者,共有 6 个获奖者。相比之下,大多数印度移民认为美国的教育有点儿欠缺。Mal-hotra 是纽约一家

银行的助理司库,他是在印度德里一家政府开办的工程学院里毕业的。“比较这里的伊利诺斯理工学院”,41 岁的 Mal-hotra 说:“你几乎可以闭着眼睛通过那些课程。我至今不明白这个国家怎么还能走在世界的前头。”

那么,印度自己的教育有什么特色呢?

甘地虽然是被人刺死了,但他有关立国之本的教育思想是刺杀不了的。这种思想在几十年之后终于长出了硕果。甘地认为:1.真正的教育首先要学会解剖自己,还有什么能胜过做人的哲学呢?2.教育不能排斥外来文化,但首先必须置身于本土文化,不能培养出那些数典忘祖、与家乡父老格格不入、看不起故土的人。3.不应该单纯重视智育,也要强调德育和劳动的基础教育。4.对所有的印度人提供机会均等的教育,教育不能成为少数阶层的特权。5.教育不只是学会一些知识和技能,主要是为受教育者提供真正的自由,不受虚伪和暴力的奴役。

甘地虽然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今日的印度用实践来证明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这也让我们明白,只有早先播下优良的种子,坚持不懈地培植,才会有他日的收获。成就绝对不是糊里糊涂混出来的。

在印度有几百万个电邮亭,几乎是每隔 1 公里就有一个。电邮亭里面有电话机、传真机、复印机和电脑。总的来说,印度还是个穷国,打两分钟国际长途电话要付 400 个卢比(10 美元),而在邮亭里发一封电子邮件只要 5 个卢比(相当美元 1 角 2 分钱)。为什么不在家里发电子邮件呢?一台电脑要 5000 卢比(125 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者半年的工资。因此,在这种具体的国情下,高科技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方便,同时也对封建割裂、种姓制度等顽固体制进行了最有效的冲击。不是靠流血的方法,而是依靠“利之所趋”的自然法则。电邮亭代替了当年的驿站,汽车代替了老牛拉破车。在不知不觉中,将两类文明衔接上了。

转载自《南风窗》2000 年第 6 期

龙年九九重阳炎帝陵

祭祖大典在湖南炎陵县举行



①参加龙年九九重阳炎帝陵祭祖大典的各界人士肃立于炎帝陵行礼亭

②主祭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庄炎林恭读祭炎帝陵文

③庄炎林、冯征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敬献花篮

④来自海内外的炎黄子孙踊跃参加期盼祖国完全统一大签名活动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炎陵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龙年九九重阳炎帝陵祭祖大典于2000年10月5日在炎陵县举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主祭。出席大典活动的还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征，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任德全，湖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伯华，炎帝陵基金会会长、湖南省政协原主席刘正，成都军区原副政委张少松中将，炎帝陵基金会副会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潘基础等。湖南省药监局、省社科院、株洲市的有关领导和来自全国各省市、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各界代表、专家学者也出席祭祖大典。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印度：亚洲另一只醒狮

民主斗士史良

百岁红军女战士陈琼英

美国将军史迪威与八路军

当代武训——潜胞张杰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